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程铭莉

吉林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www.ChineseAll.com

中文 数字出版 领跑者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2016
数字版图书版权信息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程铭莉著.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6.

CAEBN：7-001-000-60608158-2

分类号：马克思主义 - 女权运动 - 国外 D440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程铭莉 著

出品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16.6.1

更新时间：2016.10.11

上架建议：政治/法律

本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出版与发行，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敬请读者指正，我们会及时更新版本。

电子邮箱：copyright@chineseall.com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作者和相关机构提供数字出版服务。

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6-11728-2

出版时间：2015.6.1

目 录

前言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0.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提出及其意义

0.1.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提出

0.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意义

0.2 国内研究现状

0.2.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经典文献

0.2.2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归纳整理

0.2.3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本土化运用

0.3 研究方法

0.4 创新之处

第1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究底

1.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1.1 社会氛围的促成

1.1.2 女权运动的推动

1.1.3 理论发展的需要

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2.1 唯物史观

1.2.2 阶级理论

1.2.3 异化理论

1.2.4 经济理论

1.2.5 实践理论

1.2.6 劳动分工理论

1.2.7 人的本质理论

1.3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

1.3.1 妇女受压迫的基础

1.3.2 妇女解放的途径

1.3.3 妇女解放的条件

1.3.4 妇女解放与社会变革

1.3.5 妇女解放的长期性

1.4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实践者——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

1.4.1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妇女解放提供条件

1.4.2 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1.4.3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1.4.4 推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

1.4.5 倡导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妇女摆脱家庭的奴役

1.4.6 支持妇女离婚，促成了新婚姻法的通过

1.5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者——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

1.5.1 女性解放的主体力量——女工或农妇

1.5.2 女性解放的前提——性别压迫问题

1.5.3 女性解放的条件——参加社会生产

1.5.4 女性解放的基础——消灭私有制

1.5.5 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实现自由的婚姻

1.6 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父权制

1.6.1 父权制的概述

1.6.2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认识

1.7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

1.7.1 结合的必要性

1.7.2 结合的可能性

1.7.3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的结合

第2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发展演变

2.1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奠基）

2.1.1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产生的社会背景

2.1.2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主要目标

2.1.3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奠基

2.2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早期和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2.2.1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产生于新左派

2.2.2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2.2.3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的中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2.3 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2.3.1 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

2.3.2 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中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2.3.3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挑战二元论的思维模式

2.3.4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性解放问题的重新解构

第3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构

3.1 经济因素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3.1.1 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

3.1.2 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压迫的根源

3.1.3 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

3.1.4 劳动力后备军存在的意义

3.2 非经济因素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3.2.1 朱丽叶·米切爾的四種結構分析

3.2.2 米切莉·巴雷特的意識形態理論

3.3 經濟論和意識形態論之間的折中途徑

3.3.1 海蒂·哈特曼的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相互依賴的二元制理論

3.3.2 艾里斯·揚的以性別分工作為核心範疇的一元制理論

3.3.3 齊拉·愛森斯坦的資本主義父權制理論

第4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评析

4.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树

4.1.1 揭示当代妇女的异化状况

4.1.2 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4.1.3 探索女性解放的路径和前景

4.2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局限

4.2.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偏离的倾向

4.2.2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别化

4.2.3 对女性受压迫及解放问题探讨的片面性

4.2.4 对女性受压迫原因的本质主义探究方式

4.3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意义

4.3.1 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4.3.2 运用性别分析领域深化和扩展马克思主义

第5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的殊异甄析

5.1 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历史变迁

5.1.1 马克思主义传入前中国女权主义思想概述

5.1.2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女性解放思想发展

5.2 中外女权主义差异

5.2.1 历史渊源的差异

5.2.2 文化背景的异质

5.2.3 理论核心的分歧

5.3 中国的女权主义的独特之处

5.3.1 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是国家和民族革命的重要部分

5.3.2 中国女权运动的男性特色——父系的女权主义

5.4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构建中国女权主义的借鉴价值

5.4.1 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理论资源

5.4.2 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

5.4.3 正确把握中国女权主义历史内涵

5.5 国内学界对构建中国女权主义的成就与思考

5.5.1 向警予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体

5.5.2 李银河受争议的女权主义研究

5.5.3 李小江的市场女权主义

5.5.4 戴锦华的后结构女权主义

5.5.5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发展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尚塔尔·墨菲：“对我来说，女权主义就是妇女为平等所进行的斗争。”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社会民主、个人自由。但是，就女性而言，不管是大城市中产阶级白领、还是乡村劳动农妇，亦或是青春正好的女大学生，却发现做女人难，做幸福的女人更难。整体的社会氛围都给女性很大压力：从出生时的弄瓦，入学时的女童失学，就业时的女大学生性别歧视、性骚扰，下岗时的女工优先牺牲，参政的偏见障碍、升迁的玻璃天花板，结婚前的剩女难嫁，结婚后面对出轨众生的局面，离婚后失婚女市场的凋零，家庭暴力、性强暴，日常生活里的黄段子，媒体里对女性若隐若现的蔑视……有人说，对女性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的是法律上男女平等，个性自由、选择增多；坏的是社会观念巨变，旧的思想已经坍塌，新的潮流却还没有形成规模，旧的禁锢还在，但保障已失。中国女性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中国的女权主义需要找到新的理论工具和批判武器来解决这些旧的或是新的压迫形式，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具体现实国情，探索可行的女性解放和女性发展模式。

在当今中国，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恰逢其时。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合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和女权主义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基础分析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符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导向。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中国女权主义的殊异甄析，注重将理论的研究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现实国情相结合，探索可行的女性解放和女性发展模式。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

中文摘要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梳理·观点评析·殊异甄析

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的名言：“提出女权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女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指导不断发展的女权运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和女权主义的理论，符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导向。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梳理、评说诊测以及中外女权主义殊异甄析，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开拓视野，转变思维方式，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推动女性未来发展和进步。

本着对于中国女权主义发展提供借鉴价值的宗旨，本书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理论建构、理论建树，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进行殊异甄析，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合理因素，从而建构一个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理论体系，更好地解决中国女性面临的问题。

导论。主要论述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提出及意义，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阐述。对有关概念加以厘定，介绍了带有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Marxist Feminism）的提出，并阐述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演进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指出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学术话语的中国，探

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更有着特别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第1章，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究底。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在社会氛围促成、女权运动推动、理论发展需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包含阶级理论、异化理论、经济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和人的本质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畴。详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奠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探讨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最终克服各自的历史盲点和性别盲点实现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深远意义。

第2章，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发展演变。国外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按时间标准划分为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发展浪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于第二次浪潮，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期70年代中后期；后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三个阶段从奠基、产生和发展都蕴含在女权主义三次浪潮中。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产生出持有不同理论观点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待女性问题上的性别盲点、自然主义和普世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对女性解放问题重新进行了解构。

第3章，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构。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构主要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以及在经济论和意识形态论之间寻找的一条折中途径三条主线来探讨与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等理论重新定义了妇女工作，揭示了一直以来被马克思主义忽视的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指出正是家务劳动使得妇女长期在经济上落后，从而在社会地位上从属于男性。探讨非经济因素对妇女地位的影响比较有成就的是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提出关于妇女状况的深刻理解，认为必须改变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大结构的紧密结合，只有同时改变这四类机制，才能获得妇女解放。

米切莉·巴雷特则提出意识形态理论，通过探讨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和父权制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如何受压迫及其解放问题。除了以上两种经济论和非经济论外，还有相当多的人尝试着把经济论和意识形态论融合，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折中的途径。其中包括海蒂·哈特曼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依赖的二元制理论、艾里斯·扬的以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安·弗格森的性——情感生产论、齐拉·爱森斯坦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理论、琼·凯利的经济 and 性别系统互动论等等。

第4章，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评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树主要在于强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揭示当代妇女的状况，并从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探索了女性解放的路径和前景。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具有历史局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偏离的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别化、对女性受压迫及解放问题探讨的片面性、对女性受压迫原因的本质主义探究方式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但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性别分析领域深化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5章，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的殊异甄析。从回顾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历史变迁入手，阐述中外女权主义在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和理论核心上的差异，指出中国父系的女权主义独特之处，并概述国内学界对构建中国女权主义的成就与思考，探索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构建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女性解放

Abstract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Theory Carding,Comment Exploration,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saying of famous Marxist,feminist Juliet Mitchell goes“Proposing the problem of Feminism,giving the answer of Marxism。 ”As an important genre of foreign Marxism,Marxist Feminism attempts to think over female problem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using Marxism theory,us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to direct continuously developed movements of femininity.Marxist Feminism as-sociates women's liberation thought of Marxism with great theory of feminism,conforming to the ideology of our country and dominating value orientation.Through the theory carding,evaluation and diagno-sis,and comparair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feminism,excavate native resources and nutrition from the differences,broaden the horizon,find the foothold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establish Marxist feminism base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promote femal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providing reference value for feminism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o research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impor-tantly illustrate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and,theoretical accomplishment of Marxist feminism,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and feminism under the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excavate the native nutrition,simulta-neously thus,establish an open theory

system of femi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etter solve the problems women of our country face.

Instruction.Mainly illustrate the proposal and meaning of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analyze and discuss the overseas and domestic re-search status of Marxist feminism.Determine relate concepts,introduce feminism genres with Marxism discourse—the proposal of Marxism feminism,and ill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prac-tical value that it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Point out that it has the double meanings of spe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Marxism theory regarded as dominating ideology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hapter 1.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was produced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ocial atmosphere facilitation,feminism movement pro-motion and demand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social historical outlook of Marxism and methodology,it includes class theory,dissimilation theory,theory of labor division,economic theory,theory on human nature etc.Detailedly analyze women's liber-ation thoughts of two classical writers of Marxism:Marx and Engels,who are the founders of women's theory of Marxism.Discuss the further meaning that Marxism associates with feminism to form Marxism femi-nism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Marxism theory providing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for feminism and feminism theory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Chapter 2.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foreign Marxism feminism.The course of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mov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waves which are the first one, the second one and the third one according to the time standard. Marxist feminism was formed during the second one, which has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early stage: in the early 1970's; middle stage: in the late 1970's; late stage: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e three stages are involved in the three waves of femi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ndation,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fferent developing features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producing representative figures with different views, especially the latter Marxist feminism criticizes gender blindness, naturalism and universalism, deconstructs the problem of women's liberation again.

Chapter 3. Theory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is mainly to find a comprising path among economic factor, non-economic factor and economy and ideolog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liberation and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Marxist feminism uses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Marxism to redefine women's work to disclose the economic value of housework that has been ignored all the time, to point out that it is the housework that makes women economically poor, therefore subject to men in terms of social status. The person who is famous for exploring for non-economic factor to influence women's status is Juliet Mitchell proposing the unique views on the problem analysis of women suffering from pressure, thinking the mechanism of women suffering oppression can be generalized into four types: birth giving reproduction sex life and socialization. Only the four types of mechanisms are changed simultaneously, women can be able to liberate.

Michele Barrett proposes the theory of ideology,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apitalism production and ideology, explores the cause of women suffering from oppression, how to suffer from oppression and the problem women's liberation. Besides the two kinds of economics and non-economics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people trying combining economics with ideology, finding a comprising path between the two aspects. It includes the theory of dual system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apitalism and patriarchy by Heidi Hartmann, the theory of unitary system regarding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s core category by Eris Marion Young, the theory of sex-emotion production by An Ferguson, the theory of capitalism patriarchy by Zilla R. Eisenstein, the interactionism of economy and sex system by Joan Kelly.

Chapter 4. Comment and exploration of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mainly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uses dissimulation theory of Marxism to disclose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women, and explores the paths and perspective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erm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thought. But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also appears the tendency of deviation towards Marxism theory, the sexualization to Marxism theory, the one-sided discussion to problem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historic limitation to probe means of essentialism of women's oppression cause. However, in general,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hich not only uses social sex perspective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Marxism but also uses sex analysis field to deepen and expand Marxism.

Chapter 5.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and feminism under the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Starting with looking back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feminism under the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s of historical origin,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core of home and abroad feminism,point out the unique of Chinese patriarchal feminism,and explore the reference value of foreign Marxist feminism constructing feminism under the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

导论

0.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提出及其意义

0.1.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提出

女权主义Feminism来自于法文Féminisme,意思是妇女解放,法文femme原指“女性”,加了一个通常被译为“主义的”后缀“ism”。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哲学家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所创。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女性社会经验为来源和动机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运动。

国外女权主义是指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知识女性用来反抗中世纪封建的男权压迫,争取经济、政治、婚姻自主权力,追求人身独立与思想解放的主张及其实践。一直以来,女性都生活在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之中。到了17、18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启蒙思想的崛起,个人自由平等的观念逐渐唤醒了女性追求自身权利的意识。到19世纪中期,它渐渐地作为一种解放女性的思潮,到20世纪70至80年代,这种思潮发展成一场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运动。 [1] 其中以英美两国研究较为突出,后经日本传入中国,称为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强调性别平等肯定女性价值的理论,又可以看作是一场争取女性权益赢得女性解放的社会运动。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女权主义可以概括为为了结束性别歧视,消除对女性的压迫而进行的社会运动,以及为了实现这些政治目标而产生的文化和思想领域的革命。 [2] 国外学者认为女权主义大体上可分为:自由女权主义

（也称保守的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3] 即在国外女权主义流派当中影响最大的“三大家”。随着20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的发展，自由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中，对妇女解放的方向问题的探究逐渐显示出局限性，于是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当中寻找答案，他们借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异化等概念分析妇女受压迫根源与妇女解放实现途径，形成了带有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Marxist Feminism）。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是以性别作为切入点，并且使用女权主义的专门话语构建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基础分析研究妇女解放问题，或者以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进行探讨。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还“经常用来泛指任何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影响女性的理论学派”[4]。其师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19世纪其他的思想家的思想。而对后来受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等影响更多一些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学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二者虽有差异但只是强调重点上的差异，内容实质是相同的，并且有着共同的信念，即他们都相信“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动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5]。他们具有着成为一个派别共同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问题的具体思想）、共同的理论基础（女性受压迫有物质基础，这个现象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物）和共同的策略组织观点（女性是作为一个群体被压迫，独立的妇女运动有必要从其他社会运动中分离，性别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需要相互配合）。也有学者把二者划分为一个流派，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鉴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是他们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他们在考察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问题时的范畴和思路时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来源于马克思主

义；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善和发展这些共同点，并且二者观点也较为接近，本文中選擇把它们并列一起合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熟的对资本主义及男女生活中的阶级现实的女权主义批判。” [6]

[1] Nancy F.Cott,Feminism Theory and Feminist Movement:The Past before US,1987,p49—62.

[2] 肖巍.女性主义伦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3.

[3] C.A.MacKinnon,Feminism,Marxism,Method,and the State.in Sign,1983,vol.8,No.4.

[4]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5.

[5]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艾晓明.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1.

[6] [美]罗斯玛丽·海纳西.概念的设定.曾茗译，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1.

0.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作为当代国外一种左翼的社会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和女权主义思潮的结合的产物，既反映了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完善和发展，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女权主义的理论指导。女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经济理论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解放问题的同时，质疑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对于女权主义思潮的研究，同样，探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离开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一个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女权主义研究方面的进步。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性别这一独特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相关思想理论进行解读，同时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及解放的途径等进行探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盲点”进行修正补充，提出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理论上的研究和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学术话语的中国，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着特别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在理论上，首先，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的结合，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扬。本文旨在回顾马克思主义中的女权主义的发展历程，总结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建构，以及评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可以展示出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独特理论品质，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其次，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两学派当中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解放道路，又强调性别斗争的非阶级独立性，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问题，而且关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解放，通过深刻剖析女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及其对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私有制压迫起源论的质疑，更有普遍性、更广范围内地解释当代女性解放与发展问题。最后，通过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树和尚存的历史局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意义。

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和女权主义优秀理论，这显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导向十分吻合。结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梳理、观点评析以及与中国女权主义思想的殊异甄析，可以为中国新时期妇女解放提供实践理念。中国自从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相比于毛泽东时代，反倒下降了。从职场就业歧视、家庭暴力到媒体的不良引导，男性价值观的主导掌控着整个社会，许多新的问题出现在女性面前。女权主义在中国需要找到新的理论工具来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正确看待中国在女权主义研究和女性解放运动方面的正面和负面遗产，结合自身国情，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女权主义，把性别公平纳入到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创造更为公正、开放、平等的生存空间，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

0.2 国内研究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女权主义思潮中的各个派别进行介绍并探讨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综观中国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从最初的对原著和专著的解读以评介为主，到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进行归纳整理，再到本土化运用，经历了从介绍到综述批评，再到借鉴发展，进行本土化研究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2.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经典文献

对马恩原著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就妇女解放问题没有系统的论著，但并不表明他们忽视妇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都散落在其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以及在近百篇论文和诸多信件当中都有阐述。其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奠基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理解和解释妇女从属地位的一本开创性著作。……恩格斯所作推理的方法和方向，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全部观点和方法，也代表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立场。”^[1] 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用大量详实的历史和政治材料以实证主义方法证明妇女地位低下不是固有的而是社会生成的，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2] 探讨了妇女受压迫根源以及妇女解放的途径，强调“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3] 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4]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依

靠现代大工业”，第三个先决条件是“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5]。

《起源》一书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出现于1908年由刘师培等人主办的《天义报》上，该刊物16至19期合刊发表有《女子问题研究》一文，在文中首次提到了《起源》的中文译名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并对其内容作了简要介绍。 [6] 改革开放后随着女权主义传入中国，国内学界对恩格斯的《起源》做了大量的研究。有系统的女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学术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7] 从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关注逐渐增多。1995年何萍在《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妇女解放的观念变革》 [8] 从父权制角度探讨妇女解放。1999年戴雪红的《重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述评》 [9] 承认恩格斯关于妇女压迫和妇女解放的观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起点，但也分析了恩格斯没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角度探讨妇女解放和从未探讨过性别分工的起源问题两大不足之处。

2003年刘莉、王宏维在《重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回应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批评”》 [10] 中针对后现代女权主义代表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A.Mackinnon）对恩格斯在《起源》中的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关系、压迫起源说等所作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但同时还有许多历史因素共同造成了母权的丧失。2004年阎增武《历史哲学视野中的婚姻与家庭——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世120周年》 [11] 恩格斯在《起源》中的历史哲学的视角及其所阐发的基本精神，对世界范围内人的解放尤其是妇女解放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曾思玉《恩格斯的性爱婚姻观——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解读和思考》 [12] 指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体现出了恩格斯在性爱婚姻问题上的思想观念，解读恩格斯的性爱婚姻

观有助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性爱婚姻观，完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培养正确道德观念。2007年魏宏霞在《恩格斯与妇女解放——解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3]一文中认为恩格斯妇女解放的理论具有巨大的魅力，但是论述细节有欠具体，是生命体不在场的妇女解放理论。梁罡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两种生产理论及其价值探析》^[14]中则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理论价值和当代价值进行探讨。2011年王子涵在《恩格斯思想中的女性主义——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15]中指明恩格斯思想中的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基础，妇女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并没有占据太多篇幅，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女性解放运动的意义仍不容小觑。

2011年王涛《从〈共产党宣言〉解读马克思主义对妇女研究的理论贡献》^[16]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包括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以及人的解放等理论，既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上指导，同时也给予女权主义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指明了《共产党宣言》对女性解放运动的价值。2013年胡长兵《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7]认为在性别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各有其独特的学理阐释和制度构想，但作为关注性别平等的局部理论女权主义和总体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专著的解读主要表现在中国国内学界对其代表人物代表作的译介中。女权主义研究在中国国内学界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外国女权运动文选》，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简单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之后，中国国内学界对女权主义研究逐渐增多。199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收集的文章是国外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尤其是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占有重要地位，此书为中国国内学界开启了一扇了解和研究国外女权主义的理论之门。199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2001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王逢迎等编译的《性别政治》，其中收集了简·佛拉克斯、莎伦·马库斯、朱迪斯·巴特勒等人作品。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陈冬生翻译的英国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译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2006年东方出版社出版詹妮特·克莱妮编著、李燕译校的《女权主义哲学》等等。有些中国国内学者编著的著作也涉及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内容，比如，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肖巍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2000年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顾燕翎、林芳玫等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被誉为“本土撰写最完整女性主义入门读本”。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段忠桥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介绍了评析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有代表性的九种思潮，反映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矛盾及其发展趋势。200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银河的《女性主义》一书对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流派、女权主义论争和女权主义之后的思潮进行了评析梳理，是一本了解女权主义的重要读本。2007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李晓光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一方面阐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也阐明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妇女问题在理论研究上的不足，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自身也需要吸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200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担任主编秦美珠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本专门性著作，体现了中国国内研究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思考。201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戴雪红的《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了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中国国内学界了解女权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参

考。

- [1] [美]凯瑟琳·A·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C].艾晓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2.
-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6.
-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9.
- [6] 王健、潘光旦译注.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解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73.
- [7] Ya-chen,Chen.The Many Dimensions of Chinese Feminism.Palgrave:Macmillan,2011.p130.
- [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
- [9] 浙江学刊.1999(6).
- [10] 妇女研究论丛.2003(1).
- [11]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6).
- [12] 学术探索.2004(6).
- [13] 理论界.2007(10).
- [14] 西安社会科学.2008(9).
- [15]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3).
- [16]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4).
- [17]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0.2.2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归纳整理

0.2.2.1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

1997年王跃华、张国胜《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1] 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相互融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为了实现女性解放，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必须联合起来。2002年秦美珠《困境与选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走向》 [2]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为基础，阐述马克思女权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指出妇女获得解放才能有全人类的解放。王宏维《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解读模式》 [3] 指出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解读模式。叶苗《略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4]，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与家庭劳动、妇女与社会劳动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突破。2004年蒋欣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5] 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继承、修正和补充。2006年王淼《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 [6] 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对女权主义的深刻影响，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两个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流派。

2007年秦美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家务劳动的讨论》 [7] 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围绕家务劳动的探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2009年秦美珠《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幸福吗？——关于西方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反思》 [8] 对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进行反思，指出二者的结合不仅推动了女权主义的发展，而且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意义，还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董美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

义的继承发展》 [9] 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承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重要的指导原则。王宏维《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 [10] 指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贡献，也集中展现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某些特点和趋势。史巍、韩秋红《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思考》 [11] 中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意识、前提性问题、思维方式及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以使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获得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发展前景。

2011年陈英《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 [12] 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独具的阶级分析与女权主义独具的性别分析，两种分析方法在概念基础、批判意识、政治目标三个方面具有的对等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融合的可能性。朱国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及其影响》 [13]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思想给女权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促成一些女权主义思潮诸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的出现，并对中西方女权主义思潮产生重要影响。2012年王平《走向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14] 评析了在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里，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这一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探讨其理论转向及其未来走向。鹿锦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女权主义发展》 [15] 对南希·哈索克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女权主义思想进行探析，为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化开拓了新途径。2013年秦美珠、易显飞《女性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 [16] 中论述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潮的形成，并且表明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种既不兼容又相互需要的矛盾关系。鹿锦秋、付文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的建构逻辑》 [17] 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寻求从历史唯物论视域建构一种以劳动性别分工为逻辑起点的女权主义社会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0.2.2.2 两种生产理论和性别理论

2005年秦美珠《历史的误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18]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看到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法，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石，但是他们的二元对立观使得性别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结合并不成功。2006年王宏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19]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统一性、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性别与劳动分工、无酬家务劳动等进行了较专门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既具批判性和解构性又具建构性的理论见解。2009年赵家祥《澄清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误解》^[20]从多方面剖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的“两种生产”理论的攻击和歪曲，澄清误解，阐明了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真实内容。

2010年鄧玉玲《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关于性别平等理论的现代解析及诠释》^[21]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性别平等的研究包括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对性别平等展开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性别平等的理论所作的审视、分析、解构或建构两方面内容。2012年罗月婵《“两种生产”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2]指出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来探讨妇女解放问题，不失为探寻妇女解放之路的一种有益尝试。李赛、枫叶《一种误解还是一条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阈内两种再生产理论的再认识》^[23]论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存在误解的现象，使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走出困境，在澄明理论前提的基础上得以拓展。

0.2.2.3 父权制与资本理论

2000年戴雪红《性别与阶级——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诠释女性解放的两种角度》^[24]文章评介了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Marxist Feminism)、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 的相关观点,指出性别 (Gender)、反对父权制 (Patriarchy) 的性别斗争是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2001年戴雪红《父权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女权主义的理论透视》 [25],指出“父权制”是女权主义的中心概念,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父权制。2007年陈学明《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批判》 [26] 探讨了在西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众多著作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 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一书,指出该书从女权主义视角,用其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决定论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作出独到的判断。

0.2.2.4 妇女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2003年秦美珠、高雅珍《女权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困境与出路》 [27] 论证女权主义的社会平等观的局限,揭示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前提的女性解放的意义。2004年秦美珠、刘雅丽《政治解放:女性解放的前提与界限》 [28] 指出马克思在异化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辩证关系的框架中,揭示了女性解放的前提和意义,女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秦美珠在《试论马克思女性解放思想的哲学意义》 [29] 中指出马克思女性解放思想的意义是为女性解放提出了总体目标与总体思路。

[1] 国外社会科学.1997 (2).

[2]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2 (4).

[3] 学术研究.2002 (4).

[4] 江西社会科学.2002 (5).

[5] 求索.2004. (8).

[6] 甘肃理论学刊.2006 (5).

[7]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4).

[8] 学术交流.2009 (4).

[9]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2).

[10]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 (2).

[11] 学术交流.2009 (4).

[12] 吉首大学学报.2011 (5).

- [13] 理论月刊.2011 (11).
- [14] 哲学动态.2012 (9).
- [15] 妇女研究论丛.2012 (5).
- [16] 华东理工大学.2013 (9).
- [17]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 (5).
- [18]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2).
- [19]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8).
- [20]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5).
- [21]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0 (6).
- [22] 求索.2012 (7).
- [23] 社会科学战线.2012 (5).
- [24] 学术论坛.2000 (1).
- [25] 妇女研究论丛.2001 (6).
- [26]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1).
- [27]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 (3).
- [28]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 (3).
- [29] 兰州学刊.2004 (6).

0.2.3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本土化运用

中国的女权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作为理论支撑。这一点上，中国女权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思想资源。那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运用，就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通过结合中国文化背景、社会发展状况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1995年李小江《“男女平等”：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失与得》^[1]指出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被赐予的”权利的基础上，找回曾经“被剥夺了的”自主意识和自由选择的权利。2000年李小江又在《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2]中回顾了从1949年至1976年女性的“社会性解放”时期，从1977年至今的“女性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时期，中国妇女正在实现与现代化、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妇女运动的接轨。2003年施旻《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变异》^[3]指出女权主义与中国特定的文化相遇和碰撞，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是有着深刻的内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原因。王晶《对现阶段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4]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受到的挑战给予回应，对现阶段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

2004年6月，在复旦大学举行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以社会性别与妇女史的研究为主体，围绕百年来中国女权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衰发展进行热烈探讨，陈雁在《“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5]中对此进行了记录和评析。2005年李小江《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妇女研究与国际发展项目——兼谈本土资源和“本土化”问题》^[6]关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妇女研究问

题。何萍《中国女性主义问题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而作》 [7] 依据恩格斯的妇女思想，对近年来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女权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何平、吴风《“超级女声”与性别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 [8] 指出中国的“超级女声”表达出的自主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角度看来的积极意义。2007年畅引婷《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辩证整合及实践意义》 [9] 通过整合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资源，在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以推动女权主义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孙桂荣《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 [10] 则通过中国女性话语与西方现代女权主义的各种关系昭示我们自己的女权主义的“中国特色”。

2008年苗伟《中国女性发展与中华文化本体》 [11] 从人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深入考察中国女性发展与中华文化本体的关系，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女性发展和解放的出路。李燕《当代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西方到中国》 [12] 从西方的理论谈到中国的实践，在详细阐述女权主义当代形态的基础上，指明了中国女权主义起步和发展的关键。2009年王宏维《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13] 指出资本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国本土化发展受到的深刻影响。2010年宋少鹏《中国女权思想真的被西方理论绑架了吗？》 [14] 针对日本学者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一书提出的中国的女权思想被西方思想绑架了的隐晦判断，分析中国女权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2013年严静《“他山之石”的经验和审视——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建构的反思》 [15] 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经验进行反思，提出在中国语境下对于女权主义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的本土化建构。王丽亚《新中国60年女性主义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16] 回顾新中国60年来女权主义研究的历程，提出其中的问题同时探讨理论本土化前进面临的困境，指出中国的女权主义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还有博士论文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进行了研究探讨，比较突出的如2004年复旦大学秦美珠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女性解放思想——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献的解读，澄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误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基础上，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域，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

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虞辉的博士论文《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新探讨》论述了在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语境下，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朱丽叶·米切爾的四种结构分析、海蒂·哈特曼的二元制分析、艾里斯·扬的性别分工分析、阿莉森·贾格尔的异化分析、莉莎·沃格尔的社会再生产分析、马撒·吉梅内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特瑞萨·艾伯特的剥削分析等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分析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性受压迫问题和女性解放路径的新探讨。指出新的社会条件下女性的命运，揭示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的重要启示意义。

2010年东北师范大学史巍的博士论文《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终结〉的解读》以由美国的凯瑟琳·吉布森和澳大利亚的朱莉·格雷汉姆两位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合作撰写而成，以J·K·吉布森·格雷汉姆为署名作者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为文本基础，在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下揭示该书反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独特的现代性批判。

从研究综述可知，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进行了详尽的评介和系统的分析，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方面并不深入，总的来说仍属初级阶段以译介为主，理论还比较薄弱，尤其关于中国女权主义理论构建方面，理论本土化方面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而这正是我选择国外马克

思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方向进行理论梳理、观点评析和殊异甄析的目的，期望我的浅薄之见能够抛砖引玉，为中国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及对中国女权主义的构建尽一点绵薄之力。

- [1] 社会学研究.1995（1）.
- [2] 浙江学刊.2000（1）.
- [3] 理论学刊.2003（2）.
- [4] 人口学刊.2003（5）.
- [5] 妇女研究论丛.2004（4）.
- [6]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 [7]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6）.
- [8]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 [9]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 [10] 东岳论丛.2007（5）.
- [11] 天府新论.2008（2）.
- [12] 学习与探索.2008（2）.
- [13] 学习与探索.2009（4）.
- [14] 读书.2010（9）.
- [15] 晋阳学刊.2013（4）.
- [16] 江西社会科学.2013（8）.

0.3 研究方法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包罗万象。它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这种复杂性决定了本书采取多种研究方法。

第一，唯物辩证法。本书运用唯物辩证法是指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建构与建树等方面内容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坚持客观的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则、运动和发展的原则等等。

第二，文献研究法。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的三大派别之一。英、美、法等主要西方国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持有不同理论观点的代表人物，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产生、发展、理论究底、理论建构、建树与局限，都是在大量的著作文献基础上来进行研究的。本书在写作之前，研读了有关文献之后形成了一个框架脉络，之后大量搜集、整理和归纳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著作和资料，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整合，为本书的研究拓展了深度和广度。

第三，历史分析法。本书回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发展的演变，以及在中外女权主义殊异甄析中探寻中国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女权主义缘起、演变和发展。列宁曾经指出：“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1]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第四，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我们能够发现问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本书中主要是中外女权主义的横向对比，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发展演变的纵向对比以及中国女权主义历史发展的纵向对比。横向纵向对比灵活运用，从比较分析中得出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以及如何在中国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

[1]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

0.4 创新之处

第一，选题较新。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梳理、理论建树与历史局限的观点评析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的殊异甄析。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中国国内学术界尚无人对此问题进行系统地、专题性研究，尤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因此，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原创性。

第二，内容较新。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梳理、理论建树与历史局限的观点评析，在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殊异比较的基础上，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优秀理论成果，把女权主义问题作为重要课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通过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构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这样比较、吸收、借鉴的关系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的关系，这在过去的研究中是缺乏的。

本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系统地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发展演变、理论建构以及中外女权主义的差异，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以及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资源，构建中国女权主义的问题。由于研究能力和研究资料的限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于日后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正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为其经典之作《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所命名的一样，对于女权主义的探索，同样，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第1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究底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解放运动成功的社会氛围下，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以及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寻求新的理论基础的基础上形成的。继承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理论、阶级理论、异化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和人的本质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为理论框架的社会思潮。

1.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1.1 社会氛围的促成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女权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浪潮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陷于停滞状态，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形势历经动荡后逐渐趋于稳定并呈现全球化的趋势；政治运动也逐渐走向平和成熟。这时候，女性解放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显现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外黑人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给了女权运动很大的启示。女性和黑人间虽然有着性别和种族的差别，但是二者都受剥削、受压迫、受歧视，因为社会偏见而就业困难，即使有工作也是工资低、待遇差的工作，无法拥有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黑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民权运动激发了女性消灭性别歧视、争

取自由平等权利的强烈愿望。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运动，既为妇女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1] 于是在此影响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受到国外女权主义者的重视，她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来分析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妇女问题。在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解放途径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分析成果，产生了具有明显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女权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1] 转引自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53.

1.1.2 女权运动的推动

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对于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解放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女性受压迫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制度，女性要得到解放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行动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只有通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妇女才能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1]一些人则认为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由于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父权制在思想上的束缚，女性对自己依附于男性的劣等性别地位麻木接受。要想使广大女性认识到自己的不平等境遇，改变自己的处境，她们探讨了多种主张，尝试了多种做法，例如主张女性不要婚姻、不生育，摆脱家庭的束缚和丈夫的剥削；提倡女性不化妆、不追赶时尚潮流买名牌，不作为商品供资本主义消费；号召女性要团结起来对男性进行对抗，开展性别战争，通过改变女性自身个人领域的生活方式等措施向社会领域的性别歧视观念挑战，调动女性自身的积极主动性，结合各方面力量努力改变女性受压迫、受歧视、受奴役的不平等现状。

女权运动推动了女性解放问题的研究进程，女权主义各流派应运而生，根据各流派对女性受压迫根源及主张的不同，分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等。这些女权主义流派观点主张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目标是要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状况，认为公民的社会权利源于存在本身，而非源于社会地位，即“我存在，因此我有权利^[2]”。用两性间的平等取代社会等级和不平等，推翻男性统治。

[1] 转引自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64.

[2] 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45.

1.1.3 理论发展的需要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各学派代表人物都对女性解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第一部也是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权辩护》（1792年）中对女性受教育权和参政权的争取；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年）中对女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的抗争；再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1963年）中对女性要进入公共领域的主张等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学派在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扩展形成，而自由主义原则对国家的作用以及多元政治的理解本身就存在问题。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两性平等忽视两性的生理差别，要求女性变得和男性一样，处处以男性的规范为标准；要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父权制的前提下，靠女性个人自身努力而不是群体的力量获得和男性的平等；否认非性别形式的其他形式的压迫，尤其是阶级压迫的存在。激进女权主义则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也就是父权制对女性的统治；强调男性在家庭中对性和生育的控制，女性的再生产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现象。把女性所受压迫看作是普遍存在的、非历史的现象，由此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评。

自由女权主义因为在空泛地要求两性在政治上的平等，激进女权主义因为以激进的形式要求实现在实践中不可能的两性平等而使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要求突破传统女权主义的藩篱，为女权主义探寻新的理论基础，为女性实现全面彻底解放寻求新的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结盟，巴巴拉·艾伦瑞奇认为是因为二者有许多相似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都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看待世界，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女权主义者则努力消除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并且渴望利用社会变革的途径来使得性别不平等的社

会现状得到改变。于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为理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思潮产生了。

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它们在考察妇女受压迫根源和妇女解放途径问题时运用的思路和方法继承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理论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阶级理论、异化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和人的本质理论。

1.2.1 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也有着极为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见解。圣西门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关心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安全，这个社会才是合理的。妇女在政治上应该享有选举权参与政治；傅立叶提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这样伟大的思想；英国的欧文则企图通过实践来实现他的男女平等观。他认为婚姻使妇女成为男人的财产，主张婚姻自由。在他的试验村中创立了世界第一所幼儿园，以使妇女能够减轻家务劳动负担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并制定了男女享有同等权利、教育和人身自由的措施。但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限制，他们没能找到实现妇女解放的途径和力量，把希望寄托于个别英雄人物以及少数人的试验，求助于抽象的愿望、正义的道德。使这些天才的想法由于超出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水平而流于空想。但是他们的早期探索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局限，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揭露妇女受压

迫受剥削的根源所在，并且为妇女解放道路指明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妇女解放也必然要遵循其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建立于人类生产能力增长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基石，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性不平等问题，为妇女解放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恩格斯一人提出过这种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妇女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她们的社会地位是根据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我还认为他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并且，迄今为止这个论点是对现有资料的最好解释。” [1] 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试图发展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话语理论的亨尼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引起女权主义者的兴趣，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解放的重要知识。 [2]

[1]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2.

[2] 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4.

1.2.2 阶级理论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所谓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产生阶级要有两个经济前提：一是剩余产品的出现为剩余劳动的占有成为可能；二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出现产生了阶级。阶级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丧失了存在的条件，最终就会消亡。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认为妇女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和社会压迫，妇女要实现解放必须消灭阶级。

妇女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在女权主义当中颇受争议。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妇女受压迫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被视为重要的思想工具，为研究这一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阶级斗争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问题。因为私有制的出现使妇女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妇女之所以受压迫就是因为阶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尽管认同妇女这一群体存在阶级差别，但仍然独树一帜，坚持认为由于女性的双重阶级身份，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的划分观点对女性来说并不适用。在他们看来，女性的阶级划分可以有两种方式：既可以按照她们在经济上依附的男人所属的阶级进行划分；也可以按照她们自己的工作收入进行划分，这种划分方式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根据个人和生产方式的关系确定个体阶级类别的方式相类似。^[2]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更接近于无产阶级，争取妇女的经济利益就要改变妇女经济地位，消灭阶级，把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融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进一步补充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理论。他们认为，因为妇女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把妇女的受压迫问题放在社会再生产的体系中进行研究。艾里斯·扬认为阶级是一个有社会性别盲点的分析范畴，不能很好地解释妇女的受压迫情况，提倡从性别劳动分工范畴来分析，比之阶级分析，性别劳动分工能更好解释妇女的受压迫地位。

[1] 列宁全集[M]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

[2] [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6.

1.2.3 异化理论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异化的概念一般是指存在的个体与自我、他人及所指称的意义分离开来，被一种否定的、异己的或被统治的、被奴役的力量所进行的一种向对立面的转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学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 工人劳动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在自己的劳动中，工人体会不到幸福反而觉得不幸，不是对自己的肯定反而是对自己的否定，并非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摧残自己的精神和肉体。^[2]

异化有四种表现形式：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困境。造成异化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分工。马克思指出，因为性别和年龄的生理基础上的差别而出现分工，这种分工大多发生在家庭里，女性作为妻子受着丈夫的奴役，受着男性种种压迫、剥削和歧视，所从事的活动价值被贬低、被否定，成为男性获得成功的附属和工具。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相比，异化理论可以为女权主义系统地研究当代女性状况提供一个更恰当的理论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中实现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女性解放策略分析的更全面更

深入阐述。

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家的关注。安·佛尔曼（Ann Foreman）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对于妇女来说更为不利。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但异化对于妇女的生活和意识影响表现为更具压迫性的形式。男人通过与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关系” [3]。女人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生活中体验的不是自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破碎的存在，是为他人而生活着的、没有自主性的“他者”。

[1]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0-91.

[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3-94.

[3]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7.

1.2.4 经济理论

马克思认为，任何生产出来供销售的产品都是商品，任何商品的价值都等于工人在商品中投入的直接劳动和供工人使用的其他人工附属物等非直接劳动。商品的价值相当于工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工人用劳动力创造商品价值，工人的劳动力是可以买卖的商品，雇主支付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但是在工资和实际创造出来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差别，这个差别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就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交换关系制度，是剥削制度，是权力关系制度，一切事物在其中都有价格，包括人的身体。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过垄断生产资料的方式，对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穷苦工人的剩余劳动进行无偿占有。妇女不仅受到资本家对其劳动的剥削，还要受到不被承认的家务劳动的剥削。承受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性双重的奴役和压迫。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本斯顿在《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把家务劳动定义为生产的一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内部激起了长达十年的“家务劳动”争论，试图重新评估“家务劳动”这种“隐形经济”^[1]，以取代父权制价值基础的经济学。“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凸显妇女在家庭中所做的工作的重要一步，是探究其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的重要一步，也是评价其对实现社会主义或女权主义变革影响的重要一步。”^[2]莉莎·沃格尔提出“马克思的经济范畴理论为理解家务劳动和妇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确实指明了方向”^[3]。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和有偿化的主张体现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和社会雇佣劳动都具有被剥削劳动的共同本质。

[1] [美]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4.

[2] [美]谢丽斯·克拉马雷、[澳]戴尔·斯彭德主编.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C]

(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90.

[3] Lise Vogel.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1983.p69.

1.2.5 实践理论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所谓实践即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思想的重要立足点。

马克思的被称为“新世纪天才萌芽的第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心概念就是“实践”。马克思首先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实践活动沟通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从实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自然界的基本原因所在。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类历史形成过程中、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绝不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原始的自然界，即人类的生活主要是在人化的自然中进行的，实践是整个现实世界的深刻基础。现实世界又是一个随着实践不断发展和深化而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马克思还揭示了实践在历史观中的地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因为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导致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导致社会形态更替和转化的是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人们群众的实践活动，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不断进行着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也就是不断进行着的具有多种多样形式的社会实践。而作为马克思

墓志铭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 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以实践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标志。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热衷于对世界本质的终极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强调哲学向人的现实生存和生活世界回归的意义，主张哲学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即哲学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现则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思想在女权主义这里首先被当作一种把女权主义运动与其他的革命运动区别开来的方法，南希·哈特索克

（Nancy Hartsock）在《基本的女权主义：过程和观点》一文中指出：“提高觉悟的实践是女权主义方法中最鲜明的例子，它强调考查好理解生活经验，并强调把个人经验与决定我们生活的机制联系起来。”

[4] 当代女权主义者普遍认可：提高觉悟本身是一种革命的实践。同时，女权主义者还认为既然异化劳动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应该建立一种非异化的劳动概念，从而更好地反对妇女压迫。而要想真正给劳动重新下定义，只有通过实践。哈特索克提出，女权主义者要重新劳动，就必须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每个人要做的事情是：思考和行动、计划和日常工作；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女权主义者的实践形式不仅包括提高觉悟、重建劳动，还意味着建立非传统的社会机构。比如今天西方社会存在的强奸危机中心和遭虐待妻子中心等，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些作为反抗压迫的妇女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非暴力的革命活动，一种抵抗方法，一种实践形式，它们为女权主义者反对父权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正如安·佛格森（Ann Ferguson）和南希·福尔博瑞（Nancy Folbre）所强调的：“需要建立一种自我界定的革命的女权主义者的妇女文化，它将从思想意识和物质两方面指出妇女远离父权制。反霸权文化和有物质支撑的网络组织能为妇女提供与她们一致的、替代父权制性—爱的产品，从而使得妇女提高对她们身体、劳动时间和自我意识的控制。”

[5]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 [4]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7.
- [5] Ann Ferfuson Nancy Folbre.The Unhappy Marriag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A].Edited by Lydia Sargent.Women and Revolution[C].South End Press,1981:330.

1.2.6 劳动分工理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社会生活理论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中男女的自然分工是社会分工的基础，社会劳动分工的根源是男女的自然差异，建立在纯粹的生理基础之上。从古至今，历史上所有社会都具有性别劳动分工的特征，男性仅仅凭借其性别就享有比女性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想实现性别平等，妇女解放，只有发展生产力，消除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妇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他强调说，妇女目前的情况是：社会生产劳动排斥妇女工作，迫使妇女只能在家庭中从事私人的家务劳动，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那么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有满足妇女大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只是在业余时间从事家务劳动这样一个条件，妇女才能够得到解放。^[2]在恩格斯看来，女性只有从家庭劳动奴隶的身份中脱离，进入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作为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掌握和利用社会资源，不再是男子经济上的附庸，且与男子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分工，妇女才有可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和社会地位，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工理论为女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之所以在劳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是因为女性的母性原因，繁衍后代和哺育生命，为繁殖和抚育长时间地投入那种看不见的、被男人同时也包括女性在内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被社会认可的无工资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的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北美和欧洲的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运动，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工

作对于社会和经济运行的实践意义，更重要的是，强调妇女在家庭工作中的责任对于解释她们受压迫状况的理论意义。”^[3] 海蒂·哈特曼指出妇女所受的综合性的压迫：在家受家长制的压迫，在外受资本主义的剥削。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可归因于妇女无偿的家务劳动。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了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把她们当作产业后备军。只有通过在社会上给女性提供真正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家务劳动社会化才能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2.

[3] [美]谢丽斯·克拉马雷、[澳]戴尔·斯彭德主编.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C]（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9.

1.2.7 人的本质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在自然界的长期发展中产生。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

[1] 与此同时，人既是存在与发展中的社会存在物，也是社会劳动中的产物。“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性存在。” [2] 人不仅是自然和社会的存在物，作为人的又一属性来说还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3] 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有意识、有目的，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最逊色的建筑师在建筑之前头脑中也已经形成蜂房的设计轮廓，这就是他和最灵巧的蜜蜂不同之处。 [4] 另外，他还详尽阐释了人的本质、价值、自由和全面发展等思想。他认为人的本质包括劳动与社会关系总和两方面。其中，作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表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两性是平等的社会存在。经济是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决定因素，家庭关系并非是独立于社会生产领域的，而是整个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男人和女人都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人的本质理论对女权主义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南希·费尔斯通认为，妇女之所以受压迫处于从属地位，并不是自古以来的意识和观念，其实是长期以来妇女的工作都是无关紧要、备受轻视，从而使得社会和个人意识的改变引起的。无论是在家庭领域还是在社会生产领域，妇女和男人一样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的产物，家庭不是独立于社会生产领域的社会组成部分，同为社会成员的妇女，无论在家庭还

是在工作场所，都创造价值为人类社会发展做贡献，所以，妇女应该获得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应该享有自由发展的权利，全面实现自身价值。对于女性来说，享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利的意义在于：社会文明能够毫无异议地认同女性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让女性能够作为一个具有女性特质的完整的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6] 从以上理论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剖析了阶级不平等的现实包括妇女的受剥削和受压迫状况。并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其深刻的思想，完整的体系，理论的严密为女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继承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致力于结合社会现实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充实和发展。

[1]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4]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5]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6] 张一兵、郑晓铜、赵彦.中国妇女与婚姻家庭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121.

1.3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创始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关于妇女问题的系统的著作或文章，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妇女观是两位经典作家在其经典著作中对妇女问题重要论述的总结和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主要通过马克思的《论离婚法草案》（1842年）、《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1845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资本论》（1867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反杜林论》（187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著作以及近百篇论文和几十封信件（路德维希·库格曼博士、考茨基、拉法格）反映出来。其中，恩格斯依据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4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被视为是关于家庭问题和女性问题的著作当中的经典和权威。在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研究方法，探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尤其是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及妇女解放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著书立说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亲自参加当时的无产阶级斗争实践，密切关注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下的女工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际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密切的关注，并且把无产阶级妇女解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纳入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

在1844年9月到1845年初恩格斯根据深入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女

工的状况，写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的可靠材料论证了资本主义大量使用廉价女工的可怕后果。“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 [1]。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从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为出发点，开始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1868年，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博士的信中，阐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妇女社会地位的关系，高度评价了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他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2]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妇女解放，并把妇女解放纳入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很多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学说，对世界范围的妇女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1.3.1 妇女受压迫的基础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剖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学会畜牧和农耕”的野蛮时代、“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文明时代。 [3] 不同时代采取不同的婚姻形式。与蒙昧时代相对应的是群婚制的婚姻形式，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合的婚制，而如今的现代文明时代采取的是一夫一妻制。在家庭或有组织的配偶关系产生之前，存在着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 [4] 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各种血缘关系逐渐被排除了，有血缘关系者不再被作为合宜的婚姻伴侣来考虑， [5] “这一家庭

形式作为必然的最初阶段决定着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 [6]，近亲繁殖能够被有效避免，进而氏族的制度被建立起来。氏族是“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构成了当时“社会制度的基础” [7]，恩格斯认为，母权制的产生在于群婚，是指“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 [8]。但是，由于生产力逐渐发展，出现剩余劳动产品，社会财富逐渐增加，原始公有制逐渐解体，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同时出现了。私有制是“劳动及其劳动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平等的分配” [9]，私有制的萌芽逐渐出现在个体家庭中，“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为人类社群带来了全新的财富来源” [10]，男子懂得如何驯养家畜控制了财富，在家庭经济和婚姻生活中占有了统治权，“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 [11]。因此，可以说是私有制的出现使得氏族制度首次出现了缺口，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社会逐渐实行父权制，母权制则渐渐被废弃了。“母权制的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12]。在家庭里面，丈夫相当于剥削人压迫人的资产阶级，而妻子则类似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从此，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翻开了被压迫和被奴役的苦难历史。

[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21.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5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1.3.2 妇女解放的途径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探讨人类社会两性关系和性别压迫理论，从女性在家庭里面受奴役这一奴隶制现实出发，总结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的科学结论，奠定了妇女解放问题的理论基础。 [1]

1.3.2.1 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男性在家庭中能够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完全是因为他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经济控制权决定了男性可以控制家庭秩序。因为在社会大众观念里，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男性的劳动，而女性劳动所起的作用则是微乎其微的。 [2] 恩格斯指出：“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状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 [3] 家庭私有是最早的私有，家庭的奴隶制是最初的奴隶制。在家庭生活中，男子对财产的占有权保证他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妇女则被贬低、被奴役，丧失了参加社会劳动的权利，丧失了经济地位，从而丧失了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地位极度恶化，沦为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人。“用这种方法再次宣布了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的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4]。恩格斯指出，男人之所以能够统治女人，其根源在于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拥有和控制家庭财产。要结束妇女受压迫这一状况，只有在私有制解体之后才能实现。

1.3.2.2 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对现存的一夫一

妻制家庭的矛盾和本质进行了深刻阐释，“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5]。也就是说，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过程，同时也是妇女受压迫地位形成的过程。私有制确立后，男人在家庭中的家长地位也逐步得到加强。随着男人的私有财产逐渐增多，他们产生了要亲生的孩子继承自己财产的需求，他们要保证他们妻子的贞操以确保所生孩子的血缘。于是，对偶婚制发展到“一夫一妻制”。从观念上说，丈夫应该和妻子一样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父权社会并没有要求男人对婚姻忠诚。所谓的一夫一妻制便是男性对女性进行统治所采取的父权制形式。恩格斯评论说，在历史上，个体婚制并不是男女之间和谐友好关系的体现。与此相反，这种制度恰恰宣告了史前时代前所未有的两性冲突，是男性用来奴役女性的一种形式。 [6]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二个家庭形式” [7]，“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完全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结果” [8]。在家庭当中，丈夫是控制家庭财产的资产者，妻子是一无所有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者；在家庭外，妇女或者在工厂从事些可有可无的次要工作，或者干脆被社会生产排除在外，只在私人领域做一些无酬的家务劳动。因此，无论在家庭内外，男女之间的对立都是阶级对立。个体婚制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时也是一种退步，因为这种进步中男性的幸福和发展是以牺牲女性，用她们的痛苦和压抑换来的。 [9] 社会阶级对立和家庭夫妻间对抗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二者具有同步性。性别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妇女遭受的压迫本质上也是一种阶级压迫，只不过是其特殊表现形式。

1.3.2.3 妇女解放途径——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

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剥削和阶级压迫，出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压迫。所以，对于私有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欧文曾评价：“私有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

祸的根源” [10]。通过充分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恩格斯指出，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历史上妇女所遭受的压迫都是因为私有制，获得解放的首要前提是将私有制推翻。总之，妇女要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求解放，必须从源头上解决，也就是要消除产生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私有制。对于消灭私有制后的情况，恩格斯预言道，“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将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 [11] 他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私有制的确立，阶级压迫的产生，妇女开始遭受到性别剥削和压迫，所以，一旦私有制废除，剥削阶级灭亡，那么妇女受压迫和受剥削的社会状况也会随之而消亡。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 [12] 从根本上说，只有首先消灭了私有制，才能让女性获得解放。只有这样，女性想要获得其他权利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1] 全华、康沛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36.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

[10] 欧文选集.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

[12]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82.

1.3.3 妇女解放的条件

1.3.3.1 实现妇女解放的物质条件是发展生产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序言中提到两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1]。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这一有机整体，作为生产力的主体因素，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推动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主要力量。女性只有参加社会劳动，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才能得以真正解放。而这只能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才能办到。恩格斯指出，自从专偶制等家长制的个体家庭出现后，家务劳动就不再是社会公共劳动，而成为妻子在家庭中对丈夫的私人服务，妻子也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成为家庭的专职奴仆，现代化大工业为无产阶级妇女提供了参加社会生产的条件。^[2]妇女要解放，参加社会劳动是首先要决条件，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局限性，妇女缺少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机会。

只有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才能有条件容许和吸收大量妇女参加到社会劳动中来。由此可见，妇女解放由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二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为妇女解放创造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1.3.3.2 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3]，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受到恩格斯的极端重视。

他强调，男性一直垄断着社会公共生产领域的事务和劳动，而把女性排挤到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狭小范围内从事家务劳动，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实现妇女解放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这种状况，让妇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参加社会生产，只在工余时间从事家务劳动，才可能实现妇女解放。 [4] 在他看来，只有女性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公共领域中去，参加社会劳动，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更多地接触社会，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再以男子为中心，妇女才有可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和社会地位，才能得以真正解放。女性参加社会劳动具有积极意义，这表明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于男子、与男子地位平等的群体开始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女性在社会劳动中获得了劳动的机会，并不是男子经济上的附庸和私人物品，而是具有和男子一样的经济自主的能力，掌握和利用社会资源，这让女性能够极大地获得解放。女性的经济独立在女性解放中至关重要，女性只有参与社会分工问题，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1.3.3.3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

家务劳动从未被作为劳动来看待，在市场上也体现不出交换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女权主义评估家务劳动的价值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按照商品生产的逻辑来评估，只具有使用价值不具有交换价值，而且一边工作一边被消耗，工作的成果不能积累，自然也谈不上价值和被重视。而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也因此被忽视和被压迫。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恩格斯指出，家庭劳动的社会化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妇女的解放事业只能在现代大工业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因为现代大工业需要相当规模的妇女参与生产，这样就把大量的妇女从家庭中解救出来，并且努力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私人范畴的家务劳动也融入到社会公共事务中。 [5] 只有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逐渐提高，家务劳动的私人性也随之渐渐消失，作为社会劳动一部分的家务劳动和其他社会劳动都可以在社会中体现价值，区别只

在于不同的社会分工的时候，妇女的解放才有可能。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性不在于把女性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脱出来，而在于：首先，它能让人认识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必要性。有一项研究推测，与男性相比，英国女性因为有持家育儿的持续责任，而损失了其一生可能收入的一半左右。 [6] 前苏联经济学家经过计算得出结论：如果以社会化劳动形式取代家务劳动，社会要付出一年为1500亿卢布（人民币5000亿元）的工资，相当于雇佣一个亿的有酬工人。中国经济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如果为家务劳动付酬的话，每年要付420亿元人民币。其次，女性能够获得应得的尊重。只有每个人都意识到家务劳动的困难及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人们才可能重视女性，女性才有可能不被看作是受人供养的人。使料理私人家务和照料儿童等工作社会化，才能结束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所受的压迫。 [7]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0.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0.

[6] [英]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M].黄蓓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70.

[7]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7.

1.3.4 妇女解放与社会变革

对于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博士的信中写道：“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他们还对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考察，对妇女恶劣的生活状况和低贱的社会地位表达了莫大的同情，并多次强调吸收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因为她们一直以来受压迫受歧视受奴役，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革命的要求最彻底，不难成为运动的坚定力量。马克思还特别提到了巴黎公社的妇女在革命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培育出一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新社会。 [2] 1871年，共产国际采纳了马克思提出的一项新原则，即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妇女成为社会变革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马克思、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1.3.5 妇女解放的长期性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高度赞同傅立叶的观点“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1]。马克思指出,在这一论断中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被阐述得非常清晰:妇女解放包含于人类解放之中,是全人类解放的组成部分,妇女解放对于全人类解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只有妇女解放了,才能够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以及全人类解放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在马克思最早的一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3]。妇女解放正是在人类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普遍的两性关系上将人的平等关系还给人自己。人的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样,寓于人的解放过程中的妇女解放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4] 妇女解放既是妇女自身要解决的问题,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事业。只有实现占人类人数一半的妇女的解放,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文明的再现,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它必将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事业。也就是要把妇女从被压迫的社会地位中解放出来,进而使得她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诸方面与男性缩小差距,逐步实现完全平等。实现妇女的解放再到全人类的解放,最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终将得以实现。

[1] 马克思.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49—25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3.

[4] 全华、康沛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0.

1.4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实践者—— 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在于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石，那么列宁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把理论变成了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实践者。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讲道：“在一切文明的甚至最先进的国家里，妇女都处在被称为家庭奴隶的地位。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没有完全的平等权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首先是取消对妇女权利的各项限制法令，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充分地实现过劳动妇女的平等和自由。” [1] “能够把妇女从这种地位拯救出来的只有社会主义”。他在《伟大的创举》中谈到：“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内部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出的百分之一。” [2]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导下，列宁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提到，在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妇女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充分发挥妇女的伟大作用。“我们必须吸收城乡千百万劳动妇女参加我们的斗争，特别是参加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没有妇女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除非有千百万的妇女和我们在一起，否则我们就无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法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3]。

1.4.1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妇女解放提供条件

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中指出“俄国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受奴役的经济根源” [4] 在当时的私有制条件下，俄国妇女境况凄惨，“是最便宜的劳动力” [5] 遭受着榨取血汗的“最残酷的剥削制度” [6] 妇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俄国资本主义“社会对立的两极达到了最高的发展，资本主义一切黑暗方面仿佛都集中在一起了” [7] 只要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存在，这种现象就不会停止，这是妇女的悲惨命运。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改善妇女地位，推动妇女的解放。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废除了一切因私有制而造成的特权”的政权 [8] “只有当我们从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和共耕制的时候，妇女才能完全解放和彻底翻身” [9] 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实现妇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革命彻底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这是世界上过去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 [10]。

[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278.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289.

[3] 马列著作编辑部编：《回忆列宁》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9.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94.

[5]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86.

[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88.

[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92.

[8]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06.

[9]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78.

[10]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16.

1.4.2 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中，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劳动力供过于求，工人遭受失业生活困难。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1] 这解放的人们当中包括广大的劳动妇女，她们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的一群，她们最有革命的需求和潜力，在变革求解放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列宁指出“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2]，妇女具有同男子一样的能力，不管在革命年代还是平时时期，妇女都为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列宁分别做出阐释。他说：“妇女在战争条件下也能从事劳动，例如支援军队，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妇女应当积极参加这一切工作”。“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3]；在平时时期进行经济建设时，妇女也是功不可没的。列宁指出，“妇女还需要参加建立并照管试验性的大型经济工作，使这一事业在我们这里不至成为孤立无援的事业。没有大批劳动妇女参加，这一事业是无法完成的。”^[4]可以说，把苏联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妇女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4.

[2] 同上，第277-278页.

[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78.

[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93-298.

1.4.3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民主与法制在妇女解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资产阶级阶级的民主是充满了冠冕堂皇的词句、动听的诺言和响亮的自由平等口号的民主，事实上，这种外表堂皇的民主掩饰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掩盖着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1]。妇女受着双重压迫，即资本的压迫和处于“家庭奴隶”的地位，在法律上并没有真正实现男女平等。^[2]与此不同的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当中，“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扫除了法律上面男女不平等的一切痕迹，保证了妇女跟男子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3]“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保证妇女的民主地位……主要任务是要使妇女获得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4]“苏维埃政权比所有最先进的国家更彻底地实现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中丝毫也看不到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痕迹”，^[5]“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必须完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男女平权”。^[6]当然，列宁也认识到，法律的颁发只是使她们具有了独立的保障，要想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地位平等，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他强调“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也决不满足于只颁布法令。但是在立法方面，我们已做了使男女地位平等所应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有理由以此自豪。目前妇女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在最先进的国家看来已经很理想了。但我们自己认为：当然，这还只是开始”。^[7]

[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00.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89.

[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08.

[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08-309.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

民出版社，1978:295.

[6]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07..

[7]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95.

1.4.4 推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

列宁充分认识到妇女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各个社会领域发展都离不开妇女群众的积极参与。列宁在《致女工》一文中给广大妇女指明了实现实际生活中的男女平等的具体途径。他指出“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我们要使女工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都能同男工平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女工多多地参加公共企业和国家的管理”。“在管理中，妇女很快就会掌握业务，赶上男子”。他号召：“把更多的女工选进苏维埃去，不管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真正的女工，能有条有理地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是党员也没关系），就可以选进莫斯科苏维埃去。” [1] 列宁认识到，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妇女要做到经济独立，“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受到压迫”。 [2] 在《迎接国际妇女节》一文中，列宁还明确了今后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他说：“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使妇女获得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不要做家庭奴隶，不要永远把自己仅仅限制在做饭和照料小孩的圈子里（这会使她们愚钝和受人鄙视）。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3] 列宁还高度重视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推动妇女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中他提出：“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 [4] “社会主义为妇女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创造了优越条件，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 [5]

- [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06页.
-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95-296.
- [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09.
- [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55-256.
-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96、306.

1.4.5 倡导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妇女摆脱家庭的奴役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琐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消耗着她们的精力。”^[1] 因此，要想使妇女彻底摆脱这种做家庭奴隶的困境，只有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使细小的、个体的家务工作转变为大规模的公共经济，使妇女摆脱‘家庭的奴役’”，^[2] 必须“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3] 列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毫不华丽，毫不夸张，毫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4] 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5] 为实现妇女的解放铺平道路。

[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89.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16.

[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89.

[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89-290.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89.

1.4.6 支持妇女离婚，促成了新婚姻法的通过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分析了妇女离婚问题。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离婚法大多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被压迫的女性在经济上是受压迫的，因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妇女不管在任何民主形式下，始终是‘家庭奴隶’，离婚自由愈充分，妇女就愈明白，使她们作‘家庭奴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1] 在苏维埃建国不到半个月，列宁就赋予了苏维埃国家的妇女获得离婚自由的权利。“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上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完全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私生子、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利的法律”。^[2] 这项法律，是妇女受资产阶级的鄙视、压制和凌辱的根源。接着促成了新婚姻法的通过，从法律角度维护妇女权益。取消婚生子与非婚生子的地位差别以及种种政治限制，使得苏维埃共和国的妇女获得了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平等和自由。由于列宁对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视，不仅在理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且在实践中也积极推进妇女事业，使得苏联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之前的任何国家都是未曾有过和无法比拟的。为全世界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光辉榜样，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妇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41-242.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94.

1.5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者——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

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着手，通过独特的实践道路探索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解放的问题，阐述了女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及其实现解放的道路。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根据大量详细的纪实材料深刻分析了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提出女性解放思想的雏形。在其被誉为“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理解和解释妇女从属地位的一本开创性著作”^[1]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代表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立场，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随着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属性，尤其是在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中实现民族性转化和理论性创新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毛泽东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民族性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制度性转化。

1.5.1 女性解放的主体力量——女工或农妇

从社会历史条件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决定了其理论主题是回答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而不会是小

农经济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的农民问题。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女性解放理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工人阶级女性。他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城市女工阶层。他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3]显然，恩格斯把工人阶级包括其中的女性工人看成是最有前途的革命力量和依靠力量，这是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阶级状况与社会面貌与西欧相比判然有别：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与庞大的农业人口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弱小，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农民问题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直接性的实质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深入到各地乡村农户中，广泛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是从这一特殊实情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坚实基础。与此相呼应，生活在广袤乡村的农村妇女亦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主体，正是立足于中国妇女在城乡分布的实际考量，毛泽东真知灼见地提出了广大农村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这一指导性方针。

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对中国农村妇女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妇女的解放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妇女。农村妇女不仅是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也是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她们受压迫的状况决定了她们支持革命的彻底性。“农妇是妇女群众的一大部分，且她们同受一般农人们的生活压迫的苦痛，其操作那无报酬的长久劳动，是一般妇女群众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农妇运动与国民革命，有很大的关联”^[4]。中国农村妇女占中国妇女的绝大多数，她们是最积极彻底的革命参与者，如果农

村妇女不能获得解放，中国的妇女解放就无从谈起。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妇女始终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体。正如美国学者Tani E.Barlow所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的实践“改变了他们早期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从，欧洲妇女的模式被中国农村革命中的妇女所取代” [5]。毛泽东还深入研究了农村妇女解放的途径和方法，对农村妇女问题进行了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理论探索。毛泽东的女性解放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也给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解放事业指明了道路。

[1] [美]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78.

[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00.

[5]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68.

1.5.2 女性解放的前提——性别压迫问题

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时，恩格斯曾结合19世纪的欧洲社会提出过“两个同时发生”的著名论断，“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1]。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强调了阶级压迫同性别压迫的内在逻辑性，深刻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阶级性特点。他认为，发生阶级压迫的同时也发生着性别压迫，性别压迫是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的阶级压迫，女性要想获得解放必须要等到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之后，只有无产阶级首先获得解放，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显然，恩格斯在寻找解决女性受压迫途径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单独的社会性别视角，而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统合了性别压迫问题。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别盲点”，便成为备受西方女权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所诟病的话题。

其实，恩格斯以阶级压迫涵盖性别压迫的方法论并不代表马恩经典作家对性别压迫问题的忽视，相反，把性别压迫问题上升到阶级压迫层面，反而成为后来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性别压迫问题的思想先河。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上结合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阶级性特点进行了精辟概括。他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2] 但是，当他面对中国广大女性的特殊境况时，毛泽东并没有一概地到阶级压迫那里去寻求答案，而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别盲点”，从性别视角来分析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境遇。毛泽东将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具体化为“四权”压迫，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束缚中国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它们“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3]。这就既承认了在中国男性和女性遭受阶级压迫的普

遍性，又承认了女性遭受夫权压迫的特殊性；既在普遍性中区分了特殊性，又在特殊性中把握住了普遍性。中国女性受压迫不仅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还是封建宗法社会父权、夫权思想长期统治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深刻揭露中国封建宗法制度本质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女性遭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做出更加全面深刻的揭示，把性别压迫从几千年来被掩盖的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在恩格斯的女性受压迫的阶级分析中纳入了性别的视角，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的性别盲点，这就在继承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同时又开拓了女性解放思想的新境界。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4.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1.5.3 女性解放的条件——参加社会生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两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物质的生产和人种的生产构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生产力总和决定社会状况。这说明了担负着人类自身生产历史任务的女性和从事物质生产的男性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女性为生育抚育后代从事家务劳动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一直以来，女性的生养劳动和家务劳动被忽略，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2]，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女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3]承认两种生产的社会价值，并把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女性回归到社会公共领域中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分工，从而实现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恩格斯所提炼出的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条件。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旧中国，农村经济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女性都以家务劳动为主，很少参加家务劳动之外的生产劳动，女性劳动的特点不具有社会性。对于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和女性解放的“三个先决条件”问题，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妇女的实际，引导女性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实现由家庭奴隶向生产主人的转化。毛泽东在1940年给中央妇委写的信中指出，“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

渐同意了。” [4] 在搞苏区建设时期，毛泽东以“以生产为中心”积极组织号召广大妇女踊跃参加苏区农业生产，使她们在支援前线同时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让她们切实地从封建夫权的劳动奴役中解放出来。在《四三决定》中，毛泽东把组织女性参加生产提高到了工作方针的高度，并在《四八决定》中再度重申：“组织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是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保护特殊利益，争取妇女从封建残余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中心关键” [5]。毛泽东还强调，参加社会生产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女性解放和发展不仅受生产力的制约，还受到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纠正了“认为妇女参加生产就一切都会随之解决”的片面观点。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恩格斯的“参加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先决条件”观点的理解并不是机械的片面的，而是进行了新的补充和发现，丰富和完善了关于女性解放条件的思想体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2.

[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6.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300.

1.5.4 女性解放的基础——消灭私有制

“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一个著名论断。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得出私有制是剥削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也是女性遭受剥削、压迫和摧残的罪恶源头。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阶级剥削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只有废除私有制，女性才能摆脱受奴役与压迫的地位，获得彻底的解放。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消失，“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将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 [1]。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女性解放才有可能性，才能够真正实现两性平等。恩格斯有关女性不公的论述都突出了经济剥削，强调女性遭受经济剥削的困境是由私有制导致的，并且认为女性遭受经济剥削的状况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2] 从根本上来说，消灭私有制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基础。

基于对中国社会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并没有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因素，认为私有制不能完全解释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而中国社会中的“四权”才是造成中国女性深受压迫的社会根源所在。在“四权”中，“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 [3] 因此，对于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女性，应该首先领导他（她）们进行政治斗争来推翻地主政权，然后再进行经济斗争，以解决广大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4]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女性争取解放的道路是首先争取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在政治和经济的斗争过程中逐步解除族权、神权、夫权的制约和束缚。在女性解放路径问题上，他提出的先政治后经济的女性解放道路与恩格斯所论述的先经济后政治的解放道路迥然不同，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指导中国妇女运动以实现女性解放的革命道

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5]。毛泽东的“政治解放论”阐释了在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里，先进行政治革命获取女性解放的社会政治环境再争取经济及其他方面彻底解放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可行方案，这样就将女性解放问题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对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进行了唯物辩证的继承应用和实事求是的发展升华。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

[2]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82.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2.

1.5.5 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实现自由的婚姻

恩格斯把婚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分析联结起来。他指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1]“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2]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地位决定婚姻关系，爱情的基础是经济条件，大部分婚姻都掺杂着政治和经济因素，正如毛泽东对此所总结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3]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专偶制只是对女性的要求，对男人而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偶制。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才能够完全去除夹杂在婚姻中的经济因素，真正实现男女在爱情婚姻家庭中的自由和平等，人们才能真正享受到以纯正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

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关于婚姻制度与社会制度相关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把女性受压迫同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对婚姻制度和社会制度两者的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发生了新娘赵五贞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事件，毛泽东认为这一惨剧背后反映的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4]他指出逼死赵五贞的是封建礼教习俗，悲剧的根源在于封建的社会制度，只有推翻封建的社会制度，才能为实现婚姻自由创造条件。结合当时中国社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以及童养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

德”的伦理千百年来束缚和戕害着女性，使她们在痛苦中挣扎求生。只有推翻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废除传统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破除封建社会制度压迫女性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才能为实现婚姻自由创造条件。只有打碎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强加给女性的枷锁，坚决破除女性从一而终的禁锢，推翻旧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统治，才能使广大女性从不合理婚姻的束缚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在其领导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规定，为保护女性，男性要多承担离婚的义务和责任，并废除一切封建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枷锁，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5] 它使女性不仅获得了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而且能够和男人一样享有土地继承权。尤其对离婚女子土地权给予保障的规定，极大地撼动了当时农村宗族社会的根基，促使族权、夫权在中国社会迅速瓦解，有力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毛泽东认为阶级剥削是女性在封建婚姻中遭受经济剥削的根源，阶级关系在婚姻关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他指出：“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6] 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才能不再遭受人性的摧残，不再受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附加条件的影响，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和伴侣，才能在婚姻中具有和男人平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从而女性的解放才能够真正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全面地总结了中国人民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成果，并确定了新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该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毋庸置疑，毛泽东女性解放思想开创了妇女解放的新时代，使中国妇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
- [3]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422.
- [4]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414.
-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2.
- [6]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53.

1.6 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父权制

1.6.1 父权制的概述

父权制，也称男权制，家长制，英文patriarchy,词根patri是父亲，字面意思是“家长制”、“父权的统治”，所以，父权制是指由年长的男性统治的社会制度。历史上，农业社会或者早期的亚洲和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父权制，并建立在宗族关系的基础之上，女性从属于年长的男性，听从安排从事家族或者宗族的生产活动。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达到控制的目的，国家常常维护父权制的社会关系。

历史研究发现，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殖民扩张之前，欧洲主要是母系社会，由女性来管理社会事务，但是男性能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和法律决策，权力要比女性大。可见，母系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控制程度要远远弱于男性对女性的主宰程度。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也推动了父权制在世界上的普及。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和北美的女性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出现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女权主义关于父权制理论的研究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成为第二次浪潮中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了许多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也促进了女权主义系统地认识性别及其与其他社会类别的差异的关系，激励着各界的女性对社会性别不公的现象进行抗争。

父权制与指个人的世界观、态度和行为的“大男子主义”（male chauvinism）和“性别主义”（sexism）不同，大男子主义和性别主义一般泛指歧视女性的思想和行为，而性别主义包括各种性别差异的行为，范围更广泛。女权主义者认为，不能把大男子主义和性别主义与父权制划等号，否则容易导致认为两性不平等是个别男性而不是男性

这一性别群体的问题这样一种理解，而事实上，女性之所以受压迫，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必须改变父权制，才能达到真正的两性平等。

1.6.2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认识

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女性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的出现，而阶级制度起源于由男性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其现代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因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恩格斯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看作是男性对女性实施压迫的一种形式。一夫一妻制婚姻和现代核心家庭及女性的从属地位都与私有制和阶级制度的出现与发展相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能推翻父权制：“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恩格斯的关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的观点，拉开了理解性别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继承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同时也同意激进女权主义所认为的父权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的观点。但是她们认为激进女权主义者在提出父权制时，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对女性受压迫的现象进行分析。所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克里斯汀·戴尔芬（Christine Delphy）提出，不从生物关系而从社会关系来理解父权制，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反映了女性的阶级地位。妻子的劳动被丈夫无偿占有产生的家务模式和父权制模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并不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父权制的生产关系才是。所以，朱丽叶·米切尔提出，要结束女性受压迫的状况使女性获得解放，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双头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尝试着在唯物主义语境中使用父权制的观点。认为父权制是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对女性性行为和生育的控制以及通过劳动的性别分工导致女性经济上的从属地位。理论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父权制关系采取的是其生产关系所允许的形式，实践中资本主义的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表

现出由于所属社会阶级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冲突。

对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或者把父权制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继续的产物，有助于继续资本主义；或者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各自具有特点又互为条件的系统。总之，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反对父权制实质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女性才有可能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中获得彻底解决。

1.7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

1.7.1 结合的必要性

1.7.1.1 结合是对彼此片面性的补充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因为关注和强调重点不同，所以各有其片面性。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时，恩格斯曾提出过“两个同时发生”的著名论断，“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强调了阶级压迫同性别压迫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他指出，历史上压迫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同时，也发生着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妇女遭受的性别压迫其实质就是一种阶级压迫，是其特殊表现形式。妇女获得解放的前提是被压迫阶级首先获得解放。因此，妇女真正的解放就必须等到被压迫阶级解放之后才能够获得。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寻找解决妇女受压迫途径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单独的社会性别视角，而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统和了性别压迫问题。由此，形成了备受西方女权主义者诟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别盲点。而女权主义能够揭示男女关系的性别特征，但是却把这些特征投放到所有历史阶段，例如女权主义把父权制看作是单纯的文化形态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中，可以说对历史是盲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性别盲点，女权主义则存在历史盲点。

1.7.1.2 结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

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各自不同的需求和目的，二者互相结

合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理论，需要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它，用它的理论去影响更多的人，相比于其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压迫的现实，指明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道路，在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社会里是女权主义最好的理论武器；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入，人们对女性权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对女性的前途和命运有着更深的思索，而此时的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女权主义需要新的力量来构建女权主义理论大厦，为妇女解放找到解决途径。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逐渐显示出局限性，也需要女权主义能够结合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

1.7.2 结合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其实是同一类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主义是女权运动的思想，“正是由于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被认定为妇女运动的这一奇异的历史反常事物才看似具有了些许影响力。” [2]

1.7.2.1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具有共同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批判性地看待这个世界，都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和斗争性。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定的革命者，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绝不动摇的斗争精神，他们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革命夺取政权，实现人的全面自由与发展的号召；女权主义是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社会各领域之间的斗争，它的奋斗目标是要妇女和男性一样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无论是在妇女解放理论上还是在妇女运动实践中，都具有明确的革命性、斗争性和实践性，主张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以及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1.7.2.2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主张相同的变革方式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平等，只是关注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要实现阶级平等，女权主义则追求性别平等，二者都主张通过社会变革来实现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性别不平等的存在与阶级不平等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女权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而女权主义独特的视角丰富的理论也吸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保守和封闭的状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提供可能。

1.7.2.3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女权主义提供有力的思想

武器

女权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突破和发展，这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都认识到要实现妇女解放，摆脱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地位，就必须联合起来，取长补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就是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互相借鉴和扬弃的结果。作为国外女权主义中比较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和学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结合开拓了新的思路，女权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独特的研究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为女权主义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

[1] [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M].曲广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

[2] [美]琼·迪迪安.妇女运动.于晓丹译.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0-61.

1.7.3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的结合

1.7.3.1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权主义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严谨深邃的理论思想、完整有效的体系和方法，这些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理论优势对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不可替代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妇女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争取到了一些权利，但是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妇女问题，而此时的女权主义理论因其内容空泛或不切实际而渐渐不能满足需求，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支撑。这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进入到女权主义者理论探索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内涵和精髓被广泛借鉴和挖掘，并成为女权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石。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名著《妇女状况》（Women's Es-tate）中说：“我们应当提出女权问题，但要试图给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

第一，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通过对广大妇女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的实地考察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著名论断。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剥削和阶级压迫，出现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妇女要摆脱压迫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唯有废除私有制这一途径。

由于社会大分工，出现私有财产，男性因为在体力上的优势掌握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妇女则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导致

她们在经济生活中不得不依附于男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女权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私有制根源观点，指出私有制是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等剥削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海迪·哈特曼在分析了男性和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后，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在对家庭劳动力进行转移后增强了男性的支配地位，也更增强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在家庭中和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相互加强，恶性循环，越演越烈。 [2]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既认同此观点，同时也吸纳了激进女权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的观点。综合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私有制和父权制的双头兽是导致妇女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恩格斯的妇女压迫私有制起源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妇女压迫的起源问题。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只有消灭私有制。妇女要实现全面解放必须从经济上改变现状。

第二，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参加社会劳动。“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是恩格斯指出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女性参加社会劳动具有积极意义，这表明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于男子、与男子地位平等的群体开始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女性在社会劳动中获得了劳动的机会，并不是男子经济上的附庸和私人物品，而是具有和男子一样的经济自主的能力，掌握和利用社会资源，这让女性能够极大地获得解放。女权主义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主张妇女要回到社会公共领域中去，参加社会劳动，才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女性的经济独立在女性解放中至关重要，女性只有参与社会分工问题，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女性在社会生产领域就业，既是女性的权利同时也是她们寻求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和保障。女性参与就业能够提高女性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因为在社会上有份工作就有份收入，这样就不至于在经济上依附于人，从属于人。而且女性参与就业也能使她们打开视野，增长见识，而不是局限在厨房的封闭空间。 [3]

第三，家务劳动社会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女权主义评估

家务劳动的价值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女权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指男性为生产交换价值而进行的劳动，不包括女性再生产。在《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中玛格丽特·本斯顿指出，因为妇女从事的是不进入市场交换的家务劳动，所以被贬低和边缘化，这是妇女地位低下的物质基础。在对此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女权主义者指出，女性的再生产具有劳动价值，而且支撑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社会产生以后，女性被迫转向以家务劳动和人口再生产的劳动为主。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单位，男主外（社会）和女主内（家庭）的分工模式形成。家务劳动的技术低下、使人愚笨无知、眼界越来越窄等特性充分显示出来，并且逐渐成为女性禁锢自身和社会禁锢女性的手段。同样，家庭劳动使女性支配社会资源能力受到诸多限制。另外，家务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具有社会性的劳动演变为家庭内部的私人事务，女性从事的饮食起居、缝补、育儿等家务劳动，都是与家庭相关的活动。女性负责的家务劳动工作没有进入市场就直接被消费掉了。按照商品生产的逻辑，妇女所做的工作只具有使用价值，不具有交换价值，而且工作成果不能积累，通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而被认为是无价值的不可见的工作。

迄今为止，无论东西方，人们都未把家务劳动作为劳动来看待，家务劳动不是劳动，而是丈夫有权享受的服务。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却在市场上体现不出交换价值。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义在于使全社会能够对妇女在家庭中付出的劳动给予肯定，承认其重要性，从而提高从事家务劳动的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莉莎·沃格尔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减轻家务劳动的一个主要途径，要使之成为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妇女的任务。女权主义这些关于家务劳动的大讨论导致了70年代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等国的国际家务有酬运动。这一运动直到80年代渐趋消失，因为家务有酬虽然可以帮助确认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但是却会使得女性家庭主妇角色合法化，将女性囿于传统性别角色之中。

第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 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包括哲学、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社会的政治法律意识、风俗习惯等社会精神现象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吸纳了这一观点，指出之所以是女性受压迫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男性，需要分析女性劳动本质和在社会中的角色形象。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南希·费尔斯通指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其原因在于女性长期从事次要的工作造成了社会和自我意识产生了相应的改变而引起的，并非是社会或者个人原本就有的概念和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妇女除了在社会上工作作为男性劳动力的后备军外，还要在家里面从事伺候一家人饮食起居的家务劳动，永远忙不完，受着资本家和家庭的双重剥削，这样的社会角色永远把女性限定在从属于男性的位置上。

1.7.3.2 女权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借鉴意义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瓦勒里·布赖森说：“一切政治理论，如果忽略了女权主义思想，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片面的贫困的政治理论。”^[5]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同样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 回顾历史，

我们看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取得了很大成就，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善了女性的生产状况。但是从总体来看，女性的解放和发展问题仍不尽如人意。于是近年来，学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女权主义理论，对其进行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

1.女权主义丰富的概念内涵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其中，社会性别和父权制是两个比较有价值的概念。社会性别重视男女两性在生活上的差异，突出强调性别的社会差异要比自然差异更为重要。西蒙·德·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说明了这一点。女权主义研究者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的压迫问题的过程中，着重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男权制（patriarchy,又译父权制、家长制），指的是男人在物质基础上支配女人统治女人的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压迫妇女的双头兽，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父权制的社会历史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分析妇女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受压迫根源，突破了传统上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决定论和生产力决定学说。

另外，女权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实践思想进行充实和扩大。阿莉森·贾格尔强调异化可以用来阐释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它居于男女两性间的体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区别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指人类在为实现一定目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对客观物质世界加以改造的行为，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征。而女权主义的社会问题处理组织和机构也被看做是非暴力的抵抗活动或实践形式。总之，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父权制、异化和实践等概念内涵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2.女权主义广泛的学科和角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派别林立，观点主张各不相同，角度各异。激进女权主

义从生物学角度和激进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关注“性与阶级”理论，生态女权主义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妇女解放问题，并把女性研究引入各传统学科，使之增加女性分支，引入女性哲学、女性经济学、女性社会学等学科。女权主义还运用精神分析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结构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分析方法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在研究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时，女权主义并没有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经济和阶级根源，而是突破了这种观念，更注重研究妇女受压迫的非经济因素，补充了父权制、文化、种族、生理等方面。在研究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途径时，女权主义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的观点有所创新，提出了家务劳动工资化、加强女性教育、提高女性素质等主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相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性别色彩，克服了性别盲点，同时也使女权主义具有了历史维度，避免了历史盲点。女权主义者哈特曼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的结合比作婚姻，二者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1]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94.

[2]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1.

[3] 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07.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5]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1.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

第2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发展演变

国外女权主义理论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女权主义概念和女权运动的概念在根本上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只是前者具有强烈的理论性倾向，而后者更关注政治性策略，并借此介入社会生活中以追求女性权益。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按时间为划分标准的话，一般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也就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发展浪潮。第一次浪潮的女权主义指的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妇女运动，这次浪潮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妇女赢得了受教育权利、投票权和基本人权。第二次浪潮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女权运动，讨论女性受压迫的起源、本质及妇女解放等问题。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第三次浪潮从20世纪80年代活跃至今，也被称作后现代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运动从最初的受教育平等机会和政治权利争取发展到各种不同的诉求，思想理论发展也从最初的人权斗争、平等的启蒙思想扩展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也从女性身体、家务社会化、父权体系建构逐步扩展深入，从更广泛的范围来促进社会思想进步和公平和谐。在此过程中，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把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考察两性问题，形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第二次浪潮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早期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期70年代中后期；后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三个阶段从奠基、产生和发展都蕴含在女权主义三次浪潮中。

2.1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奠基）

时间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的主流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争取的目标是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的平等权，受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等，其中女性选举权是主要争取目标。

2.1.1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产生的社会背景

女权主义之所以起源于西方，与西方18世纪到19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关系。从“君权神授”到“天赋人权”，在新兴资产阶级用自然科学成果来抵抗宗教的黑暗压迫的背景下，由英国开始逐渐发展到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思想革新也对妇女的人权提出了质疑。在当时的欧洲，妇女地位极其低下，男性是其主人，她们要完全服从男性意志。中世纪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就开始对自身的从属弱势地位进行反抗。1792年，英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发表了第一部女权论作品《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被称为现代女权主义最早的宣言。沃斯通克拉夫特批判了卢梭的女性观，主张女性应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她认为，男女本身是没有差别的，之所以女性地位低下，完全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后天的环境和教育造成的，贵族对女性所谓的教导就是要将女性培养成为附属品。所以女性要接受教育，提高女性素质，摆脱受男人奴役，享有和男性平等的人权。另外男女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两性地位平等，社会才能够进步和发展。可以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主张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基础，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正为了女性能够接受同男性一样的教育和从事同男性一样的工作而斗争。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出

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最早为争取妇女权利和为她们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呼吁的女性之一。她“为我这个性而非为我个人”大声疾呼，指出“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大部分斗争都是由我这个性别所处的受压迫状态引起的”。面对所处时代女性从出生起就遭受压迫，得不到教育的社会状况，她奋笔疾书，先后出版了《论女儿的教育》、《关于教育的思考》《玛丽，一个故事》、《人权辩护》、《女权辩护》、《法国革命起源与进程历史综览》等，把法国大革命主张的人的权利扩展到女人的权利，迈出了关键而意义深远的一步。

19世纪女权运动的“圣经”则是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穆勒认为压迫女性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作为19世纪著名的女权辩护之作的作者，为女性受压迫而抗议的男性，穆勒深受妻子哈莉亚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影响，认为自己有责任发出“一个针对现行婚姻法的正式抗议”，因为它赋予了男性“合法控制婚姻另一方的人身、财产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丝毫不考虑女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

解决女权问题的角度是从社会进步的需要，他主张赋予女性选举权和参政权，维护妇女法律权益。穆勒认为，妇女之所以从属于男人，这是强制压迫的结果，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妇女的天性。“所谓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智力差别，不过是他们在教育和环境上的差异的自然结果，并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别，更不必说极端恶劣了。”^[1] 女人是婚姻以内的奴隶，家庭是“内部奴役”制度的核心，女性所受的教育就是让压迫女性的制度永远存在下去。穆勒批判男性自小不凭借任何本事就可以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现象，积极主张男女两性平等，批判各种歧视和压迫女性的现象和思想，认为女性参政是历史发展的趋势。1866年，穆勒向议会递交了女性的第一份选举权请愿书，并提议对1867年通过的《改革法案》做出有利于女性的修正。

[1] [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女权辩护、妇女屈从地位[M].

王溱、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04.

2.1.2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主要目标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主要目标是争取女性选举权，以及女性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为女性争取在婚后不受丈夫虐待，保有财产权；为女性争取儿童抚养费，争取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强调家庭价值和女性道德水平，反对卖淫。虽然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后期，女性在争取政治选举权、平等受教育权和平等就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20世纪20—60年代曾经出现了女权主义运动停滞。之所以会出现停滞，是因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把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问题上，要为妇女在政治上强大力量后争取其他权益。但是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女权运动就失去了斗争的方向，这个错误是策略性的错误。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这些因素使得女权运动也走入低谷。人们发现，以争取选举权为主要目标的旧女权运动并没有带来男女事实上的平等，现实生活中暴露出来的女性问题更多更复杂，要想真正实现两性平等，必须改变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2.1.3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奠基

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为当时的妇女附属地位鸣不平，争取两性平等的权利，批判当时的婚姻、家庭、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体制。他们指出，一个社会要实现性别公正，必须在政治参与权利、经济发展机会和平等受教育权利上给予女性和男性一视同仁的对待。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主要还是社会改良主义，是在承认现有的政治法律制度下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参政权。这些女权主义先驱者的思想激励了当时的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在欧洲很快传播开来，19世纪末，在一些起步比较晚但动员范围广的北欧国家，如瑞典、芬兰、挪威等地，广泛开展了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这些国家的女性在20世纪初就获得了法律上平等的政治权利。^[1]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还未产生，但是其奠基却已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主要有美国的C·吉尔曼、E·古德曼、英国的E·潘克斯特等人。1910年8月，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世界和平以及保护妇女儿童权利，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八小时工资制度。会议由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领导召开，她还倡议把每年的三月八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争取权利和解放的斗争节日。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德国著名社会主义革命家。曾担任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倡导者，被称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是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象征。她认为，女性解放是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解放同全人类解放一样，最终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她坚持阶级利益高于性别利益。

^[1] 周乐诗.女性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33.

2.2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早期和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时间是196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在这次浪潮中，运动的目标、策略和过程都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改变，他们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专门学派来探讨。就是在这时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并得到发展，与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三大学派成鼎立之势。

2.2.1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产生于新左派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生了席卷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学生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妇女运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就产生于新左派，女性反对新左派的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拒绝充当附属品。可是说女权主义“它在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内部，成为一种对战后时期国家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深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激进挑战。”^[1]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也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要求给予妇女除受教育和参政权外，包括家庭、工作、生育的控制权等一切生活领域的全部自由。妇女的“解放”，意味着集中关注妇女心理状态以及把妇女从以前界定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已延伸到了对男性决定的文化和知识的批判。^[2] 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理论在经济上争取平等工作权利，要求独立的经济地位；政治上要求参政权；文化上要求社会承认女性有同等贡献，全面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了挑战。

在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中，有的女权主义者向有着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寻求女性问题的答案；有的女权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

和范畴结合自己的表述；还有的女权主义者用自己的见解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女性问题，形成自己具有特色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女权主义的一大学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了。在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次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为早期、中期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探究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原因，讨论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工资化问题；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主要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探讨妇女问题。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开始时，女权主义曾经相对地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沉寂被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打破了，这一巨著被后世称为“女人圣经”，它使得女权主义运动得以复活。这本书结合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知识来分析女性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之后一直影响着女权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观中如何看待父权制问题。她指出，“第二性”不仅仅指女性在社会地位和权力上与男性不同，而且含有女性是“次等族类”的意思。在父权制文化下，女性永远是次等的。《第二性》突出表明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它说明了女性作为客体而不是作为主体，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女性能否解放，主要取决于能否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因为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所以女性为了生存就要取悦于男性，将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女性自身的行为准则，处处以男性为中心，屈从于男性，把自己变为客体。波伏娃指出，是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文化体制压迫着女性。她提出“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3]波伏娃在结论部分引用马克思的话进行了说明：“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

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4] 她告诫广大女性，不要幻想着男性来解放，能指望的只是女性自身。她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职业妇女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这句名言，对女权运动的再次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波伏娃构想出一个“独立女性”的形象，拒绝接受男性强加的意志，摆脱女性气质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她反对男性出于束缚女性的目的而主张女性具有特殊品德的“女性化”的女权主义，认为对女性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强调自己是一个女人，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她很支持日渐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MLF），她说：“在我们梦想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前，为妇女的实际地位而斗争是必要的……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平等也尚未实现，因此，妇女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女权主义者。1908年出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自传、小说以及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

[1] [美]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J].周穗明译.世界哲学, 2009(2): 40.

[2] [美]谢丽斯·克拉马雷.【澳】戴尔·斯彭德主编.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C](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273.

[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66.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827.

2.2.2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到歧视和压迫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是因为社会并没有实质性地认可妇女的家务劳动，没有赋予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应有的价值，而不是因为生理的、文化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女性地位低下的症结在于依据性别而实施的劳动划分。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加拿大的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意大利的玛莉亚罗莎·达娜·库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对此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玛格丽特·本斯顿在《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1969）中提到，家务劳动历来都是妇女的任务，即使外出工作的妇女也要兼顾家务，实际上是做两份工作。只有在她们完成家庭内的首要任务之后，才能够被允许加入社会劳动力队伍。这种情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尤为明显。而且即使妇女能够加入社会劳动力队伍，也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自由和解放。虽然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平等就业是妇女获得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只要家务劳动依然是分工给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担负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重担。 [1] 本斯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具有“物质”或“经济”的性质，家务劳动构成了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使资本主义能够把她们作为产业后备军。要改变妇女地位就要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义并不是在于使妇女从中解脱出来，而在于它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家务劳动的困难程度以及必要性，从而认可家务劳动的劳动价值，不再歧视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使她们得到应有的尊重，结束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所受到的压迫。

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玛莉亚罗莎·达娜·库斯塔和赛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则提出家务劳动计

酬的观点。她们指出：妇女的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这个生产性不仅体现为人们口头上所说的有用性，而且也严格地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创造剩余价值。 [2] 进入公共劳动中的妇女从事的是双重劳动，妇女的劳动是男性劳动的必要条件，但却是不被承认的和没有报酬的。要想结束这种不平等的途径就要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对于家务劳动工资化，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为了消除社会性别分工，那么家务劳动工资化则会阻碍此目标的实现，因为长此以往更将女性限定在家务劳动这项工作上，女性价值永远与家庭和家务劳动价值联系在一起。本斯顿等人看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也存在着一致的地方：即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仅仅因为男性的公共劳动，还包括女性的私人家务劳动，而这种劳动正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中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以及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论述，指出生产的社会性决定阶级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劳动的性别划分引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划分观念提出了挑战，她们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家务劳动工资化的观点被称为家务政治经济学。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的家务劳动是一种经济性的资本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做出直接贡献。没有女性的家务劳动，就不能产生资本生产的利润，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而女性长期从事不被社会承认价值的无工资的家务劳动，使得女性在劳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原因。但是，性别分工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产生。为什么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从事家务劳动？为什么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充当劳动力后备军处于从属地位？所以，不管是根据自然性别进行的劳动划分还是所谓理所应当的必然结果，两种观点不但在理论上是偏颇的，而且在实践上也不能促进女性的真正解放。因此，他们要寻找关于女权主义的新的解释。

玛格丽特·本斯顿 (Margaret Benston)，加拿大女权主义理论家。西门菲沙大学妇女研究教授，温哥华妇女研究协会与妇女小组的创始人。西门菲沙大学为纪念她的学术贡献，以她的名字成立了玛格本斯顿中心 (The Maggie Benston Centre)。本斯顿的研究方向是女性主义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撰写了多篇论文：《妇女的声音/男人的声音：作为语言的技术》(1988)、《女性主义与系统设计：控制问题》(1989)、《女性主义与科学方法的批评》(1989)。其中，1969年发表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根源是妇女的无酬家务劳动。与另一位加拿大学者佩吉·莫顿 (Peggy Morton) 之间的争论掀起了关于家务劳动的十年论争。

玛莉亚罗莎·达娜·库斯塔 (Mariarosa Dalla Costa)，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帕多瓦大学政治科学学院政治社会学教授。与赛尔玛·詹姆斯 (Selma James) 合著《妇女与社区的颠覆》，继续了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根源是妇女的无酬家务劳动的探讨，使本斯顿掀起的家务劳动论争更进一步。

[1]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Monthly Review 21, no. 4. September 1969, p21.

[2] Mariarosa Dalla Costa. Selma James.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Bristol, England: Falling Wall Press, 1972, p34.

2.2.3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的中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上的辩证统一。他们认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理论上的辩证统一演变出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他们看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因为过分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因素，所以忽略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双头兽所起到的作用。

父权制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于社会学，从理论上讲它意味着“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父亲就是家长。”^[1]从广义上讲，父权制指的是父亲占主要地位的一种社会；从狭义上讲，父权制是家长制，通过父亲一方来确认子嗣和家庭关系的一种社会组织。父权制英文译成patriarchy家长制。1969年，美国著名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ite）在其著作《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中第一个开创性地论述了父权制理论。在她看来父权制是政治、经济和思想结构，特别是心理结构所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作用在于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结构和心理结构。一些按照所谓天经地义的权利行使支配权的集团逐渐在消失，而另外一种久远而又普遍的容忍一个集团按照天经地义的权利去统治另外一个集团的格局，则在两性之间被遗留下来。这种格局要比阶级分化、种族隔离更牢固、更持久、更严峻。^[2]“父权制”这一术语成为女权主义解释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根源的主要概念，成为男性统治女性的代名词。推翻父权制，争取两性平等也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奋斗目标。^[3]激进女权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著作《性的辩证法：为女权主义革命辩护》（The Dialectic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1970）中认为，生物性的父权制根源存在于两性的生殖关

系中。女性由于承担生育职责而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女性解放需要进行生物革命，只有利用现代科技把女性从生儿育女负担中解脱出来，才能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

恩格斯对父权制的阶级分析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的基础。“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4] 恩格斯确定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关系，为女权主义探究资本主义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各具优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试图把它们的精华综合起来，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其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纲领性文件——1969年发表于《新左派评论》中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Women:the Longest Revolution）一文中对论述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提出理性批评，指出其不足。相对从生物关系来理解父权制的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从社会关系来探究父权制，得出妇女的受压迫地位是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共同作用而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激进女权主义父权制概念的普遍化和缺乏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尽管父权制是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要想深刻理解父权制就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同样，要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也离不开对父权制的研究，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实施了对女性的压迫。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只有父权制能够解释为什么是女性被排除在社会主要劳动力之外被男性奴役。海蒂·哈特曼问：“如果说消灭劳动者地位的差别，使所有劳动者在市场上一律平等是纯资本主义理论的倾向，那么妇女为什么要在劳动力市场中甘居男人之下？”她指出，这正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5] 因为在父权制社会女人附属男性存在，男人有权力限制女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社会中的性别分工更加强了。这样妇女即使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的也是低工资的工作，妇女依然要依

附男性生存。如果说男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资的奴隶，那么女人就是奴隶的奴隶。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压迫地位低下，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互相影响、互相结合的作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父权”（capitalist patriarchy）或者“父权的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父权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父权制资本主义不仅使得妇女受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而且导致了新的女性生活异化。阿莉森·贾格尔在《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异化现象。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异化包括同自己的身体、生儿育女、母亲职责甚至是精神智力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结构内，使妇女与所有人、所有事甚至她自己相异化，就是对妇女进行压迫的最有力的证明。要想消除对女性的压迫，就要消除对女性的异化。要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就要向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挑战。只有消灭父权制资本主义，才能有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只有深刻理解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从而找出有效改变妇女解放的途径。

女权主义者盖尔·卢宾（Gyle Rubin,1994）指出：“如果不了解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与新左派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间既亲密又冲突的关系，就难以理解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女权主义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女权主义思想也承袭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使人们能够提出一整套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6]

[1] [德]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刁承俊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30.

[2]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7-38.

[3] 戴雪红.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观点和方法[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206.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7.

[5]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49-73.

[6] [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艾晓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56.

2.3 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2.3.1 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

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因为这一次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通常被称为“后女权主义”。在英国，被称为“新女权主义”，在澳大利亚，被称为“DIY女权主义”或者“X代女权主义”（Generation X,即出生于1966—1976年的一代）。原有的女权主义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一方面是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挑战，批判西方女权主义存在种族主义倾向；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对女权主义思想的冲击。同第一次、第二次浪潮中女权主义相似的是她们关注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但更关注赋予妇女个人的权利。与第二次浪潮中主要关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和“个人的政治”的观点不同，第三次浪潮中女权主义包容性更强，涵盖了不同的种族、阶级甚至是不同性取向的女性，既能代表全体女性，又能考虑到女性的个体差别；明确女权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必须建立在个人和实体反抗压迫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并能和男性以及其他反抗压迫的群体统一阵线、结成联盟，理论和实践能够做到相结合，使女权主义理论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能够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妇女能够得到“所有应有的权利”。^[1]

[1] [美]朱丽亚·T·伍德.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和文化[M].徐鹏、尚文鹏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57.

2.3.2 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中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因为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被称为后女权主义，与之相对应的，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这次浪潮中显示的力量比较强劲，主要代表人物有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米切莉·巴雷特（Mitchele Barrett）、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英国学者朱丽斯·汤申德把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为强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和弱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两类。区分强弱标准是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比较紧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虽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提出批评，但是态度比较温和。与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所不同的是，若有若无、若即若离则是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她们既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又不想割断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之间的脐带”。^[1]与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女权主义中充当有力思想武器不同的是，在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中马克思主义遭到批判，在妇女解放中并没有起到理论上的指导，反而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某种程度上是用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别盲点进行补充，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质疑、否定甚至颠覆。

2.3.2.1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对待女性问题上的性盲

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性盲”（sex-blind），因其具有强烈的男权或父权中心主义色彩而忽视女权主义问题。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 指出, 虽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妇女被压迫的状况, 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与社会公共领域里, 男人和女人在地位上和境遇上的差异。也就是说没有人关注女人被压迫成一个女人的过程和原因。 [2]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其他都是从属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仅仅从经济角度进行探究。马克思主义认为, 妇女之所以受压迫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本身, 只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自然能够实现妇女解放。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涉及了妇女问题, 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并不包含女权主义问题。

2.3.2.2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对待女性问题上的自然主义

马克思主义用自然主义态度看待妇女问题。在这一点上, 和马克思主义通常是从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考察问题是相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分工是根据男女的生理体质而自然形成的, 男性在社会上工作, 女性就应该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这是由男女自然生理状况决定的。很明显, 根据马克思这一比较资本主义扭曲的标准, 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女人在家做家务, 男人则外出工作, 女人即使在工作时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她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扮演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而男人则不同, 他们在外出工作时是工人, 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人类。 [3] 因此, 当马克思主义以自然主义来定义女性时, 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便被掩盖了, 这样的话, 妇女的从属地位也就变成了合法。

2.3.2.3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对待女性问题上的普适主义

马克思主义用一种普适的利益牺牲了妇女的利益。马克思发出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代表全人类, 它的整体利益高

于一切，任何对整体利益的分化都会影响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功。而女权主义则从自身的解放和自身的权益出发同男性压迫和剥削女性的行为做斗争，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这是女性对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分化，是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离是搞分裂，是绝对要不得的。莫尼克·威蒂格指出，马克思主义可以用劳动分工来掩盖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阶级矛盾，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亲子般的自然而然的的关系，这种理所当然的性别秩序使得女性意识到自身阶级属性的机会微乎其微，自然也就很难在一定时期里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团结在一起。 [4]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维路径的支配下，妇女永无可能争取到自身的利益，实现自身的解放。

[1] 周凡等编译.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66.

[2] Stuart Sim (ed.) ,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158.

[3] 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4] 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6.

2.3.3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挑战二元论的思维模式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论认为，只是靠观察被压迫者的生活并不能获得造成这种被压迫现象的原因，必须批判性地考察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机构以及为其服务的研究性学科的思维方式。唐娜·哈拉维的女性主义立场的思想就开始体现在她对历史和传统文化传统的兴趣中。

2.3.3.1 唐娜·哈拉维的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批判框架

唐娜·哈拉维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她著名的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本的《赛伯宣言：1980年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985）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批判框架，实现了对二元论的挑战。她想象出一种电子人cy-borg,一部分是有机组织的人，一部分是机器，二者合成的“半机器人”。把这个cyborg作为重新构想这个世界的工具：“一个忠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讽刺性政治神话。” [1] 这种神话对克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有帮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哈拉维的观点影响很深，她明确否定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她认为，西方传统中的二元论传统造成了对女性、有色人种、自然的统治。Cyborg身份是从“二元论迷宫” [2] 中突破出来的一个努力，是一个“人们不害怕与动物和机器联合起来，不害怕永久性的半人身份和冲突立场”。 [3] 的美好世界。Cyborg是人的身体和机器的结合，使人类的身体与机器的范畴模糊不清，而其他西方二元论的界限也模糊不清起来：“自我/他者，心灵/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真实/表象，整体/部分，中介/资源，创造/被造，积极/消极，正确/错误，真理/幻想，总体/局部，上帝/人类。” [4] Cyborg打破了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很多女权主义

者认为哈拉维的这种人类身体与机器的混种与超越疆界和二元对立的能力，对于在传统和现代主义的等级制的二元对立中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有着解放意义。

2.3.3.1 唐娜·哈拉维对二元论批判的问题

女权主义哲学家苏珊·波尔多认为哈拉维在对二元论提出批判的时候，她的立场使得女性的角色消失了，而这一角色是有具体指涉的；另一方面，哈拉维的Cyborg形象对女性的物质存在的现实给予了否认，而女性这一形象的退缩对现存白人男性结构的利益反倒是有利的，服务于他们的权力的再生产。对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黑人还是白人的二元划分来说，都是对每一个人有着深远影响的社会建构；每个人都无法做到性别中立，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当前的性别关系体系的运行中，我们的获得都是被编码为“男性”或者“女性”的。

哈拉维的Cyborg形象是有着隐喻的，它是对各式各样以前在现代的思维模式下二元对立两极的模糊界限的隐喻，是一个混血的结合体。哈拉维超越了二元对立的生硬从而进入了“女性男人”（Fe-male Man）的世界。“女性男人”象征着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认同逐渐模糊的现代人。她在与后现代的碰撞中对模糊性的未来给予拥抱，并把这种前景命名为“异质的福祉”。 [5] 哈拉维的Cyborg形象提供了一个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世界里人们自主表现身体的新视角。这并不是说人们超越了自身的身体，而是说明身体正成为权力的焦点。哈拉维的观点唤醒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开辟了一个女权主义—后现代理论进入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空间。 [6]

[1] Haraway, Donna,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Linda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190.

[2] Haraway, Donna,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Linda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223.

[3] Haraway, Donna,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Linda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196.

[4] Haraway, Donna,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Linda Nicholson (ed) ,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219.

[5] [美] 乔治·麦尔逊.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M]. 李建会、苏湛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15-119.

[6] [美] 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 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C]. 章燕、李自修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530.

2.3.4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性解放问题的重新解构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运用后现代主义话语系统及其批判手法，在重新解构同一性、二元论、宏观研究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后现代话语表述的差异性、多元论、微观论证等方面，重新说明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女权主义的主体、女性气质、女性经验、性等问题。

2.3.4.1 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角度考察，认为是女性处于受压迫的从属地位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对此，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提出质疑：如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女性受压迫受剥削，那么资本主义存在之前，历史上就存在妇女地位低下的事实，这种现象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再生产理论也不能回答，为什么是男人在社会上工作领工资，女人在家里没有任何报酬地做家务、带孩子、伺候老人，而不是相反？对此，凯瑟琳·麦金农指出，“特别是男人，如果不单独是男人的话，在将不平等进行性化，尤其是将性的不平等进行性化。”^[1]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男人才是女人受压迫的最终根源。

2.3.4.2 在女性主义的主体问题上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之前的强调妇女主体或者性别差异不再认同。它认为，越刻意强调妇女主体越显示出妇女的次要地位，真正的主体是无需强调的，刻意强调只会凸显同质性的抽象主体，而将个体性的妇女经验之间的差异性给掩盖了。而之前刻意强调的性别差异是人类自身差异的一种表现，既不是指两性生理差异也不是指不同的社会化角度。那种认为性别就等同于差异的看法和把性别两极区分的做法性质是一样的。两极中的任一极都从另一极所具有的特征方面

获得规定性，因而容易忽略藏在性别后面的专制势力，容易使女权主义思想局限于男权的范畴内，被禁锢于一种被概念化的二元对立思想框架中。所以，凯瑟琳·麦金农指出，“性别差异的观念对于维护男性统治的现实地位是有帮助的”。^[2]

2.3.4.3 在性的问题上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倡导一种宽容平和的环境以及开放多元的态度。它认为，性这个问题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边缘和无关痛痒，相反，它关系重大，不少别有用心的反动势力发现有关话题能吸引大众眼球，于是就利用性来大做文章。在性的问题背后充斥着重大的性压抑、性控制甚至是国家暴力和迫害等，隐含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盖尔·卢宾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上演着越来越严重的性反动运动，他们反对同性恋权利、反对堕胎的权利、反对性教育，所有的性控制和性迫害都打着高尚的道德幌子，不断地制造恐慌。需要有一套系统而有力的性激进思想，来控制诸如此类的性反动运动。作为一种性激进理论，它必须能够对种种性压迫和不公正给予阐释和揭露。它的批判语言要犀利而服人，能够阐述性迫害和压制残忍暴戾。^[3]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的性激进主义，并非提倡性泛滥，而是主张一种多元而又平等的性观念和性方式，并对性专制和性暴力等现象进行严厉无情的揭露与谴责。

2.3.4.4 在女性身体或女性气质问题上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身体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文化的塑造。正如波伏娃的经典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塑造出来的。这种塑造是男性价值观的体现。同兵营制造出守军规的士兵、学校制造出守纪律的学生、监狱制造出听话的犯人一样，男权社会也在制造出女性“驯服的”身体或符合男性价值观的女性气质。正如桑德拉·李·巴特基所说，“女性气质是一种策略和人为形成的东西，是一个‘扮演和再扮演那种被主体接受了性别规范模式，而性别规范以多种多

样的身体风格表现出来’。” [4]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以男权为中心的既定文化的规范摧残了多少女性的生命。对于追求曲线而对肉体的控制，节食是对身体的一种约束，而健身则是另一种不同的形式。 [5] 时下里众多女性当中流行的美容、整容等行为，其实质都是男权主义者意图按照男性审美观塑造和驯化女性，驯化的力量渗透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可是女性对这些摧残并没有醒悟，而是趋之若鹜并助纣为虐。所以，对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而言，揭露女性被训化的事实和背后的驯化势力更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令女性醒悟，摆脱男性中心主义，解放自己。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发展的早期、中期和后期蕴含在女权主义的三次浪潮中，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论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权问题，时间上前后相继交叉，思想主线却是一致的：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批判态度的同时，结合自身经验，冲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束缚，确立独特理论框架的女权主义。

[1] Catharine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

[2] Catharine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

[3] 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97.

[4] 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88.

[5] 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90-291.

第3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的理论建构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构主要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以及在经济论和意识形态论之间寻找的一条折中途径三条主线来探讨与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

3.1 经济因素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用经济、劳动等概念来阐述妇女解放问题，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对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划分，评估家务劳动的价值，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等理论，重新定义了妇女工作，揭示了一直以来被马克思主义忽视的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指出正是家务劳动使得妇女长期在经济上落后，从而在社会地位上从属于男性。

3.1.1 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

1969年，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本斯顿在《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应用马克思的经济概念把家务劳动定义为生产的一种形式，由此开始了一场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内部长达10年的“家务劳动”争论。这一争论强调了妇女劳动的双重性，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佳·查·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曾经指出，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的探讨应该借助于三个范畴：使用价

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切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女性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可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自产自销消费掉了，没有机会进入市场这样的商品流通领域，就没有交换价值，体现不出价值因而是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被排在了有报酬劳动之后的次要位置。即便妇女参加工作，琐碎的家务加上家外工作，也只不过是使自己承担双份负担。常年从事繁重的使人愚笨的家务劳动会使妇女自然地位低下，从属于从事有酬劳动的男性，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同时，还受着资本家的剥削，承受着双重的压迫。

3.1.2 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压迫的根源

肯定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重要贡献必须承认女性生育——即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然而父权制经济学认为，只存在男人形式的“生产”价值，而没有女性“生育”价值。女权主义者指出，人们常常把生育当作一个自然的、生理的过程，从而忘记在我们的社会中，生育是除了战争之外的唯一会带来生命危险的社会活动。 [1] 生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人类繁衍必不可少的。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从微观上来说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但从宏观而言却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支撑。佩吉·莫顿提出了一个精确的家庭定义：以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工人阶级劳动力）为其功能的经济单元。在家庭中妇女承担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重任：一方面，为了能够养活家人，工人的体力需要恢复已完成每天的劳动工作量，期间的衣食住行、休养生息都需要女性来操持完成，另一方面，妇女还要承担和完成后代的繁衍教育以储备劳动力。妇女既要充当直接劳动者的角色，又要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角色。在劳动力再生产中，妇女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劳动力的生育、养育、教育等等任务主要是由她们来完成的。但是因为怀孕、生育和哺乳，却使得妇女的劳动能力被降低，从而受奴役受压迫。

[1] [美]莫尼克·威蒂格.女人不是天生的.李银河译.[美]葛尔·罗宾.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M].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354.

3.1.3 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

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把妇女限制在家庭生活中，在家庭中，妇女要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教育孩子、伺候老人等等，从事的家务劳动要比男性多得多，传统的女性角色对妇女影响根深蒂固。根据维罗妮卡·比彻（Veroinica Beechey,1978）的观点，“已婚妇女成为可以随意摆布的弹性劳动力……妇女地位的特殊性正是源于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认为家庭角色就是她们主要角色的普遍假设。”^[1] 妇女婚后尤其是成为母亲后，家庭就成为她们主要的活动范围，家务劳动成为她们的“职责”，有些丈夫在家务上即使会给予“帮助”也会被看成是他们的“恩赐”。

妇女为家庭提供无休止的服务，把过多的精力投放到家庭当中，家庭的重担阻碍了她在事业上的发展，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对男人经济上的依赖，所有活动受制于男人。同时还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妇女的家务劳动实际上是为资本家工作，因为家务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是家庭必要劳动，就应该同工人的社会必要劳动一样，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只是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工资，不是全部报酬，家务劳动在这里是无偿的。根据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角色设定，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生育子女，使自己的一生局限在家庭之内，被排斥在生产 and 公共生活之外，受剥削受压迫，处于从属地位。

[1] [美]谢丽斯·克拉马雷、[澳]戴尔·斯彭德主编.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C]（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97.

3.1.4 劳动力后备军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因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机制的结果，产生了劳动力的后备军。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了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把她们当作产业后备军。因为背后有这么一大批的劳动力后备军，资本家就可以有恃无恐压低工资，不怕找不到工人生产剩余价值来供他们剥削。女性作为产业后备军，是经济的中心，她们使那些优先考虑低工资的制造业、劳务能够履行他们的功能，成为专门“女人的行业”——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非必需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这样，家务劳动就使得女性保持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又可以在准备扩大市场时随时加入劳动力的地位，通过作为劳动力后备军，推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观点，玛莉亚罗莎·达娜·库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或有酬化的观点。（参见本文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此处不再赘述）

3.2 非经济因素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探讨非经济因素对妇女地位影响的理论中，主要代表人物和观点主要有朱丽叶·米切爾的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的四类结构理论，以及米切莉·巴雷特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

3.2.1 朱丽叶·米切爾的四种结构分析

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爾首次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理性批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倍倍尔等人在分析女性问题时过于强调经济因素观点的不足。针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1]和恩格斯著名的两个发生理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和妇女解放问题的实现条件“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2]米切爾提出批评，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家庭的分析中掩盖了妇女问题，妇女问题仅仅是用来补充说明私有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3]倍倍尔作为恩格斯的学生在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不能把妇女受压迫看作是家庭和私有制进化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妇女就受奴役受压迫。导致妇女处于依附地位的原因之一是生育功能。在妇女解放问题的论述上列宁的论述更为进步一些。他提出了一些关于妇女解放的具体设想，使得妇女解放的未来更接近现实。但是仍然没有突破社会主义就是妇女解放的思想，依然在“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两性平等的理论范畴”^[4]之内。总之，米切爾简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解放的纲领性观点，认为他们过于强调经济的因素，强调女性对

私有制的依附的不足，在他们那儿，“妇女解放依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附属品，它并没有融入该理论体系中” [5]。指出要深入了解妇女被压迫的问题，单从经济状况来看是不够的，必须从四类结构来入手。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为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缺陷中走出来，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中米切尔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提出关于妇女受压迫问题的不同观点。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由四大结构决定：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的社会化。它们密切结合成复杂的统一体，单独改变任一结构只能被抵消，只有同时改变这四类机制，才能获得妇女解放。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因素作用范围是在家庭外部，主要在生产结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因素作用范围是在家庭内部，主要在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结构。她在《妇女的等级》（1971）中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用经济因素来代替另外三个因素，因此，它提出用“废除家庭”这一抽象的口号来号召妇女进入生产领域。虽然经济因素现在仍然是首要的，但是在某些特定关头，另外的三个因素（生育、性生活和儿童的社会化）也有可能代替经济因素直接起作用。

[6]

3.2.1.1 生产结构：女性被排除在外

米切尔所说的“生产”指的是妇女在家庭之外到社会中参与的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女性受压迫的结果表现为她们被排除在生产之外。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之所以处于从属地位是由于体力弱小的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米切尔对于这样的解释并不认同。“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 [7] 如果说是因为体力弱使得妇女处于劣势地位，那么机器大工业出现后，社会已经不再依靠男性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运行和发展了，这时候，妇女不应该再处于弱势地位被排除在生产之外了。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

方，中国还是外国，妇女都被当做劳动力的后备大军，在就业市场上备受歧视，所以这一观点并不成立。米切尔指出，“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化会不断加剧结构性失业，造成大量女性失去工作，被排除在生产结构之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改变社会结构。那么，女性被排除在生产结构之外，她们的活动领域在哪呢？米切尔认为，女性的活动领域主要局限在家庭中，因而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生育结构、性关系结构、儿童社会化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女性共同实施作用，从而迫使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性别角色被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局限于家庭领域，从而处于受压迫地位的现状。

3.2.1.2 生育结构：强化女性的天职观念

生育是一种生物学现象，生育功能是女性先天独有的生理功能。这种独有的生理功能将女性和男性鲜明区分开。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女性的家庭地位紧密相关，而生育使女性在家庭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从而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母凭子贵等等都说明了生育决定妇女地位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已经成为女性的天职。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强化了女性的这一天职观念。米切尔认为，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一观点，那么女性的社会从属地位就成为天经地义，是无可避免的历史事实。进而形成女性受压迫的因果锁链：因为女性的生育功能强化了女性身上的母性——使女性囿于家庭中承担母亲的角色，忙于生儿育女，照料孩子——无暇参与生产和公共社会及社会活动——从而逐渐拉大了男性和女性的距离，造成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差距，最终形成性别的不平等。^[9]虽然生产模式可以改变，但是生育模式却是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生物学事实。女性担负着怀孕、生育、哺育的任务，担当传统家庭角色，工作生涯经常被生育

孩子而中断，只能从事零散性的雇佣工作，或者完全被排斥在生产和公共生活之外，从而处于依附地位。

米切尔分析了避孕、生育与生产的关系，指出虽然出现避孕药之类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把性生活和生育两种行为分开。但是资产阶级想尽各种办法阻碍分离两种行为，就是因为一旦二者分离，家庭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存在了。^[10] 只有通过这种家庭模式，把女性幽禁于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一体的女性专属领域里，才能达到使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目的。所以只要生育仍然是一种由女性来承担的自然天性的生物学现象，女性就不能避免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3.2.1.3 性关系结构：以另一个名称重建压迫

性关系是四大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其敏感性，很少有人提及它。但是这一结构也是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在东西方的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现象是很多见的，这种性生活结构很明显是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在性生活中有更多的自由，而女性却没有对等的权利。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性生活结构发生变化，女性地位得到改善和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和资本主义劳动契约的平等一样，是用名义上的平等“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11] 尽管是形式上的平等，米切尔也认为这仍是一个最值得期待的结构，它有助于产生更大的进步。

米切尔探讨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两种关系：一种是性自由与性压迫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性的自由开放程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的性自由和性革命主张向传统的性关系进行挑战，无论男性女性不受束缚，自由开放，任意建立临时的性关系，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这种性关系表面上是自由而开放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平等和解放。但是实际上，女性得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压迫。正如著名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说的：“再见吧，所谓的性革命！它们对妇女自由的作用就像重建时期对前黑奴的作用一样……以另一个名

称重建压迫。” [12]

3.2.1.4 儿童社会化结构：女性被母性情感禁锢家中

按照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理论，因为男性女性的生理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差异，子女儿童成长社会化过程中父母起的作用完全不同，承担的角色也迥然有别。母亲因为哺乳更方便抚养孩子，更多的是在家从事家务，起到沟通情感作用的人；而父亲则更多的是外出工作，起到工具作用的人。现代生理学的观点认为幼儿时期在人成长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主要取决于幼儿时期，这就要求父母有一方要倾注足够的时间、精力对儿童进行细致的呵护培养。因为母亲女性的生理特点与抚育性有着自然的联系，适合从事不耗费体力的工作，为家庭抚养和教养孩子，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社会化的儿童这个责任最终落在女性身上。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女性不再需要付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来完成怀孕，生育，哺乳。有学者统计，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位母亲用于怀孕和哺乳的时间要花上十五年，而在20世纪60年代，平均只要四年。 [13] 到了21世纪，这个时间更少。但是儿童社会化越来越重要，母亲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抚育教养上，这一切阻止了女性外出工作，被母性情感禁锢在家庭之中。

米切尔分析的四种结构包括在非唯物主义的父权制和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中。她尤其强调父权制理论的作用，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模式分离开来，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属于非物质结构。根据米切尔的观点，家庭为经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两个目的服务。父权制就是以家庭意识形态的方式在家庭中起作用的，在女性意识形态形成中家庭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 [14] 也就是说，

造成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四种结构不能割裂开来，把女性排除在生产结构之外，局限禁锢在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这三种家庭结构之中，是女性受压迫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所在。要想使女性不被压迫，获得解放，只能同时改变这紧密相连的四大结构。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剑桥基督学院心理分析与性别研究教授，剑桥性别研究召集人，《辩证法——女权思想杂志》编辑，研究领域为妇女学与心理分析。主要作品有：《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妇女的等级》（1971）、《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1974）、《妇女与平等》（1975）、《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论女性主义、文学与心理分析》（1984）、《什么是女性主义》（1986）、《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政治学：关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一次对话》（1994）、《孪生兄弟关系：性与暴力》（2003）、《性别与性差异的不同：关于性行为、性别与心理分析的对话》（2004），其中，《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纲领性文件，女性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

[1] 马克思.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5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3]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2.

[4]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4.

[5]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4.

[6] Juliet Mitchell. Women's E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p100-101.

[7]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8.

[8]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9.

[9]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0.

[10]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1.

[11]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5.

[12] 转引自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96.

[13] 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27.

[14]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

3.2.2 米切莉·巴雷特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中，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米切莉·巴雷特（Michele Barrett）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意识形态二者的关系，探讨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方式，以及如何实现妇女解放问题。巴雷特认为，意识形态过程不是物质现象，而是与优势、动机与情感有关的精神现象，属于意识范畴。她从阿尔都塞反对把意识形态基本简化成单纯经济条件的机械反映的观点出发，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基础。

3.2.2.1 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别分工的重要作用

巴雷特详细分析了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别分工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性别劳动分工的主要因素由男性和女性在工作领域的分工所构成。在就业市场，男性女性被区别对待，同工不同酬，女性工资比男性工资要低得多，失业率女性却比男性高得多。而且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服务性的或者护理性的“属于女人的”工作，是妇女在家庭中从事的家务劳动的延伸。而且由于妇女在社会工作领域被资本家当作劳动力后备大军，工作很不稳定，在经济不景气时很容易被辞退。虽然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由资本积聚的经济需要产生的，但它采取的形式包含了意识形态分工，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分工是男女之间的分工。 [1]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逻辑决定性别劳动分工，性别劳动分工建立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的两个原则：一是工作地点与家庭的分离产生了工资劳动制度；一是资本主义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划分劳动力。这两个原则对女工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根据技术区分劳动力本身并不对妇女的工资水平产生决定作用。巴雷特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关于技术问题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工人分

工的联系上。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控制妇女，如拥有医学专业知识的医生可以合法地控制妇女是否应该堕胎，通过技术使控制合法化；另外还通过安排男性接受教育和技术培训，从事需要技术的脑力劳动，使其表现出对比女性的优越性，保护男性特殊群体的利益，把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排除在技术生产工作之外，从而达到压迫和控制女性的目的。

3.2.2.2 家庭体系是妇女遭受压迫的核心场所

巴雷特认为家庭体系是妇女遭受压迫的核心场所，家庭意识形态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家庭是维持资本主义性别压迫意识形态的主要手段。家庭通过确立社会性别认同和按性别的劳动分工，使妇女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在家庭中，妇女一直承担着家务劳动，抚育小孩、照顾丈夫、伺候老人，从事着女人“分内”的工作，男性则外出工作挣工资，养家糊口尽为夫和为父责任。巴雷特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被社会建构的。在学校教育中，女孩就被要求帮男孩做一些卫生清洁、缝补、烹饪等家务服务工作，把感性、顺从、温柔等与女性相连；而男性被要求扛重物、做技术加工等，把力量、阳刚、理性等同男性气质。通过男女不同的性别教育实现普遍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体制的结构组织和家庭两个单位中的性别劳动分工特征相差无几，这种性别意识教育和家庭劳动分工使妇女把家庭看作是满足自然情感的地方。

巴雷特认为妇女之所以依附于男性，是与她们承担在家庭中照顾儿童的工作与责任是分不开的。“我认为，重新分配儿童照管的任务，这是妇女解放可能性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在工资劳动领域，性别分工的削弱并没有结束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所在，以上观点绝对正确。”^[2] 照顾儿童分配作为家庭性别劳动分工的一部分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妇女因为承担着家务照顾孩子，无法外出工作，或者只能打零工或者兼职，结果只能在经济上依附男人处于依附地位。男性养家糊口，女性做家庭主妇。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身份正是

在家庭意识形态内，通过资本主义现实家庭的社会化而进行建构和再生产的，妇女之所以处于受压迫地位，就是家庭通过两种手段——确立社会性别认同和按性别劳动分工实现的。但是巴雷特在分析资本主义按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时，放弃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米切莉·巴雷特（Michele Barrett），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伦敦城市大学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主要著作有：《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的相遇》（1988）、《不稳定的理论：当代女性主义争论》（1992）等。巴雷特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强调意识形态对于父权制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性别建构的作用。

[1] Michele Barrett: Woman's Oppression Today—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p162—163.

[2] Michele Barrett: Woman's Oppression Today—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p226.

3.3 经济论和意识形态论之间的折中途径

除了以上两种经济论和非经济论外，还有相当多的人尝试着把经济论和意识形态论融合，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折中的途径。其中包括海蒂·哈特曼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依赖的二元制理论、艾里斯·扬的以性别分工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安·弗格森的性——情感生产论、齐拉·爱森斯坦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理论、琼·凯利的经济和性别系统互动论等等。

3.3.1 海蒂·哈特曼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依赖的二元制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1979）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海蒂·哈特曼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问题，引起强烈反响。哈特曼提出了二元制理论，从性别等级分工、家庭工资、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两种制度是如何相互适应、相互依赖、相互强化，共同构成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

3.3.1.1 性别分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互动的结果

哈特曼认为，之所以是女性地位依附于男性而不是相反，按性别劳动分工是一个重要因素。性别分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互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取代了家庭手工业，人们的工

作场所不再是在家庭内部而是在工厂，男性进入工厂工作，女性被限制在家中做家务，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排挤女性迫使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按性别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理论上应该所有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但现实并不如理论所讲的公平合理，残酷的现实是女性始终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1] 工资的低廉微薄迫使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为丈夫操持家务依靠丈夫养活。在家庭中的分工耗去妇女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只能从事半日制工作或不工作或打零工，这种恶性循环更进一步恶化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局面和弱势地位。而男性则在压制女性的性别劳动分工的作用下，顺理成章地得到在劳动力市场和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女性则与之恰恰相反，不论是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家庭中都处于劣势和从属地位。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可以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微薄的工资——经济上依赖丈夫——家庭中从属性——操持家务耗费精力——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这一因果链来表述。^[2]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的是些工资低、待遇差的工作，被排挤到工厂之外，使资本主义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在社会上经济地位低男人一等的女性在家里自然也要“唯夫独尊”，供男人摆布。哈特曼得出结论：性别分工是女性屈从于男性地位的重要根源，必须消灭性别分工。

3.3.1.2 家庭工资形式体现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

资本家就如何使用妇女劳动力、控制女性劳动问题上，与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性工人之间一直有争议。妇女如果留在家里伺候丈夫，就不能到工厂接受资本家的雇佣剥削。资本家希望妇女能够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上，雇佣一切可雇用的劳动力从而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同时还可以把妇女作为廉价的竞争者来压低男性工人的工资，控制他们的反抗。如果男性工人阻止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也能利用男女

地位的差别补偿男人，收买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家长制的忠心。资本家通过男性工人足够多的工资——多到可以养家糊口让妻子留在家中的家庭工资形式，使得资本家和男性工人在对待妇女劳动力问题上的矛盾得以解决。付给男性工人足够供养全家的家庭工资，把妇女留在家中，正满足了男人的需要。一方面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收入人对比出男性工人的物质优势，以及要她们选择尽妇道作为职业的鼓励。另一方面，妻子在家里承担家务营造出稳定温馨的家庭氛围，使得男性工人的工作能力提升，创造出更多剩余价值。妇女在家庭被赋予的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职责更加强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附属地位。现代社会，妇女大批量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生产，性别工资差异成为父权制的前提，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从妇女的生产中获得剩余价值，在家庭中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享受到妻子和女儿的服侍。随着当代社会发展，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越来越多，但是女性工资是普遍低于男性的，在经济上依赖男性。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由家庭工资转变为工资差别。“由劳动力市场上绝对的职业隔离引起的工资差别通过鼓励女性结婚，强化了家庭和随之而来的家务劳动分工” [3]。哈特曼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被资本家控制，女人被男人控制，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不可避免的相互适应的伙伴关系。

3.3.1.3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通过意识形态加深彼此间关系

哈特曼认为，男性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中，吸取了相应的价值观念，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价值引导下的男性价值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伙伴关系强化了符合传统价值观念的男性价值，例如客观、理性、稳重、踏实等等；诋毁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女性价值，如主观、感性、梦幻、歇斯底里等等。还通过赋予交换价值相对于母性、情感等妇女领域的使用价值。只要

这样的思想意识占据统治地位，那么，“资本赋予交换价值的优先权，以及他们对使用价值之间的需求的对抗将是能够避免的。” [4] 哈特曼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价值观中，才歧视女性把女性描述成神经质的依赖的。因为性别分工，妇女在家里面作为家庭主妇更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这就给男性歧视女性、贬低女性、控制女性提供了理论证据，而在社会上工作的性别分工又认为妇女就应该或只适合从事服务员、护士、教师等职业角色，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伙伴关系。

哈特曼通过对性别等级分工、家庭工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探讨，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是如何相互利用和相互适应的，从而使得妇女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控制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之间有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一种强烈的互相依赖的伙伴关系。同时提出，要使妇女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只有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做斗争。“如果不同时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两种制度提出挑战，就不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就不可能产生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理论。” [5] 哈特曼的分析表明，要使批判更有力彻底，只有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结合起来一同批判。压制女性的性别分工和男性的主体支配地位长久地存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极不容易去除掉。男性的支配地位和性别的分工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只有将性别分工彻底消灭，才有可能终止男性支配地位。为了解放妇女，就必须要求各级社会和文化出现基本的变化。 [6]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之间是一种相互协作相互影响的关系。父权制作为一种与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制度，和资本主义一起构成对妇女的剥削和压迫。男人与资本家一起从妇女受剥削和受压迫中获得利益。妇女受压迫的从属地位既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的结果，也不是独立的父权制的产物。而是二者结合起来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要彻底解放妇女，就必须改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女权主义必须同时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做斗争。

海蒂·哈特曼 (Heidi Hartmann)，美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理论、妇女与少数民族群体就业歧视等。多年来，她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群体中的妇女解放运动。此领域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有《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性别分工》(1979)、《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1980)，其中《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针对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看法的片面性和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原因分析的偏颇性，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间婚姻的不幸，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探讨。

[1] [美]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王昌滨译.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49.

[2] [美]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王昌滨译.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61.

[3] [美]海蒂·哈特曼.“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朝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载詹妮特·克莱妮编著.李燕译校.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582.

[4] Heidi Hartmann,“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Carole R.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 (ed):Feminist Theory Reader,Routledge,New York,2003,p217.

[5] 哈特曼、马克思.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M].1980.

[6] [美]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王昌滨译.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74.

3.3.2 艾里斯·扬的以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

艾里斯·玛丽安·扬（Iris Marion Young）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扬是著名的二元论反对者，她在著作《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二元制理论的局限》（1980）和《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中批判了米切尔和哈特曼的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结合的二元制理论，阐述了她的以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

3.3.2.1 以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

艾里斯·扬认为，“对性别分工的分析是针对社会中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特殊关系在更为具体的级别上进行的，这使之变成了一个综合的网状系统。它描绘社会成员之间根据他们在劳动活动中所起作用所进行的结构分配，并且评估这些分配在经济和统治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起作用的情况下的结果。”^[1]通过性别分工能够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成员在其社会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在当代社会，各个国家的种族歧视等除了性别差异以外的现象。社会的性别分工在整个社会的分工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分析社会形态的经济生产关系。使用性别分工分析考察社会生产关系，能把女性的特殊情况置于中心位置，全面了解在社会当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状况，说明男性处于统治地位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是怎样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对性别方面的社会劳动关系进行有形的分析，而不再设想普遍意义上所有妇女或特定社会中所有妇女都处境相同”。^[2]她指出，不同的社会制度赋予女性不同的社会任务，并使她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社会境遇状况，而对这些现象的分析阐释，通过性别分工比二元制理论更能够很好地展现出来。

首先，使用性别分工的分析方法看到男性处于压迫女性、支配女性地位的现实，把女性的特殊境遇置于考察的中心，获得整体的女性地位状况认识，看到经济社会关系结构的决定因素。其次，使用性别分析方法，使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别关系处于生产关系的中心，性别分工的变化会影响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再次，使用性别分析方法，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是男性可以控制生产资料并处于统治地位对女性进行剥削压迫，而不是相反。最后，使用性别分析方法，可以通过女性承担的工作任务和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断变化，说明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从属社会地位的性质和依附程度的变化。但她也说明“性别分工应该始终是说明妇女状况某些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决不是唯一的方面” [3]。艾里斯·扬阐述了她的以性别分工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指出性别分工分析方法对于分析整个社会劳动活动中由性别标准产生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相比于二元制理论的优势，并用性别分析这一概念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父权制社会是二者合一的。

3.3.2.2 资本主义社会与父权制社会是合二为一的

艾里斯·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父权制，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密不可分，合二为一构成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女性进行剥削和压迫。在她看来，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体的，正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作用，造成女性在社会中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地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依附于男人被边缘化，沦为次要劳动力，作为廉价低工资的劳动力后备军。可以使工人工资维持在最低水平，而当新企业出现时，妇女劳动储备就起到作用，可以被吸纳到新的生产领域。所以艾里斯·扬总结道，排挤和压制妇女，令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处于次要从属的低位，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性决定的。 [4] 妇女的受剥削受压迫地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和动因作用的产物。“资本主义并不是利用父权制来产生等级关系，而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规定男性主要、女性次要的性别等级关系之上。” [5]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性别原则的基础上，男性是主导、女性是附属的性别等级

关系。男性的主要地位体现在他们是生产领域的主要生产者，女性的次要地位是因为她们一直被限制在家庭里，不被鼓励出现在工作场所，即便工作也是极低的工资。女性的天职就是养育孩子和做母亲，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父权制意识形态来达到压迫和控制女性的目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就是父权制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反对父权制压迫女性的斗争。美国的齐拉·爱森斯坦也主张同样的观点。

艾里斯·玛丽安·扬（Iris Marion Young）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民主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二元制理论的局限》（1980）、《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相交的声音：性别、政治哲学与政策的困境》（1997）、《论女性身体的经验》（2004）等。在作品中，她批判了朱丽叶·米切尔和海蒂·哈特曼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结合的二元制理论，是二元制理论最有代表性的反对者，提出了以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

[1] [美]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85.

[2] [美]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89.

[3] [美]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90.

[4] [美]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92.

[5] [美]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95.

3.3.3 齐拉·爱森斯坦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理论

齐拉·爱森斯坦（Zilla R.Eisenstein）纽约伊萨卡学院教授，在她主编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1979）一书中，把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分析结合起来，指出“我选择使用‘资本主义父权制’一词来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性等级之间辩证的、互相作用的关系。理解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分析非常关键。尽管在资本主义以前父权制就存在，并且在之后的社会里得到延续，但是如果想要改变这一压迫结构，它们之间的现存关系是我们必须弄明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孤立的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二者是一种超越”。^[1]爱森斯坦选择使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说明妇女所受的压迫，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密切关系通过等级制的性别劳动分工给予揭示，构成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3.3.3.1 从资本主义父权制出发探讨妇女所受压迫

爱森斯坦认为，妇女之所以受压迫，是因为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作为压迫的对立面，权力来自于性、种族与阶级，体现在父权制、种族歧视与资本主义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层面。在阶级地位、父权制结构或意识形态等方面研究妇女受压迫问题。爱森斯坦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关系出发来探讨妇女所受压迫的。考察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时期的阶级与父权制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揭示出大男子主义由来已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妇女受压迫是有着复杂的因素。要想客观探讨妇女受压迫问题，必须打破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分别根据经济阶级地位与性、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经济与家庭、个人与政治、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无酬家务劳动与付酬工资劳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

域、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与性别劳动分工的简单的二分法，不能忽视一方面重视另一方面，必须综合起来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复杂状况。妇女存在是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决定的，那么就不能只通过资本主义或父权制来理解妇女受压迫的问题。

[2]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两个体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对妇女的剥削和压迫。所以，要探讨妇女所受压迫的复杂性，就要从资本主义父权制关系出发。

3.3.3.2 等级制的性别劳动分工

爱森斯坦认为，性别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父权制条件下是具有等级制度的。性别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使得男性和女性在各自的角色中承担各自在家庭和社会领域的责任。构成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基础，使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父权制的改变是为了资本的需要，同样，资本的改变也是为了父权制的需要。 [3] 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父权制体系，父权制奉行男权至上的性别等级体制，对资本主义有着重要意义。父权制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控制体系为资本主义提供一定的秩序，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同样需要性别等级体制的父权制控制系统来控制社会秩序，以维持社会和经济体制的顺利发展和运行。另一方面，父权制取资本主义所需。父权制是一种社会政治体制，而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利润为目标的经济阶级体制，二者的融合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控制提供了性别等级制的秩序。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控制下，把妇女看作是低男人一等的处于附属位置。所以，妇女只能在家里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即使进入社会工作，也被支付极低的工资。即使妇女已经处于付酬经济中，性别劳动分工和性别社会分工表面上也无可挑剔，但是实际上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通过把女性界定为工作中的母亲适应了这种状况。 [4]

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过程，互相需要互相依赖，不可替代。在二者结合成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过程中，更增强了作用的力度，从而获得更大经济利润和政治利益。

齐拉·爱森斯坦（Zilla R.Eisenstein），美国纽约伊萨卡学院教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妇女运动活跃分子。主要研究有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建构、阶级、性与种族的政治学，在理论上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分析与激进女性主义分析综合起来，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1979）、《关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关系的若干说明》（1979）、《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激进未来》（1981）、《女性主义和性平等：自由美国的危机》（1984）、《女性身体与法律》（1988）、《性别的肤色，重思民主》（1994）、《憎恨，21世纪的种族化与性别化的冲突》（1996）、《全球化的污秽文字、父权制、资本主义与网络幻想的诱惑》（1998）、《性诱惑》（2007）等。其中，《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一书是美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论文集。

[1] 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p5.

[2] 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P 24.

[3] 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P27-28.

[4] 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P29.

第4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观点评析

如同任何一种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既有着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建树，也具有着无可避免的历史局限，但总体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和运用社会分析领域创新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1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树

4.1.1 揭示当代妇女的异化状况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影响很大。在她们看来，女性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异化状态，这种异化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女性与自己存在相异化，妇女是为了他人的存在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自己；其次，女性与自己的家庭相异化，妇女是家庭成员，但从事的家庭劳动却不被认可，处于依附地位；最后，妇女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妇女的劳动不是为自己的发展服务，而是被廉价买卖成为家庭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代表安·弗尔曼指出，无论是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对女性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利的：男性不管是在家庭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领域，都能很好地生存并

且自由表达自己。比较之下，女性的活动范围却被囿限于家庭内部，异化对女性的生活和意识影响都更具有压迫性。男性的异化可以缓解而女性的异化却缓解不了。因为男性可以靠和女性的关系来缓解，而对女性来说，正是男性的这种亲密关系构成对她的压迫和异化。 [1] 相比较而言，异化对女性更为不利，异化使她们没有自我，为了得到他者的肯定，完全不是有思想、有感想的独立的个体。

达拉·科斯塔认为女性的家务劳动不被社会认同，被排除在工作之外孤立在家庭之中，造成她们对男人经济上的依附和精神上的依赖都是异化的因素。

阿莉森·贾格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女性进行压迫所采取的手段就是异化。异化采取的性别形式是独特的，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了。主要体现在精神智力、母亲智能、婚恋和情感体验的异化，使女性与社会上所有人、所有事物甚至是她们自身相疏离。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女性的最基本和普遍的体验，“在当代社会中，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了”。 [2] 她分析了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异化为性客体、生产“产品”的工具，以及女性在精神智力及其气质等方面的异化等等，探讨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异化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具体的和历史的产物。 [3] 要想改变女性受压迫的社会现实，就必须消灭女性异化。

女性主义者艾伦·伍德指出，“如果我们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或自身没有价值；或者，只有借助于我们自己或自身处境的幻想，才能维持意义和自我的感觉，那我们就是被异化了”。 [4]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女性的异化理论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对女性进行的剥削和压迫，在理论上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有力的思想武器。

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哲学与妇女研究教授。主要著作：《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1983）、《性别、身体、知识》（1989）、《生活在矛盾中：女性主义的社会伦理学对话》（1994）、《堕胎：三种观点》（2007）、《女性主义框架：关于女性与男性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理论说明》（1990）、《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学》（1998）等。阿莉森·贾格尔把目前现有的女性解放理论进行分类，划分为激进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四种系统理论。她认为，女性问题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基本哲学问题思考的基础上。

[1]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7.

[2] Alison M.Jaggar: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The Harvester Press,New Jersey.1983.p308.

[3] Alison M.Jaggar: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The Harvester Press,New Jersey.1983.p317.

[4]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6.

4.1.2 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获得了许多新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如英国肯特大学的肖恩·塞耶斯指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相比，出现了许多未曾预测的重要转变，它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繁荣，而且资本主义逐渐实现全球化，比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更加有生命力。这种形势下，就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以新的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理论批判。针对资本主义女性的受压迫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4.1.2.1 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批判

父权制的概念最早源于社会学，指一种父亲是最高家长的社会结构。 [1]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产生以来，逐步认识到女性所受的压迫是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共同作用下。“父权制是一个随历史而变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经济系统所必需的，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基础。” [2] 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逐渐扩展成男性统治女性的专属代名词。父权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作为历史上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物，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结果。这从资本主义社会私人父权制在家庭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具体表现可以得知。

“资本主义的父权制”这一专有名词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用来阐述她们提出的二元制理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密切关系。米歇尔·巴雷特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家庭——家户体系不仅构成了妇女遭受压迫的核心场所，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形态来说，还

构成了生产关系的一种重要组织原则。” [3] 其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父权制逐渐从家庭领域中向社会领域转移，从私人父权制向公共父权制演变。于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分工由父权制的资本主义重新构成，并且使之加强，造成了新的女性异化。阿莉森·贾格尔在《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一书中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异化现象，总结出几种形式的异化：女性同自身的异化；女性的母职被异化；女性养育孩子的过程被异化。并指出了女性消除异化获得解放的道路。南希·乔多萝则从父权制隐形歧视女性的“性别意识形态”来探讨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孤立的核心家庭中，妇女的养育职能造成了男人的一种独特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不仅再生了主张男性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和心理冲动，而且再生了对生产需要的屈从。” [4] 我们可以看出，父权制的资本主义不但加强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性别分工，而且加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异化，营造的社会氛围把女性和男性分别局限在各自的角色范围内，即压制女性的所谓的“女性气质”和褒扬男性的所谓的“男性气质”。也就是所说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以此来强化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所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结束父权制的统治，反而对其进行了加强。

关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在本质上是是否同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是以榨取剩余劳动力获得的利润积累为驱动力，它通过历史上各种形式的父权制结构做到这一点。她们还将批判性分析延伸至历史上父权制结构影响人们生活的特定的方法。 [5]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互补的一体关系，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海迪·哈特曼指出，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父权制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二者只能共存。艾利斯·扬也指出，“妇女的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坏了。” [6]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父权制，指出反父权制斗争实质上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父权制，女性解放事业才可能得以实现。

4.1.2.2 对新形态的资本主义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批判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自产生后，对新形态的资本主义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批判，他们向当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发出挑战，并宣称要从语言和实际行动两方面对他们实施毁灭性打击，使资本主义的活力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熟的对资本主义及男女生活中的阶级实现的女性主义批判”。[7]

莉莎·沃格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家务劳动就要由女性来承担，以及由此产生的男性统治体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化了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压迫。被剥削女性地位的形成由女性参与到剩余劳动中的程度和特征决定，这使得工人阶级女性遭受着特殊的压迫，既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又受工人阶级男性的压迫。

艾里斯·扬指出，资本主义本质和基本的特性就是把女性推向边缘的社会地位，在劳动力市场起次要和从属的作用。[8] 资本主义最重要和基本的特征就是女性的边缘化，声称女性的天职就是从事家务，生儿育女，不适合工作，只是次要劳动力，通过宣扬这种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女性的从属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和动因起作用的结果。

盖尔·卢宾指出，通过完成劳动力的生产职能，女性和资本主义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家务劳动是无酬的，女性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为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过程中做出了贡献。[9]

玛莉亚罗莎·达娜·库斯塔和赛尔玛·詹姆斯指出，女性所从事的无酬家务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

新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面对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既不再是对女性的悲惨遭遇进行控诉，也不再是纠结于家务劳动有酬还是无酬，而是直接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和解构，努力改变由男权支配的局面。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的“批判性建构”，是具有颠覆历史意义的壮举。所谓解构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经济形式，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中心的统一整体力量。吉布森·格雷汉姆在《资本主义的终结》（2002年）中思考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如何跳出资本主义领地”，并对“一套积极而有差别的经济形态”的非资本主义 [10] 进行研究。

只有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导致女性压迫的各种因素形成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于探讨资本主义在父权社会或者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体系之外造成女性受压迫的方式是重要的。 [11] 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有力武器，其对于女性主义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 [德]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30.

[2] [美]罗斯玛丽·海纳西.概念的设定.曾茗译.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3.

[3]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90.

[4] [美]凯瑟琳·凯勒.走向后父权制的后现代精神.[美]大卫·蕾·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6.

[5] [美]罗斯玛丽·海纳西.概念的设定.曾茗译.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7.

[6] [美]艾利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王昌滨译.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93.

[7] [美]罗斯玛丽·海纳西.概念的设定.曾茗译.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1.

[8] [美]艾利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王昌滨译.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92.

[9]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M].北京：三联书店，1998:27.

[10] [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7.

[11] [美]马莎·E·希门尼斯.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女性主义[J].周守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10）：28.

4.1.3 探索女性解放的路径和前景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结合面临的形势，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广大女性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困境，探讨了女性实现自身解放可能的路径和面临的前景，提出了女性解放的实际策略，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解放应该是全面的解放，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解放。

4.1.3.1 经济解放

经济解放主要是指女性摆脱经济上依赖男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认为经济解放在女性解放中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女性经济解放的三条途径。首先，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女性走出家庭，和男性一样工作参加社会生产，一方面可以使女性有自己的经济收入不再依附于丈夫，从而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女性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女工的剥削和压迫，女工的工资要远远低于男性，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从事社会生产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其次，家务劳动工资化。库斯塔和詹姆斯作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提倡者，指出女性在家里从事的家务劳动创造了价值，应该由国家而不是个人来支付工资。而反对家务劳动工资化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对家务劳动付酬虽然可以证明家务劳动的价值，但长此以往，容易把女性和家务劳动固定在一起，阻碍了消除社会性别分工的实现。而本斯顿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观点则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矛盾。再次，家务劳动社会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根据恩格斯提出的家庭劳动的社会化也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的观点，指出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可以让人们意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价值，而且能够给予长期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应有的尊重，使女性把精力从家务劳动转移到社会

生产劳动中来，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机会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同时家务劳动社会化还可以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和机会。使料理私人家务和照料儿童等工作社会化，才能结束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所受的压迫。

[1] 这是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径。

4.1.3.2 政治解放

女性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获得是女性解放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从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到1848年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的《观点宣言》，再到1869年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些女权主义先驱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代表女性发出呐喊，明确提出了女性应当享有选举权、受教育权、财产权、就业权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梅扎罗斯指出的，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解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女性取得了参政权，并且废除了一些歧视女性的法律。但是女性解放在政治、法律上的进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结构性不平等的物质权力关系。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的统治。在这种未触动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女性解放不可能取得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进展。 [2] 虽然政治解放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条件，但如果只实现政治解放，对于整体的女性解放事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女性在法律和政治上取得了一些权力，在政治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女性这种政治解放是在男性话语方式下以男权为中心的女性解放，女性仅仅是在不损害男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一小部分权利，这还是男性所谓大方让渡给女性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按照男性的生存方式运行的，因此，单单废除男性特权的立法并没有终止性别上的不平等。女性所期望的和男性在生产方式、价值取向上都处于平等地位，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马撒·吉梅内斯明确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限制中，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争取平等的斗争的期限就有可能被延长，并且不一定能看到光明的结果” [3] 。

4.1.3.3 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思想解放是指摆脱长期以来父权制思想对她们的束缚。父权制建构了男性和女性的精神世界，只有解放女性的精神，使她们摆脱女性和男性不能平等的意识束缚。 [4] 女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由于长期在父权制的统治下，男性的“性别意识形态”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种压制女性的文化力量占据了人们的头脑。男性表现出高高在上、强大、主动进取而女性则变得卑下、软弱、被动依赖等。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女性是“第二性”，是依附和附属于男性的劣等性别。这种贬低女性的父权制的“性别意识形态”束缚了女性的思想也强化了男权中心意识，使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家庭中的从属依附地位根深蒂固。南希·乔多萝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分配当中，核心家庭中的养育职能是由女性来承担的，这种职能分配为男性更多地参与资本主义的事务提供了方便和条件，男性逐渐成为家庭的主体和社会的主导，因而男性优越的性别意识渐渐滋生，由此形成了以男性中心的社会控制体系。 [5] 家务劳动、怀孕、性和养育后代照顾老人，这些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女性的专职功能，使女性在心理上对这种不平等习以为常，“规定妇女不工作的妇女思想意识成了妇女边缘化过程的后果和这一过程已经开始的证明。” [6] 改变男性歧视压迫女性的法律条文及制度是容易的，难的是转变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形态，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在思想上统治支配着女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米切莉·巴雷特提出女性解放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的劳动和责任的再分配，家务劳动应该是男女两性间共同的义务；二是应该废除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赖；三是必须改变性别意识形态。她指出，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基于男权是社会既定现实的思想的理论”也就是基于男性要女性这一事实的理论。 [7] 如果这些情况不改变，就不能指望改变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被压迫的从属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的关键之处在于其解放功能，追求的目标也是女性全面自由的解放和发展。什么时候女性能够和男性一样在经济上、

政治上、思想上获得平等，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自己的价值，女性才得到真正的解放。

[1]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7.

[2] [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M].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66.

[3] Martha E.Gimenez,“Capitalism and Oppression of Women:Marx Revisited”,in Science and Society,vol.69,no.1 (January 2005),p29.

[4]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3.

[5] [美]凯瑟琳·凯勒.走向后父权制的后现代精神[M].杨善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8.

[6] [美]艾利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王昌滨译.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95.

[7] [美]特丽莎·德·劳里提斯.社会性别机制.[\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艾晓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8.

4.2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局限

4.2.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偏离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一些女权主义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相结合而产生的学派。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只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名词来作点缀，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路径恰恰相反，有的甚至公开批判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 [1] 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甚至出现了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朱丽叶·米切尔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结构，并且强调父权制是非历史的、具有同样结构的制度。妇女作为妇女是处于历史之外。这些论断都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艾里斯·扬指出，阶级范畴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直被女权主义所诟病的性别盲点，无法用来分析性别等级和女性所受的压迫，主张用有助于说明女性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从属地位是如何产生的性别分工理论来代替。但是这一范畴对不同阶级的女性所受的压迫却不能做具体阐释，从而忽视了阶级的主导作用。性别分析的分析方法试图寻找一种导致女性受压迫受剥削的普遍性根源，将女性本质化为受害者，掩盖了女性之间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具体划分，使得女性问题具有简单化和一体化的倾向。

发展到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阶段，更是出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否定甚至是颠覆的现象。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解放，认为女性摆脱了束缚实现个性解放就实现了彻底的解放，并没有真正关切女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性的命运和苦难。这和马

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相去甚远。它看起来是用女权主义来填补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性别盲点，实际上为了追求绝对自由，用后现代主义的微观叙事去解构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在女性解放上的重要指导意义，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1] 刘建军.女权社会主义.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9..

4.2.2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别化

所谓性别化，安东尼奥·克拉里在《世界新秩序中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可能性》中认为，性别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对人类生产、阶级关系、异化、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等概念和问题从性别角度进行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把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关注的问题都进行程度不同的改造。无酬的家务劳动、性体验的异化、生育权的被剥夺、照顾孩子等等女性面临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和政治斗争的对象。 [1]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别化使其从理论起点上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莉莎·沃格尔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承诺坚持社会主义，但由于他们的起点不同，导致其理论重点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轨道。 [2]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的压迫，给予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这种态度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应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会导致性别化的后果。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追求目标是解放女性，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只限于在男女两性性别二分的基础上形成的女性解放，单纯地强调女性解放不但容易忽视男性解放问题，而且还会忽视女性所属的不同阶级阶层的差别，并不利于达到全人类解放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解放的理论高度探讨女性解放问题的，从这个角度上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相对来说具有很大的理论局限性。

[1]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1.

[2] Lise Vogel: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1983.p69.

4.2.3 对女性受压迫及解放问题探讨的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性受压迫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并提出了自成体系的女性解放策略。但是他们并没有突破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思想局限。这一点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上。他们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过于强调阶级的主导作用而具有性别盲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把女性单独作为一个阶级，只强调包括劳动妇女在内的无产阶级遭受到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强调的性别分析方法的运用，使他们试图寻找一种导致女性这一群体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普遍性根源，将女性本质化为受害者，忽视了女性之间存在的差异：阶级、种族、民族、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个体差异，犯了把女性问题一体化的错误。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认为，“既然所有这些压迫都是联结在一起，不可能单独消除哪一种压迫形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偏见，即便在理论上可以分开，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的。这些压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寿终正寝。”^[1]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过于强调性别压迫反而忽视了阶级剥削以及掩盖了种族歧视。

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曾批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只关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解放问题，其建立在性属差别基础上的两性对立理论探讨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中，白人是社会的主体，有色人种是弱势群体，黑人尤其受到社会歧视，经常被忽略。一位黑人女权主义者曾经愤怒地提出质疑，在整个女权主义者提供的女权主义的传记作品中，直接和黑人女性相关的历史文献甚至都不足一页，还何谈代表全体女性？^[2] 这些弱势群体女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追求的权利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有着很大差异，对她们来说，她们首先要争取的是受教育的权

利、选举权参政权、经济独立等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早已拥有的权利，只有这些基本的权利追求到之后才会考虑追求真正的人权。忽略女性之间的具体差异和不同需求来探讨女性解放，只考虑资产阶级白人女性的获得解放和追求平等是没有意义的，必须针对其差异性区别对待，才能够使全世界的女性摆脱剥削和压迫，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这一点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性受压迫及解放问题的探讨无疑是狭隘和片面的。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美国重要的黑人女权主义理论家。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我本女人》（1981）、《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等，她指出女权主义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批判了白人女权主义者对美国黑人妇女仍在遭受的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忽视了种族和阶级这两个紧密交织的问题。认为种族主义的影响超过了男性至上主义。

[1]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玉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16.

[2] Marilyn Jacoby Boxer,Foreword by Catharine R.Stimp-son.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Creation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andon,1999.p105.

4.2.4 对女性受压迫原因的本质主义探究方式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试图寻求一种或者几种的女性受剥削和受压迫的根源，陷入了一种寻找事物初始原因的本质主义探究方式当中。比如艾里斯·扬认为分析女性受压迫状况的核心范畴是劳动的性别分工，女性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从属地位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持续下去的，包括女性在家庭中、在工作场所的整体地位，及其担任的性别角色、生育角色和在生产中的角色。扬认为性别劳动分工使性关系和女性地位处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中心，能够揭示女性的整体状况，分析女性所受的特殊压迫。阿利森·贾格尔把异化这一强有力的概念作为分析女性受剥削和受压迫状况的概念基础，异化的范围扩大到女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女性在社会中的经历看，有作为性客体的异化、生育和养育的异化，以及精神智力和气质的异化。异化概念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当代社会受压迫进行系统化的批判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 [1] 形成了对女性解放问题的理解和策略。

朱丽叶·米切尔则认为是女性在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中的地位这四大结构的综合作用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困境。她指出，“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 [2] 这四大结构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结合非常紧密，女性要想摆脱压迫必须同时改变这四大结构，只改变一个那么另一个结构反而会加强，从而使这种改变徒劳无功，其结果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并没有触及到事物的实质。 [3] 米切尔·巴雷特则通过父权制、再生产和意识形态这三个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女性受压迫的特点，强调在女性受压迫的建构中意识形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对女性受压迫地位的根源因素的探究过程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乃至整个女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争论、观点。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有两方面，一是很容易导致忽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二是即使注意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也容易把它简单化。所以，总是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二者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但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共同发展，为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指导，并且为全世界的女性解放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 Alison M.Jaggar: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The Harvester Press,New Jersey.1983,p307.

[2]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8.

[3]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

4.3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意义

4.3.1 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和资本主义要比性别和父权制更重要、更根本。而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不同意把性别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海蒂·哈特曼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结合是“不幸的婚姻”，她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历史发展规律做了本质性的深入分析，尤其是有关资本的那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却无视性别。只有在一种女权主义的专门分析中，才能揭示男女关系的系统特征。然而这种女权主义分析本身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无视历史，且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妇女的困境，就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尤其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以及女权主义的分析，特别是把父权制定义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结构。”^[1] 哈特曼说，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存在的问题是，它对于为什么女性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压迫这个问题无法做出解答，无论这个女性属于哪一个阶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男人与女人的经历存在着差异……女人作为女性如何受压迫，为什么会受压迫。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在女人持续的屈从中，男人成了既得利益者。”^[2]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互评给予了总结：“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批判女权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意思是说女权主义的工作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们认为若依据性别来分析社会，就会忽视阶级的首要性，并会

掩盖女性之间的阶级划分，因为女性中有些应分属于无产阶级。据称，女权主义者们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的体制内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女权主义指责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被界定为男性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男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范围内活动的。女权主义认为，单纯从阶级的角度分析社会，就忽略（社会中）两性不同的社会经验，遮蔽了女性的整体性。据称，在不改变女性与男性的不平等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也可以（某种程度上是已经）获得满足。” [3] “女权主义是第一个对人们所关心的事务加以肯定的角度出现的理论，其研究方法是把它所寻求捕捉的现实概括为理论。如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女权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意识觉醒，即把女性社会经验的意义加以集体地和批判地重构，如同女性经历了一样……在此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就思想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某种程度上，在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基础上，它假定并提出了一个思想之外的实在。它认为有一个客体存在——也就是，一个非社会性的，观察的内容。相比之下，意识觉醒探究固有的社会状况，探究思想和物质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社会性别）的混合。” [4]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待女性解放的问题上，一直以来的分析和探讨并不充分，具有着性别上的盲点。上世纪70年代，朱丽叶·米切尔将缺少性别研究的现象称之为理论“沉默的一角”。社会性别，英文是gender,用于区别只从生物学角度界定和研究的女性性别（sex），指的是男女两性在社会要求下男女扮演的不同的社会角色（gender role）。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突出或独特的价值。 [5] 女性主义建立社会性别这一不同的审视纬度，不仅是视角和立场的不同，也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换。凯瑟琳·麦金农指出，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劳动一样，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性别。从区分男女生理差异的自然性别到翻译男女社会差异的社会性别，他们赋予性别以学术的内涵使其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深入探讨劳动的性别分

工问题和女性的无酬家务劳动问题，把这两个问题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探讨中，考虑社会性别的另一种经验与体验成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使社会性别和阶级、种族一样，成为研究人类社会问题的基本分析范畴。虽然社会性别与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不同，也与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一直以来重视的文化、历史、宗教等因素不同，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有益的创造性的补充。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典型地反映在联合国1997年把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决策的战略中，也就是社会性别主流化。这种分析方法可以把性别平等置于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制度化、规范化的运作当中，从而补充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宏观性和抽象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更强调分析人多重身份的社会性别理论所关注的对象进行整合，关注女性、种族、同性恋等一些边缘和弱势群体。这种不同关注点的整合能够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分析思想更加具体丰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关系界定，使得女权主义的理论核心——性别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阶级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能够在理论上得到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其特有的社会性别研究视角和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典的思想、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诠释。不管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性别平等策略在社会现实中能否实现，至少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独一无二的诠释，导致了以“社会性别”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构建。在社会性别的视域下，无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根据新的社会情况、社会观念进行丰富与发展。

[1] Heidi I.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Lydia Sargea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Monteval: Black Rose Books, 1981, pp.2-3.

[2] Heidi I.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Lydia Sargea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Monteal:Black Rose Books,1981,pp.5.

[3] [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M].曲广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6-7.

[4] [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M].曲广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18.

[5] 王宏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8）：92.

4.3.2 运用性别分析领域深化和扩展马克思主义

在分析资本主义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过于强调经济和阶级因素，对于这种传统的分析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进行了扩展和补充，立足于女性这一社会性别群体特有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对女性压迫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的作用。

根据本文第三章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构中所介绍的，莉莎·沃格尔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从马克思的经济范畴，根据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女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石，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女性解放问题的指导意义。

朱丽叶·米切尔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的缺陷中走出来，指出妇女被压迫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状况来认识，而必须根据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的社会化四类结构来分析。女性遭受的压迫是非唯物主义的父权制和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模式分离开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的受压迫地位，同时也强调非物质结构的父权制对女性压迫的重要作用。

海蒂·哈特曼更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结合的二元制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依赖，共同构成妇女受压迫的原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互动的结果——性别分工，则是女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根源。

艾里斯·扬用女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性别分工范畴**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范畴**，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的，二者本质上是一体的。是资本主义父权制构成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妇女之所以受压迫，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父权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

南希·哈特索克指出，“女性生活经历如同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经历一样……使我们有一个观察男人至上的特别有利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基础，用来构筑对构成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意识的有利批判……就像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理解整个世界并使之经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样，女权主义学者的立场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进入物质世界，并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更好地理解为何父权制度和意识形态采取这些荒谬的、极端的形式，可以理解理论和实践如何能被更具解放性的方向再次引导。”^[1]

以上种种观点，不管是一元制理论还是二元制理论，不管是四类结构还是资本主义父权制，不管是性别分工范畴还是阶级范畴，都是对传统的分析领域的扩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战斗的年代，阶级压迫问题要远比女性解放问题更残酷、更迫切和需要解决，相比之下，女性问题则表现得没那么突出和严重，也就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但是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如果我们仍然只是从阶级斗争这一种角度去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只争取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是不足的。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无疑从性别分析领域开阔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内在价值进行提炼、阐释和发展，是一个开辟新领域、创造新理论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能够从不同切入点关注女性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前沿问题，无疑有助于在社会新形势下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和创新点。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发展是动态的、矛盾发展的，一直以来勇于自我反思并且能够对传统进行质疑，通过开放性的多元的讨论形式，不断地对其自身所在的社会和文化话语的认识，令它的理论发展具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因为当代的中国女权主义理论主要是源于国外的女权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所以，中国的女权主义应该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经验和教训，从他们面临的问题中反思中国女权主义面临的问题和情况，吸取有利因素，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语境下的女权主义理论发展道路。

[1] Nancy Hartsock,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31.

第5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的殊异甄析

严格说来，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纯粹的、系统的女权主义。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缺乏女权主义思潮产生的先天土壤，不能出现像国外尤其是西方那样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潮，也决定了作为国家民族革命和建设一部分的中国女权主义与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存在着很大差异：时代国情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异质、理论核心的分歧。中国的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女权主义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被称为父系的女权主义。要发展中国女权主义，就必须正视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找到中西女权主义的契合点，把握差异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5.1 中国语境下女权主义历史变迁

5.1.1 马克思主义传入前中国女权主义思想概述

5.1.1.1 中国古代女性观概述

中国的文明社会一般认为是从夏开始。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在夏朝，统治者们轻贱女性，《国语》中记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之夏。”^[1] 女

性成为政治牺牲品，被看作是“淫欲的工具”。到了周朝，女性被剥夺了分封土地的权利，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性，而当时政治上的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是与土地分封制配套的，因此女性被完全排斥在承嗣系统之外，从此男尊女卑的观念逐渐形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大戴礼记》说：“女者也，故谓之妇人”，就是说，女子这个称呼，本身就含有女人依靠男人的内容。儒家的天道阴阳五行观阐述了阳尊阴卑，阳刚阴柔的观点，《周易·系辞下》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周易·家人》里指出“女正位乎其内，男正位乎其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2]；《论语》儒家的孔孟之道具体化和人道化了这种伦理思想，孔子更有“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歧视女性，形成所谓的“妇道”；周、汉儒家经典《礼记》把“男帅女，女从男”当作“夫妇之义”。《礼记·丧服·子夏传》提出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九嫔》提出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女性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进行的规范要求。《大戴礼记·本命篇》中“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之后从唐开始历朝历代更把其列为律令正本，成为压制中国女性几千年的“七出”之条。

汉朝经学家刘向编《列女传》，共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七篇，列举一百零五位女子作为崇尚贞洁的榜样。女学者班昭写的《女诫》，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字数不多但是以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为主旨，几千年来中国女性都深受其戒。汉儒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说为基础，提出“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加深了对女性的束缚，例如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存天理灭人

欲”。到了清朝则女性贞洁观更畸形化，女性把贞洁看作比生命更重要，寡妇再嫁为耻，要以死殉节或守节，据《清史稿·列女传》中记载，各地方官每年上报的贞节烈妇的人数就有数千人。 [3] 夫亡则同老抚孤以光耀门楣，乃其全部人生价值，对女性婚姻束缚达到最高点。

在经济方面，《礼记·内则》提到：“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为人妻没有私有财物，没有资格将物品丢弃或赠予他人，就是娘家陪送的嫁妆，带入婆家，就是丈夫的财产，没有任何支配的权利。我国现尚保存完整的最为古老的一部封建法典《唐律》规定：丈夫拥有妻子嫁妆的所有权；明代和清代的法律都规定夫家控制和掌管女子的嫁妆，即便丈夫去世，寡妇改嫁其财产也由前夫家随意处置。总之，封建时代的女性毫无个人资产可言，可谓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中国历来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礼记·内则》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这种性别分工模式把女性牢牢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琐碎的家务事，而国事、大事则是男性的专利。《诗经·大雅·瞻卬》中云：“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礼记·郊特牲》中指出：“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夫荣才能妻贵。女性实际处于被主宰、可能多做牺牲的位置。 [4]

几千年来，封建父权社会在构建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重男轻女的性别秩序。中国封建礼教在思想上强调封建伦理纲常，但是女性作为承载这些封建道德规范的被动工具，受到这些封建礼教道德规范的制约，顺从一切男性，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严重束缚了女性的思想，使她们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几千年来封建伦理道德积淀成强势的习惯性驱动力，成为女性受摧残、受奴役的意识形态上的总根源。 [5] 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完整的人，可是却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毫无自主权，更没有西方女权所追求的“人权”，完全沦为男性的附庸，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5.1.1.2 马克思主义传入前中国早期女性思想和运动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在国外女权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优秀杰出的女性。比如杰出的政治家商代武丁之妻妇好、战国时期齐国的钟离春、西汉的吕后和窦太后；文学家和史学家西汉卓文君、班婕妤，东汉班昭、蔡文姬、宋代李清照；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主动和亲的王昭君；蔑视礼教习俗而又忧国忧民追求个性自由的李师师、柳如是、顾太清、吴藻等等。她们批判和颠覆女性的依附地位，在政治、经济、婚姻、性等方面勇敢追求平等自由。在这众多杰出女性中不容忽视的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624—705），她不仅开创了中国男权社会里女人当皇帝的先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传统，而且在变革女性地位、争取女性的自主权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和唐代多元化的文化包容与思想兼容是分不开的，正是唐代浓厚的人本主义氛围，给了女性展现自我的机会和舞台。武则天比西方学者考证的全世界第一位女权主义者法国的彼森早了740年，应该被看作是历史上最早的女权主义者。

唐代追求个性自主、改善女性地位的女权意识及其实践，为当时的民族和睦、国家稳定和社会进步起到很大作用。五代后周时期，敦煌民间成立了民间女性社团——女人社，以自护、自助、自娱为目的，并立有社约文书，立约时间是显德六年（959年），它比西方最早的《女权宣言》要早上832年。之后的宋元明清的女性在男尊女卑封建观念在内的伦理、政治、儒教三合一的文化体制和社会规范以及封建的父权制的压迫下，女权意识及其实践不再以参政议政为目标，而是追求人性平等自由。比如明代归有光认为妇女守节是违背天地大义的：“阴阳配偶，天下之大义也。天下未有生而无偶者，终身不适，是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也。” [6] 李贽的女性观则建立在“天赋平等”的理论基础上，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 [7] 李贽倡导的男女平等的女性观对于明清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起到了重要

作用。清代女科学家、女文学家王贞仪曾呼吁男女“同是人也，则同是人性”、要求打破“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这与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林普·德·古杰《女权宣言》的发布，差不多同时，后者是西方最早的系统阐述男女平权思想的文献。西方国家在17世纪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经济繁荣、思想开放，女权运动也相应地蓬勃发展。相反，中国明末清初时期女权意识与实践规模相对缩小，形式相对温和，渐趋式微，直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才得以复兴。

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女性解放运动可追溯至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起义中，设女馆、放缠足、取缔娼妓、女性同男性一起作战和参加生产劳动，男女平等是其革命纲领之一。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世界历史上还从没有过如此全面深入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说，太平天国是第一个实践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是中国反抗妇女压迫史上最光荣最先进的运动。 [8] 打破了长期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对中国女性的束缚，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的解放，开创了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先河。但是，由于所处时代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太平天国时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但太平天国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想可以视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前奏。

我国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志士提出来的。他们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的影响，以西方进步的人权思想为武器向迫害中国女性的封建伦理纲常挑战，他们废缠足、兴女学、办女报，以期实现女性身体和思想上的解放。维新志士们认为，女性缠足不但会“废天理”、“削人权”、“害家事”、“伤人伦”、“损生命”，更为严重的是“戕种族”也就是对于立国强种的危害。所以，他们强烈呼吁“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 [9] 对于兴办女学问题，维新志士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轻视女子，溺杀女婴，皆为“由女学坠废所致”。严复指出“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列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

贼，责之以圣贤” [10] 。女性并不是天生素质低下，而是父权制对女性长期压迫的结果。康有为等识之士认识到女子受教育状况与国力强弱的关系，“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欲强国“则必由妇学始”。 [11] 所以，他们呼吁政府“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学读书”。谭嗣同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德之大业”，理应“平等相均” [12] ，梁启超提出“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13] 的人权与平等思想。作为戊戌维新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都受到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影响。但是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维新派的女性作为人的权利意识和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女权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近代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在1902年由马君武翻译出版，斯宾塞立足于“自然法权”和进化论，来论证男女平等、男女同权的道理。紧接着，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也译介出版，西方女权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在此影响下，1903年，由有“中国女界之卢骚”之称的最早提出系统女权思想的男性代表金天翮出版了《女界钟》，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并提倡女权的专著。1908年，何大谬出版《女界泪》抨击婚姻制度，提出婚姻自由。另外，1902年5月《女学报》、1905年8月《北京女报》以及1907年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等妇女日报的出版，也为宣传女权思想、提倡女性受教育、探讨女性解放提供了平台。1906年孙雄在《论女学宜注重教育》一文中，描述了西学东渐的盛况：“弥勒·约翰、斯宾塞‘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汨汨而来”。由此，当时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可见一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女性起到了很大作用。孙中山曾在《建国之初亟推广女子教育》文中总结：“此次革命，女界亦有有功。”在《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嘉慰团努力函》文中赞道：“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

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响，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之后，女性成立了“女子参政同志会”，期待能够“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呼吁女性参政，这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解放思想的重点。以唐群英为首的女将们在大闹南京临时参议院争取参政权的斗争中，则体现了女权运动屡试屡败但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曾受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口号的影响，并把它作为思想理论武器，抨击当时封建礼教对中国女性的摧残，积极倡导男女平权。中国近代历史女性解放的序幕由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徐徐拉开。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及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软弱性，使得他们的女性解放思想并没有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在探索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过程中，中国也有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资产阶级人士逐渐认识并且反思到追求女性平等的西方女权运动的不足之处。她们追求的自由平等只是表面上的自由平等，实际并不拥有。而且这些权利的追求并不包括广大劳动妇女。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期冀一种能够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的新的女性解放模式。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出现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1] (旧题)左丘明撰，鲍思陶点校.国语·晋语一[M].济南：齐鲁书社，2005:124.

[2] 杨天才，张善文.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0:331.

[3]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508.列女传序[M].中华书局，1977:14020.

[4] 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特点.载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与健康[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346.

[5]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7.

[6] 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M].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9.

[7] 李贽撰.焚书卷1，答周西岩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

[8] 罗尔纲.太平天国的妇女，见太平天国史事考[M].北京：三联书店，1955:340.

[9] 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71.

[10] 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王栻主编.严复集[M].诗文·（下）（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469.

[11] 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79.

[12]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M]（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304.

[1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新妇女半月刊宣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M].第2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547.

5.1.2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女性解放思想发展

5.1.2.1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性解放思想

国外女权主义思潮是在20世纪早期传入中国，彼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场如火如荼的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为当时的中国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此时期的女性主义主要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思想对中国女性问题起到了主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在中国先后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早期译介和后期广泛传播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女性解放思想的深入传播，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考察中国女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为指导，探讨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么一个国情下，如何改变男尊女卑的社会状况，实现女性解放。五四运动后女性解放思想逐渐趋于成熟，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社会。

中国五四运动后，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积极翻译国外原著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思想。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人Max Orell的《妇女论》，哲父转译了英国Edward Carpenter著的《自由社会的男女关系》，李汉俊转译了德国倍倍尔著《社会主义妇女》中的第三篇《妇女是未来》，李达翻译了《列宁的妇女解放论》，周作人翻译了日本与谢野晶子著的《贞操论》，朱枕薪翻译了《倍倍尔的妇女问题》，震瀛翻译了《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女子》。恽代英摘译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代表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蔡和森则根据此书写成《社会进化史》，用中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武器，思考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女性解放问题。李大钊是“在中国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运用于妇女研究之中” [1] 的人，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再论问题与主义》、《现代的女权运动》等文章中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女性受压迫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女性之所以经济地位低下，就是因为私有制的存在，要女性经济独立不依附于男性，就必须消灭私有制不可。 [2] 而且女权主义的运动仍然具有阶级的性质。 [3] 西方女性争取到的选举权，只反映了中产阶级女性的愿望，对于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财产的为生存而挣扎的劳动阶级的女性来说意义不大。相反若劳工妇女的运动能够取得成功，则“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明确指出了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努力方向。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等高校开设了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的女权主义，包括《女权运动史》、《唯物史观》等，对促进妇女思想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

陈独秀也认为私有制社会里妇女不可能获得解放，要获得女性解放就必须改革社会制度。他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指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而这种情况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 [4] 并且“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 [5]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女性之所以物质方面受压迫，精神方面不自由，完全是因为经济不独立的结果，要想使女性实现解放，首先要让她经济独立，进而精神自由，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解放。这就需要变革社会制度。女性解放的道路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逐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思想，从而替代了西方女权主义。其他如佩韦的《世界两大系的妇人运动和中国的妇人运动》，健孟的《女权运动的根本要素》，衡译的《社会主义的妇人观》，汉俊的《女子将来的地位》，黄芬《先进国之妇女》等等。还

有许多团体出版了妇女专门刊物，如许广平主编的《醒世》周刊，周敦祥主编《女界钟》周刊，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办《劳动与妇女》周刊，在宣传推动女性自身解放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问题的阐述在理论上并不系统，甚至在他们本人思想中也有一些混乱矛盾之处，但他们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途径的论述，仍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转变过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此开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超越了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直接实现了男女平等，这种新型的解决女性问题的模式给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启迪。他们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女性真正的解放，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指导中国女权运动。总而言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积极影响下，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下，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想蓬勃发展。广大女性自身也开始觉醒，主体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都得到极大加强，其中劳动妇女阶级更成为“最有团结心”、“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精神”，是实现妇女解放的“主力军” [6] 。由此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恩格斯女性的被压迫被剥削不仅仅是性别问题同时也是阶级问题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代替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来分析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女性解放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体系的雏形。

5.1.2.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批判和扬弃，为马克思主义女性思想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后，由于广大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一致性，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7]。中国的女性解放理论和西方的女权主义在性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对妇运工作非常重视，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承担起组织妇女运动的职责。陈独秀提出要“切实注意”妇女运动。^[8] 1922年7月，中国妇女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党的二大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通过。决议指出，欧洲资产阶级妇女奋斗了一个世纪，仍然是受资本家的剥削的生产奴隶，而苏维埃妇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西方女性孜孜以求的自由与平等。因此说，妇女解放的前提是阶级解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妇女才能谈到解放。决议的制定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为探求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划清了界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国的确立。

1923年6月，向警予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在中共三大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的口号，号召女权主义者与劳动妇女的联合。^[9] 指出“新兴的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的精神”。^[10] 中共四大也提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要以工农阶级妇女为骨干。邓颖超也认为就事实来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如果仅仅依靠一些力量单薄的妇女知识分子，而不依靠最有力量的工农阶级尤其依靠工农妇女，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后妇女运动的基础，不应建筑在几个人身上，而要包含广阔的加到工农妇女身上”^[11]。以劳动妇女为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找到了真正可以依靠的骨干阶级力量。在妇女运动大联合的精神引导下建立妇女运动联合战线，占国民半数以上的各阶层的妇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掀起了妇女运动的新高潮，扩大了妇女运动的群众基础。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阶段，党的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逐渐消除了共产国际消极影响的阴影，密切联系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把妇女运动的重心从发动城市女工暴动转移到依靠广大农村劳动妇女，党的妇女工作核心确定“在农民组织中作有系统的妇女工作”，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1931年11月7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表明男女平等原则的大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从解决妇女的切身利益入手，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保障婚姻自由，建立专门保障妇女权益的组织，保护妇女权益，极大地解放了妇女，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革命的性质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国内革命战争的一部分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也认识到只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前提下，才能谈到妇女的解放。 [12] 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妇女工作大纲》中规定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在妇女工作中体现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党动员广大妇女投入全面抗战，建立健全各级妇女组织，纳入知识女青年作为新鲜血液扩大党的妇女干部队伍，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军支援抗战工作，“中国妇女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抗战的艰苦斗争中空前提高了” [1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们对抗战的民族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1946年6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中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19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三八”节社论，指出“解放区妇女全体动员起来，实现这三个任务：参战、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就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和妇女自己的解放” [14] 。在这一阶段，党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村妇女获得了土地，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获得

了解放的经济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建立了，积极号召全国上下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参加社会生产，为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并实现妇女解放。中国的妇女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体现了西方女权运动无法比拟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道路的群众性和广泛性。

1949年10月1日，建立新中国政权。这一时期，西方女权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受到排斥和批判，中国妇女运动翻开了新的一页，女性解放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推动下取得了重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男女平等写进了《共同纲领》，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法，它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其中明确规定：“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4年9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发展了《共同纲领》关于妇女权益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向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和封建习俗宣战，在法律上赋予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这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营造了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妇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毛泽东非常重视男女平等，他指出“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15]。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有些家务事可以变为共有的事来办，这样妇女劳动力就解放出来了”^[16] 创办人民公社等组织承担社会服务事业，把女性从琐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对于提高妇女的素质，他也十分重视，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干部在他的培育下成长起来，建立并健全了妇女解放的组织。尽管由于大跃进的急

躁而使之不切实际地夭折，但毕竟是对解放妇女的一种尝试。

在经济上，民国立法承认个人的法人地位，认为妇女是有自主权的法人，允许像男人一样决定自己的婚姻，结婚自由离婚也应该自由，并有财产继承权，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开明人士认为，父权制的承认方式是封建糟粕，不再成为产权的基础。但是妇女对家庭财产的控制是有限的。例如，寡妇不能成为丈夫指定的财产继承人，也没有对家庭财产的监护权，她们只是继承人之一，常常会受到丈夫家人或是丈夫之前子女的欺凌。妇女在离婚后要求土地所有权时，更是会遭到暴力对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共产党1980年的婚姻法则强调夫妻共同拥有在结婚时所得到的财产。1985年通过的遗产法进一步保护女儿的遗产继承权，包括已经出嫁的女儿。由此可见，20世纪的婚姻本身从家庭财产的形式过渡到个人财产的形式，财富属于婚姻双方，但丈夫一方要比妻子一方拥有更大的权利。1949年之后，私人的财富被社会的财富所取代，而国家拥有最大的掌控权。

实践证明，妇女不仅在革命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革命胜利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而且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妇女能顶半边天”^[17]。“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18]，虽然一度出现了男女性别差异被抹杀，男女平等绝对化的现象，但是不可否认，妇女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积极探索中国国情下的女性解放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特色的女性解放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在全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女性解放的思想基础，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太完善的基本国情出发，认识到我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漫长

历史过程，当前的妇女解放工作同样处于初级阶段。根据落后乡村贫困妇女的实际情况，把妇女工作的重点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必须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妇女运动，从社会发展中求妇女解放” [19]。实行改革开放后，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妇女理论的研究两方面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得到了恢复和推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为中国女性解放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女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逐步实现中国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理论。

1990年是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江泽民在《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并把内容概括成五个方面：即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类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参加社会劳动；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1995年，江泽民在中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宣布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同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新世纪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 [20]。他继续秉承着邓小平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展经济，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为妇女的解放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前提；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使男女平等意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为女性解放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基础；坚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坚持实现广大女性的根本利益，因为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说，江泽民的妇女解放理论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特色妇女解放理论的先导。 [21] 在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世纪中国的女性解放事业也坚持同样的原则，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争取女性平等权利，保障女性各方面的利益。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实现的程度。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开展妇女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22]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前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继续把经济发展是女性发展的基础，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坚决消除性别歧视，重视女性受教育权利，提高妇女素质培养妇女干部。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保障妇女权益结合起来，加强妇联工作，一如既往地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发展道路。

在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总结了中国妇女在世界妇女解放史上的重要贡献和功绩。指出在这一百年来的风雨历程中，广大妇女把自身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妇女解放发展道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作为占世界妇女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妇女，对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国广大妇女的贡献和功绩，妇女能顶“半边天”可以说是最高的赞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推进当代中国妇女的解放与发展事业。

十八大召开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是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号召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各阶层广大女性肩负重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继续坚持贯彻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国策，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女性解放道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坚持女性的主体地位，推进女性解放事业。把女性解放和发展事业纳入到党和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把女性解放和发展事业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道路，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理论，又奠定了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理论的实践基础。

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时刻关注中国妇女的前途命运，把中华民族振兴的历程同中国女性解放发展的历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五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他们都非常重视中国妇女运动，并把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同，它不是女性和男性的对立，而是男女两性携手一致，共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邓颖超指出，全体国民面临的共同的中心任务与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具体任务，二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 [23] 中国的妇女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原因在于能够把国家的民族大业和女性自身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24] 在完成国家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同时推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这既是党领导的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特点，也是党领导的女性解放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打开，国外的一些思潮和理论涌进来，其中就包括女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由于和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甚深、关系密切而更容易被接受，逐渐取代阶级解放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女性问题研究的主导话语之一。二者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更是两种不同的女性解放路径。

[1] 全华、康沛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7.

- [2]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N].1921.
- [3] 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J].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
- [4] 陈独秀文章选编[M].中册.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4:104.
- [5] 陈独秀文章选编[M].中册.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4:17.
- [6]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05.
- [7] 中华全国妇女运动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29.
- [8] 中华全国妇女运动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1.
- [9]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92.
- [10]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92.
- [11] 中华全国妇女运动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315.
- [1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
- [13] 中华全国妇女运动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26.
- [14] 解放日报[N].1947年3月8日.
- [15] 毛泽东文集[M].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53.
- [16] 转引自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21.
- [17] 人民日报[N].1975年3月8日.
- [18]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主席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0.
- [19] 全国妇联办公厅.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四十年(1949-1989)[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478—479.
- [20]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1901-2000)[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1.
- [21] 钟瑞添、乌尼日.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J].理论学刊,2010(8):10.
- [22] 沿着党指引的妇女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89周年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9.
- [2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7.
- [2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6.

5.2 中外女权主义差异

5.2.1 历史渊源的差异

中国和国外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虽然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等大致相同的社会形态，但同时又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中国是东方农业大国，社会经济几千年来都以农业为主，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以工业、商业为主要特色。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体系。西方国家在工商业型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国则在农业型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封建宗法制度，女性被束缚在宗族伦理、三纲五常中。古今中外女性在社会中都处在地位低下、附属的地位，这主要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西方女性所普遍接受的基督教文化，《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说耶和華神用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女人和他做伴，所以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而且人类之母夏娃因为偷吃禁果受到上帝要其承受怀胎十月的惩罚，并且丈夫是其主人，要顺从丈夫受丈夫的管辖。《新约·提摩太前书》中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子……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由神圣的主耶稣基督宣告了女性的卑下屈从的地位，成为套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成为迎合统治阶级统治和父权制社会的权威，女性在法律上得不到保护，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要受到歧视，在各方面贬低女性，甚至认为女性乃劣等物种，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或衍生品。直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才逐渐改善了女性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

跟外国相比，中华女性虽然没有背负着西方文化中夏娃的原罪，但是地位低下屈从附属的历史更为悠久，在中国早期文字商代甲骨文中，“女”字就是一个女子屈身下跪的形象。妇女的“妇”写成“婦”，就

是说女子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家拿起扫帚扫地。而孔夫子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则把女子和小人并列。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阶级制定出宗法伦理，维护父权特权统治，摧残桎梏女性。向女性灌输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束缚女性的言行。使女性在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屈从于父权文化权威，遭受性别压迫，成为父权社会的附庸，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边缘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并使这种思想和价值观根深蒂固。在中国存在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使得中国女性大多数并没有受到像西方女性所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的影响，她们所经历的历史命运和国外尤其是西方女性完全不同，中西方女性所处的自下而上的环境产生的差异很大。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下，致使中国缺乏女权主义思潮产生的先天土壤，不能出现像国外那样有广泛影响的、纯粹的、系统的女权主义思潮，也决定了中国女权主义一定是“欧风美雨”的舶来品。在国外女权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传统中庸文化的改造。

5.2.2 文化背景的异质

由于中外历史渊源不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导致文化背景的异质。对于Feminism这个来自西方的外来语，李小江提道，译成中文，早先我们说它是“女权主义”，然后说是“女性主义”，我注意到，但凡说到西方，总说它是女权主义；但只要涉及到我们这片土地，它又变成了女性主义，温和了许多，文化了许多。 [1] 在西方的Feminism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被译作女权主义，后来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了缓慢而又不易觉察的演变。对此，陈志红曾经提到过，《第二性》中文版问世至今已多年，而“女权主义”这株异域奇葩在中国也已渐渐演变成为“女性主义”，至于其间所需要的历史文化过程，则被悄然地模糊和省略掉了。 [2] 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并不只是简单的用词不同，这反映了中外文化背景的异质。

在西方，男女两性别是对立的。男性以统治者的身份剥削、压迫女性，漠视女性的不平等境遇。对此，女性进行轰轰烈烈的声讨、反抗和斗争。西方女性和从宗教神权中解放出来的男性针锋相对，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她们在和父权制抗争的同时，还要和不同形式的反女权思想进行斗争。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体现出来的是西方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对真理的执着探索精神。她们没有受到过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天赋人权，追求在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上具有和男子相同的权利的主体意识比较鲜明和强烈。

而在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和而不同”，“修睦讲和”，追求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阴阳协调，讲究孝道。这些传统文化背景使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要比受宗教教义束缚的西方女性高一些，也比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女性地位高。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特定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中国女性温婉、容忍、顾全大局不具有攻击性的特质，与西方人文主义及女权主

义所具有的内涵大不相同。同时，“相夫教子”和“夫为妻纲”使中国女性长期以来受到女子不能抛头露面的封建思想束缚，使得她们对男性非常依赖，附属性很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中的精英分子秋瑾、何香凝等虽然遵循了“去依赖”、“尽义务”和“增能力”的思想，但在后来革命的时候，则是极大地偏向于尽义务了，一直没能彻底去除掉这种对男性的依赖。孙中山先生曾告诫女性解放要靠自己：“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3]。不论是中国社会中的男权意识还是女性骨子里的男尊女卑潜意识，都是千百年来已浸润在中国妇女血脉中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中国女性缺少主体性的重要因素。这种传统文化使中国女性在寻求自身解放的过程中，从未将男性当作斗争的对象。而西方的女权主义，曾经一度被中国女性看成是文化殖民主义，被当做文化霸权而遭到怀疑和排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女权主义与我们中华民族复杂的文化背景难以相容。

[1] 李小江.关于女人的问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60.

[2] 陈志红.倒序：作为引言，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3] 转引自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254.

5.2.3 理论核心的分歧

正因为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外女权主义和中国女性解放理论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具体国情不同，所以国外女权主义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反对并打破男权社会，而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理论核心则是反对封建压迫与束缚。西方女权主义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哲学基础是主张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这是自然给予的，所以所有人都应该被当做一个珍贵的个体存在，而不能因为他们的性别、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改变。她们追求女性和男性平等的个人权利，争取女性自身权利，提高女性整体地位，唤起女性主体意识，夺回在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被男性剥夺的话语权。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是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根源在于男性的性别压迫，所以把斗争矛头指向男性社会，批判父权制文化的统治和压迫，消解男性霸权主义，以性别来组织反对男性的女权主义队伍，整个女权主义队伍是与男性针锋相对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作为一项单独的女性运动被孤立起来。在西方女权主义那里，性别被作为最重要的基点和视野，遮蔽了对阶级和社会制度的思考。

中国女性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截然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像西方女权运动激进地要在两性的二元对立中寻求女性的独立，急于摆脱依附性的地位。中国女性也并不像西方女性主动觉醒、热情参与、坚定地争取自身权利，是实现自身解放的主体。相反，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在男性的启蒙和领导下，在男性的参与和认同下，被动地被唤醒、被发动参与，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推动下摆脱封建压迫和束缚实现妇女整体的解放。中国的女性从来就不是自身解放的主体。可以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依靠包括男性在内的广大被压迫阶级进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的。对中国女性来说，获得解放是女性和男性携手合作的结果，中国男性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同盟军而不是斗

争的对象，因为女性受剥削受压迫受歧视的根源是私有制和阶级差异，并不是性别差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对立面也并不是西方女权一直与之斗争的男性霸权。这样，中国无产阶级的女性转移了斗争对象，和男性一起夺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走了一条和西方女权主义完全不同的解放道路。

5.3 中国的女权主义的独特之处

5.3.1 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是国家和民族革命的重要部分

整个中国近代史里面，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史就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女性的解放运动都是作为国家和民族革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终极目标是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是纯粹立足于女性本身的利益[1]。中国的女性运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整个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国女性所受的压迫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女性的压迫，中国女性要解放，首先要推翻这三座大山，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全体人民面临的紧迫任务。妇女解放必须是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前提下。获得妇女解放的前提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女性的利益更多地置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中。妇女的革命对象就是整个社会革命的对象，而整个社会革命的对象就是妇女的革命对象。只有在提到社会革命时才会想到妇女运动，强调女性要加入到社会革命当中去，在社会革命中追求女性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逐渐认识到妇女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础上，毛泽东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2] 只有民族民主革命战争才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女性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系在一起。毛泽东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具体化为四权压迫，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束缚中国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

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它们“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3] 既承认在中国男性和女性遭受压迫的共性，又承认女性遭受压迫的特殊性——夫权的压迫（性别压迫）。既在共性中区分了特殊性，又在特殊性中把握住了共性。中国女性受压迫不仅是封建宗法社会父权、夫权思想长期统治的必然结果，还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对女性遭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做出全面深刻的揭示，指明只有把中国的女权运动融入到社会革命当中去，女性的利益服从于国家和阶级的利益，才能改变妇女自身的命运，实现彻底的解放。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妇女则从家庭厨房中解放出来，成为和男性一样的光荣的社会劳动者和建设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与社会革命同行，成为国家和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女性解放与国家和民族安危息息相关，在许多危难的历史关头，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总是带有与主流社会合拍的忧国忧民色彩。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和阶级解放相连，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不同之处。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占世界妇女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妇女获得了解放。中国的妇女问题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问题从社会革命中区分出来，所以严格地讲，中国从来就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女权主义运动。这不仅是因为东西方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的差异，更因为中国女性一直都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女性的命运从始至终是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而不是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在国外，妇女解放是妇女自己的事情，女权运动也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进入不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流。而在我们中国情况则相反，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妇女解放始终是国家提倡和领导的，是作为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成果，是国家和民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陈曦.社会革命中的妇女解放运动[EB/OL].[http://www.sex study.org/article.php?id=305](http://www.sexstudy.org/article.php?id=305).

[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9.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5.3.2 中国女权运动的男性特色——父系的女权主义

中国的妇女解放始终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组成部分。中国的女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精英们较先觉悟为源头的，也可以说是男性为摆脱压迫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所以，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者从来都不是妇女自身，而是她们的性别对立者——男性。是中国一部分有进步意识的男性知识分子接触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认识到解放妇女是“人”的解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的妇女问题是“强国强种”的重要问题，从起初的废缠足到兴女学，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维新变法代表人物发起与倡导。“是故女学最强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也” [1]。1902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陈范等人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辛亥革命后，规定“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 [2]。确立了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中国女权运动的男性倡议者们还认识到自主婚姻对个人幸福与国家社会和谐昌盛的关系，指出，“欧美诸国，男女自择，阴阳和谐，内无怨女，外无怨夫，群治之隆，蒸蒸日上” [3]。与天足运动和女学运动以及反对包办婚姻相比，女性的财产权却少有人提及，原因在于中国的女性解放是为民族独立服务的，女性的财产权不但对民族革命无益，反倒损害男性的利益。在由男性发起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国，直到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1930年南京立法院通过的《民法继承编》正式承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 [4] 至于妇女的参政权和选举权更是受到军阀和政客们的阻挠。到1922年，共产党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规定：“帮助

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 [5]。中国女性解放的主体并不是女性自身，而是她们的盟友——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精英。这些男性精英们对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领导、参与、帮助妇女实现自身的解放，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上，中国男性甚至比女性自身作的贡献要多。

西方女性面对的始终的一个完善的男权社会，所以她们和男权斗争，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中国女性面对的始终是民族和国家，男性不是她们的对立者，而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是同盟者。而且和西方女性的独立与自我解放的精神不同，中国女性由于几千年来深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一直依附于男性的羽翼下，缺乏独立和斗争的意识，中国女性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缺乏主体性，一直以客体的身份出现。中国的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一切服从于社会革命，而这些社会革命，都是在男性的领导、提倡和操作下的，社会革命甚至是妇女解放始终都不是妇女自己的事情，妇女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得益者。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更确切地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男性解放女性的运动。在国外，是妇女解放，而在我们中国，则是解放妇女。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从来都是在男性的帮助下，中国女性缺乏主体自觉性。无论男性是在“强国强种”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还是在为男性自身的婚姻家庭幸福强调女性解放，都没有从女性自身主体的角度争取女性实质性的权利。而是从男性的角度妇女所充当的工具——妻子或母亲，而不是从女性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性角度。即使是解放后“男女都一样”的政策下，“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也是以男性的标准来要求女性，是以男权为主的国家机器推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手段、工具或者符号，“女性并没有获得个性自主与性别意识，不过是特定的政治话语支配下的承载政治经济革命使命的意识形态的整体符号” [6]。男性倡导的解放妇女是为男性中心社会服务，服从于男性的主体地位。男人认为解放妇女就是拯救与恩惠妇

女，他们作为整个世界的主宰以男性的标准同化妇女，以男性的尺度校正妇女。所以，李小江把中国的女权主义称之为“父系的女权主义”。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这是中国女权主义的重要特点。

- [1]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6:43.
- [2] 王美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92.
- [3] 凤城蓉君女史.婚姻自由论[N].清议报76册.1901.
- [4] 何黎萍.中国妇女争取财产权和继承权的斗争历程[J].北京社会科学，1998（4）：54.
-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
- [6] 李钧.论大跃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J].齐鲁学刊，2004（5）：150.

5.4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构建中国女权主义的借鉴价值

严格说来，中国的女权主义和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女权主义有很大不同。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女权主义并不只强调女性自身个体解放，也不直接与国家、民族、社会以及男性群体对立，而是能够和男性结成同盟，把个体融入救亡图存的革命群体洪流中，个体权利让度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中国女权主义发展具有包括西方女权主义在内的理论资源。

5.4.1 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理论资源

首先，中国女权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一是国外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上自五四运动后的再一次“西学东渐”以来，我们话语范畴内的女权主义，无论是概念、范畴还是体系都停留在西方女权主义的领域。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莉莎·沃格尔（Lisa Vogel）、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艾里斯·扬（Iris Marion Young）、阿利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等等，这一个个鲜活的名字和背后深邃的理论思想，是我们进入国外女权主义世界的路径。国外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是中国语境下的女权主义强劲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无尽探索的理论资源。

1900年在《清议报》上出现“女权”一词，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关注。直到马君武译介的斯宾塞的《女权篇》、约翰·穆勒的《女权说》和金天翮的著作《女界钟》， “女权”一词才逐渐深入人心，被中国理

论界接受，成为女性解放的口号。五四运动后大量的西方先进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追求个体自由的男性精英受到西方“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女性和西方文明世界女性在受教育以及男女平权等方面的差距，认识到国家的强盛和文明程度与女性的状况有关。同时陈撷芬、秋瑾、张竹君等先进的女性知识分子通过办报纸论述女权，呼吁将女子从压迫下解脱出来，不依赖男性获得自立，男女平权。何震在《女子解放问题》一文中提出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体现了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精英和女性先驱都在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下为引导女性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女权主义先驱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放在女性的进步和发展之前。先要救国、强国，之后才谈得上女性个体的发展。女权让位于民权，这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国情下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五四运动后女权主义思想发展逐渐成形，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彻底改变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方向。

其次，中国女权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二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帮助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 [1] 经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传播，帮助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代替资产阶级的人权学说，以此作为理论武器分析中国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问题。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妇女解放的具体问题，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了胜利，民族

民主革命获得了解放，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与中国革命事业同步进行，同步前进。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妇女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在推动革命胜利和社会发展方面，女性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西方女权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为突破传统女权主义的束缚，为女权主义探寻新的理论基础，使女性能实现全面彻底的解放寻求新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为理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其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女权主义的性别分析方法。朱丽叶·米切尔的名言是：提出女权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家务劳动、社会再生产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在国外女权主义持续关注、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我国的女权主义发展更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探讨中国现实的女性解放和发展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使其成为中国女权主义丰富的理论资源。

再次，中国女权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三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近代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精英是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接触到的西方女权思想，所以，中国的女权必然是在民族兴衰的大背景下才能被提及。从“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发，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奕事体弱，是皆国民也，何以为兵乎？”^[2]“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过缠足乎？”^[3]把妇女缠足与国民强壮、救国保种联系到一起，由妇女身体的健全指向了民族和国家兴衰大业。到“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4]，再到“力倡婚姻自由，再济以（女子）学问，国家也自然强固”。^[5]无论是废除女子缠足，兴女学为女子争取平等教育权，以及反对包办婚姻提出婚姻自由，出发点都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解放女性，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计。写过《女界钟》的金天翮强调“爱国与救世乃女子的本分也”^[6]，主张以做“国民之母”为目的的“女权”，反映出

在民族危亡时期国民包括女性自身对女性权利义务的态度和理解。1912年1月11日《民立报》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为了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女性也认为在当时民族危亡时刻重要的不是急于寻求女子自身的权利，而是首先要自强自立，能有资格有能力和男子一样救国图强尽国民的义务。欧佩芬在其专论《敬告选举举权之女同胞》中指出“我国女界不患无急之雄心，而患乏自治之能力；不患无参政之权，而患乏参政之学” [7]。《中国新女界》杂志指出，“其女国民惟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之不惜” [8]。对女子晓以大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民族利益，强调女子解放，其实质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和强大。可以说，中国的妇女解放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初西方女权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的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遇到，并利用女权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武器，到了战争年代，战争把妇女推向了社会，但是中国男性没等女性接触到西方女性主义，就将它淹没在国家民族革命之中，强调中国女性解放要和反帝的民族解放与反封建的阶级解放共同进退，女性解放蕴含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之中。直至新中国的成立，在法律保障下中国妇女逐步走向社会得到解放。可以说是国家完成了对妇女的解放，而不是妇女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国人的主要任务从救亡图存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发掘这种资源 [9]，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的力量，正如一人双手、一体两翼，不能缺少。 [1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妇女能顶半边天” [11] 的作用，新中国的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同时也出现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不顾女性生理特点，极“左”地要求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从事强度过大的劳动，女性男性化的偏差。在国家和民族重建和复兴的过程中，作为国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共同面对民族危急、国家贫困、社会发展等问题，这种时代背景下，女性权利让位于国民责任，这是中国女权和国外女

权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之处。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2]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摺.麦仲华编.戊戌奏稿[C].上海：广智书局.1911:43.
- [3] 曾继辉.不缠足会驳议.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71.
- [4]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M].（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37-44.
- [5] 江毓真.论婚姻自由的关系[J].载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10日.
- [6] 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A].李又宁：华族女性史料丛编（1）[C].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11.
- [7] 欧佩芬.敬告争选举权之女同胞.民立报[N].1912年6月7、8日，第12页.
- [8] 谈杜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上海：妇女共鸣社.1936:15.
- [9]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58.
- [10] 转引自全华、康沛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6.
- [11] 人民日报[N].1975年3月8日.

5.4.2 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

中国的女权主义成长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和产生于发达大机器工业基础上的西方女权运动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女权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更多地提到的是“解放妇女”或者“女性解放”。很少用女权主义来表述，女性主义是近几年的提法。这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差异，其中蕴含着民族文化以及指导思想和解放路径上的差异。要发展中国女权主义，就必须正视和国外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取其所长，用其所需，使其成为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源，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找到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英国的女权主义对涉及制度、阶层等的社会实践极为注重；相比之下，法国女权主义对女性的个体经验更为注重，把压迫女性个体的权利结构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中国的女权主义则比较注重传统的群体文化。在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无论是儒家探讨人与人的关系，还是道家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阴阳和合”，虽然是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但都反映了“和而不同”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男性和女性虽然各有不同之处，但是不能脱离彼此单独存在世上。所以就要探讨如何在新的关系中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无论是歧视女性仰视男性，还是抬高女性贬低男性，都是对人的自然性的异化。性别霸权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追求的是性别的平等与尊重，共存与和谐。中国的女性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不同，深深植根于群体文化之中，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最高理想。这种差异正是我们可以挖掘的宝贵的本土资源，也是中国女权主义对全世界女权主义的独特贡献。

中国的女权主义，产生于国家和民族危亡之中，始终是与国家和

民族的建构联系在一起。中国革命的内容就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内容。中国的女性不仅是女性的，更是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群体的……女性“不是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而从男性手中夺取权力。相反，他们的目的在于使国家现代化，重新建设这个国家以及为这个国家争取国际上的尊重。”^[1] 这一论点明确表明了女性作为国家公民的强烈的责任意识，也表明了中国女权运动与国家革命和建设之间紧密联系的特点。因此，王绯指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从来都是和国家、民族、阶级革命紧密结合为一体，在中国，女性的群体意识要高于其性别主体意识，是由超越性别的国家社会革命来促动女性自身解放的觉悟和行动。^[2] 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救亡运动相交叉，中国女性追求国民救国义务要远超过自身权利的争取。对此，戴锦华指出，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而是具有先进思想的精英先提出女性平等问题，然后由国家政权力量规定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3] 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女性解放是国家阶级革命的附属结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女性解放是国家政治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两方面维护女性权益。对于中国这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来说，女性问题不仅仅是性别的问题，更是全体国民救亡图存和发展建设的必要路径。但是不管是出于男权政治的立场还是国家统治的要求，达到了既巩固女性阶级解放的结果，又加强了国家和女性的联系，形成了中国女性解放的独特轨迹。

李小江指出，“妇女与国家的关系，在西方女权运动中是一个弱点，因此长期以来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盲点。今天已有所弥补，这个弥补恰恰是借鉴了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运动的经验而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探索在今后国际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4] 作为国家民族革命和建设一部分的中国女权解放运动与国外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独立的女权主义有着很大差异。中国的女性运动并不只强调女性自身个体解放，也不直接与国家、民族、社会以及男性群体对立，而是能够把个体融入救亡图存的

革命群体洪流中，个体权利让渡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

中国女性个体的解放首先要以国家民族的解放为前提，女性不但代表个体的生理意义上的人，而且还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及其阶级存在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社会主义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思想，使中国妇女拥有西方女权为之苦苦斗争的意识形态背景。同样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中国妇女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女性用二百多年完成的社会化，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女权运动使妇女走出家门成为“社会人”；国家颁布法律保障妇女在各方面的平等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中国妇女平等权利的获得，较之西方女权具有“立法超前”的性质 [5]。西方女性是先有自主的性别平等意识，通过几百年的奋斗争取得来法律的平等。而中国的女性平等权利，是在女性群体自主意识觉醒之前，通过国家立法干预获得的；国家通过行政力量推进妇女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这种方式要比一切女权运动抗争都要有力度，使妇女解放超越于社会发展。九十年代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女性面临严峻的生存发展挑战。同时，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中国妇女作为中国在世界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和行政举措扶助困境中的妇女群体：在“希望工程”中设立专门针对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救助失学女童数十万人，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注重妇女生育健康；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严禁卖淫嫖娼；关注下岗女职工再就业问题等等，缓解了大量女性社会问题。国家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等各种行政手段使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深入人心，同时更使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得以体现出来。 [6]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妇女的解放和发展。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实现女性解放，是在男女两性保留各自性别特征的基础上均衡发展。这和马克思主义追求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而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指导思想，主张两性和谐和群体

利益。可以说，中外女性主义实现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各自的发展特点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能相互置换的。正如帕特南·童所说：“很清楚，要将追求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压力与追求整体性和同一性的压力协调在一起，这是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的重大挑战” [7]。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建构一个开放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理论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 游鉴明、罗梅君、史明主编.共和时代的中国妇女[M].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180-181.

[2] 王绯.空前之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1.

[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5-26.

[4] 李小江.新时期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李小江主编，平等与发展[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357.

[5] 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J].《浙江学刊》，2000（1）：60.

[6] 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J].《浙江学刊》，2000（1）：60.

[7]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

5.4.3 正确把握中国女权主义历史内涵

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女性在“社会性”解放的基础上，“主体性意识”得到觉醒，逐步走向独立自主的个性化生活，在保持自身中国特色的同时，逐渐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在整个世界女权主义领域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关注点肯定与西方不同，我们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找对我们有用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在与西方交往中不会失去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本土化的过程”^[1]。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女权主义，重问题甚于重理论。对中国女权主义的研究，是对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并积极寻找对策。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无法磨灭的重要历史作用。国家也通过政权力量推动女性解放，在法律、政策法规等方面保障妇女权益。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不再以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国家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给我国广大女性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也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妇女问题。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过剩、劳动强度过大等社会问题，国家采取舍车保帅的策略，牺牲广大妇女的利益来暂时缓解改革中必然出现的阵痛。当妇女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出现冲突时，妇女又再一次地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另外，一些封建意识有所抬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泥沙俱下。女童失学、女性回家、女工下岗再就业难以及拐卖妇女儿童、性骚扰和虐待妇女、纳妾嫖娼等等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生理和生育问题让她们处于劣势，双重角色的社会身份让她们在改革大潮竞争中举步维艰。

2011年7月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根

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妇女现状确定了一些优先发展的领域，如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教育、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社会保障、妇女与环境、妇女与法律七个优先发展领域。本着全面发展、平等发展、协调发展和妇女参与的原则，争取女性的生存权利，争取社会对两性发展的平等和公正，解决与广大女性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

5.4.3.1 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女性参政问题

女性参政问题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女性社会地位以及这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新中国成立后，大幅度地推动了女性参政议政水平，实现了国外女权主义苦苦争取了上百年的政治权利。但是中外女性参政权获得途径并不相同，国外女性是通过漫长的女权运动争取到的，而中国的女性则是由国家政策法规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的。有学者称，中国的女性参政模式可称为“政府主导型妇女参政模式” [2]。正因为如此，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民主参政意识没有国外女性强。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社会对女性参政的认同度也很低，使得多年来中国女性的参政觉悟和参政程度都不高。在国家权力层和决策层女性处于边缘化状态。不能说是政治花瓶，但女性的民主政治参与更多的是一种非权力的外围参与，呼吁的多，但是对于法律和政策法规的影响力却很小。有地区按比例分配女性参政的名额，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公平不但违背民主选举的原则，而且容易产生不能胜任的干部，损害的不只是女性的权益，而且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都是一种损害。这是政府对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照顾，并非真正意义的女性参政。

中国女性参政的基本制度是委任制，由上级单位决定女性干部的任免。在中国这个父权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里，女性参政还是以男性本位的意志为转移。“妇女参政”的履行演变成一种按男性本位格局进行职位分配的形式。始终没有将妇女群体要求与男性同等参政议政纳入妇女参政的目标给予支持和认同。 [3] 女性参政的目的是为女性群体的合法权益呼吁争取进而影响国家决策，从而维护女性群体

的权益，扩大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但是一些女性参政议政者本身群体意识淡漠，不能积极主动代表女性这一群体的整体利益，这样不仅不能提高女性的参政议政程度，也严重影响中国女性群体的进步和发展。

5.4.3.2 经济竞争劣势化——女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

在就业市场上，女性和男性相比明显居于劣势地位，许多用人单位明里暗里都排斥女性就业。究其原因并不是女性的生理性别，而是因为女性承担着照料家庭任务而显现的社会性别。女性和男性先天的生理差别以及后天不合理的社会分工，给女性带来双重生产的压力。哺育孩子、照料老人和日常生活等繁琐的家务使女性们无暇兼顾事业。就业市场对已婚和已生育女性充满歧视，同时，未婚的女大学生毕业生因为存在着结婚、生育以及照料家庭的潜在责任和负担，在就业市场上也处于劣势地位。据岳昌君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女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低于男生，而在工资水平和就业满意度上也不如男生。男大学毕业生在国家机关、国企、第二产业就业的居多，而女生主要在事业单位、私企和第三产业等服务性行业就业的比例高于男生。^[4]女生大多从事传统的“女性”工作，诸如家庭教师、文秘、护士等技术含量不高、薪酬水平较低的行业。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转型，也是引发女性就业危机的重要因素。实行市场经济后，男性凭借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的优势，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原则来淘汰女性，使得大量女工称为市场经济和企业改制的牺牲品而纷纷下岗。那些40、50的下岗女职工再就业基本就是家政、保姆、餐饮服务之类的辛苦而工资低的工作，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成为中国女性主义关注的现实出发点。

20世纪以来，中国共有五次关于让妇女回家的讨论。每一次妇女回家的提出，都与就业相关，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关。讨论妇女回家的问题，除去传统观念问题，还有社会基本制度的问题。1933年—1937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侵华后，大量企业倒闭就业岗位紧张；

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后方就业岗位不足；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不再实行上山下乡政策，大量知青返城回流，导致就业难；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贫富差距加大，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出现“全职太太”；2001年，政协委员王贤才提出让妇女回家，提倡女性阶段性就业。2014年人大代表王幼君提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三年，让人想起妇女回家论和女性阶段就业论，看似对妇女关爱，实则是剥夺了女性的就业及社会参与平等权，在既有的性别差异模式下让不平等固化和延续，将会使本已受歧视不公平的就业环境更加雪上加霜。妇女回家，是当代妇女双重角色向传统角色的回归，是牺牲女性的社会价值来获得男性的社会价值，此种不平等会对女性发展产生一系列社会深层障碍。

5.4.3.3 文化教育弱势化——女性教育不平等问题

消除教育性别不平等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但是在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仍然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据联合国统计，2011年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排名第35位。^[5]尤其农村地区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性别差异还很严重。因为被繁重的家务和劳动束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失学率和辍学率都偏高，而入学注册率和毕业率则明显低于男童。女性文盲是男性文盲的两倍多。^[6]在高等教育阶段，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女生要少于男生。^[7]而且尽管女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和学术表现比男性优秀，但女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却没有男生的理想，也就是说社会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低，女性用教育来改变命运机遇的可能性比男性低。

究其原因，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和文化是影响女性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这一长久以来受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影响的国度，由男性控制的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女性仍然产生歧视和束缚。“相夫教子是女子的本分”的传统性别分工，“男主女从”，“男高女低”的传统婚嫁观念等等，都会使社会上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向男性倾

斜。虽然在2006年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但是家长从机会成本角度考虑，认为女孩子去读书会减少干活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不会选择让女孩去上学。所以，尽管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城市的教育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大幅度提高，但是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比男性要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性别歧视文化背景下，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教育回报也很难理想（高薪体面的工作和美满的婚姻）。女大学生在就业市场和高学历的女性在婚姻市场同样遭受严重的性别歧视。所以，社会教育环境平等、教育资源分配和男女获得自身发展机会的公平是中国女性一定时期内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在。

5.4.3.4 社会人权私人化——女性家庭暴力及性骚扰问题

全国妇联针对家庭暴力的最新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我国，遭受家庭暴力的人数已经多达4.5亿，其中占比例高达90%的女性已成为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者。 [8] 国务院《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公布：全国2.67亿个家庭，有1.54%的家庭解体，其中25%起因于家庭暴力。90年代后期国家充分吸取了一些女权主义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条款，使家庭暴力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法律之中。将人们一直认为的家庭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又将社会问题进一步转变为国家政策法规问题。但是由于条款规定过于抽象缺少可操作性，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传统的夫权本位思想和家本位观念是产生家庭暴力的思想文化根源。有不少人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公权力不应该介入家庭私事”，把家庭暴力归入家务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家庭暴力虽然发生在家庭，但却不是家务事，而是违犯法律、侵犯人权的社会问题。其实质是维护男性在家庭里对女性的支配与控制的特权，是父权制统

治下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思想作祟。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反对家庭暴力就是国外女权主义强烈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不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更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认为女性之所以遭受家庭暴力和压迫，低下的经济地位是其根本原因。历史上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分工导致了男性经济上的优势进而取得特权统治，而女性经济上的劣势决定了依附于人、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被男性虐待、控制。从人权的角度讲，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不仅意味着对单独某个女性的暴力，而是意味着女性这一群体缺乏社会安全。制定反家暴法，开展社会救助，唤起女性的觉醒，反抗男权中心统治，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性骚扰是性暴力延续的一部分，是性伤害的一种形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外社会都把性骚扰作为个人的麻烦，而不是作为社会公共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才得以逐渐改变。在这一次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兴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个人的也是政治的。从此性骚扰才成为性别理论研究的主流。女权主义者认为，性骚扰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心理或生理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和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密切相关，同其他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样，性骚扰是男人在各种领域中用强权掠夺妇女资源的反映，是对弱者的欺凌、侵犯和使用权力的表现，性骚扰和家庭暴力都是男性对女性施展权力和控制欲望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

5.4.3.5 性别文化物质化——女性身体商品化问题

把妇女客体化、商品化是腐朽的物质主义性别文化形态的一种反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电视、网络、商场、报纸杂志，铺天盖地都是商业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或丰乳肥臀，或性感妖娆，女性身体被物化被商品化，女性沦为“身体化”的存在被作为客体广泛消费。各地选美、模特大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女性身体被最大程度地商品化，胸、大腿、嘴唇、脸等每一个部位都被物化成商品。所谓的“美

女经济”把人物化为商品，把女性物化为经济。现在社会上的“富豪相亲”、“成人奶妈”甚至“女体盛”的存在都是把女性当作商品，对女性尊严的一种消费。在消费社会里，女性存在最大的价值就是她们的身体，并不是她们的精神内涵。物质主义性别文化把女性形象商业化，简化为身体商品。看似女性消费商品，实质是社会在消费女性。裹脚充其量会使女性肢体残疾，整形美容手术却会带来生命危险。即使从身体美学的角度来看待整形美容手术，也是和女性身体美的本质相悖的。加拿大女权主义者凯瑟琳·摩根认为整形美容手术是消费市场“对女性身体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women's bodies），是资本市场和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合谋的迫害工具。女性一旦参与到资本主义的审美机制中身体就不为自己所控制，成为“驯服的身体”（the docile body）[9]。女性身体被异化、被物化、被商品化，成为被观赏和利用的工具。这种现象是资本的逻辑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消费社会，男性掌握着财富和权力，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两性之间男性掌握着话语权，领导着消费市场的走向。媒体和广告制造的“现代”女性形象，大多由消费主义、传统女性气质和性感组成。[10]以男性的审美标准把女性的身体作为商品来加以凝视，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伯格提出的“男性凝视”（the male gaze）问题反映了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男性利用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观赏、占有和宰制，把女性当作被消费的客体用以陪衬男性，女性地位彻底被边缘化。女性被身体化，完全忽视了女性的精神内涵，她们仅仅被肤浅化和程式化地看作一个符号、一个工具，成为资本绚丽的符号和工具。她们作为个体的人的内涵被无视，这是资本的逻辑和父权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哲学和文化角度讲，资本主义普世审美标准和父权制对女性的主宰和压迫，导致女性主体性的缺乏以及女性自我人格认同的障碍。消费社会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和异化，在实现资本获利的同时也重构着父权制文化的意识形态。

- [1] 王政博士在2000.8.16~19天津首届“读书与课程建设研讨班”上的总结发言.
- [2] 俞萍.中外妇女参政的差异比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8): 65.
- [3] 俞萍.中外妇女参政的差异比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8): 67.
- [4] 岳昌君.高等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比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6): 80.
-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EB/OL].[2012-03-28]<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1/>.
- [6] 连鹏灵、郑真真.教育的性别差异.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5: 人口转变与教育发展[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7] 岳昌君.高等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比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6): 76.
- [8] 林美卿、贺策.我国女性遭受家庭暴力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10(6): 56.
- [9]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p136.
- [10] 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杜芳琴、王向贤主编,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86.

5.5 国内学界对构建中国女权主义的成就与思考

5.5.1 向警予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体

1922年—1927年间，向警予、萧楚女、蔡畅等女理论家们把理论主体妇女当成了她们组织责任的一部分，她们的决策中吸收了许多和其他进步女权主义者相同的设想。她们借用进步论女权主义的张力，在社会学上把它在起源上的差异定位如同于阶级差异，而且在地缘政治上定位得如同民族历史差异。中国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早期设计者们明确反对“女性”这一用语，想在自己的著述中使用“妇女”这一词语。“妇女”这一女性理论主体的出现与苏维埃俄国和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女性理论主体最初不是受侵蚀或是精神动态上的。“妇女”是经济的、历史的、理论的和公开政治的，而且它在革命的社会实践中又重新定义了自己。在其所有的历史特征中，“妇女”的所指对象是“世界的工人们”。所以，中国的“妇女”具有起源上的差异，但这一根本的差异是民族的和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3年—1927年），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把“性”的定义中“差异”和“身份”的观念排除在外，把“女人”或“妇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范畴保留了下来。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提出女人作为“妇女”，作为中国历史之现代范畴的民族标志，并把女性主体及其实践置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心地位。向警予认为，正是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把妇女和国家维系到了一起。妇女运动是随着国民运动起来的，没有国民运动也就没有妇女运动。妇女本身利益要求女性参与民族主义政治，就

像它在历史上1911年革命和1913年联邦制的尝试中所做过的那样。妇女运动必须依靠国民运动支持，因为国家是抚育国民权利和能力的机构。她假设中国民族革命会与印度模式相类似，而且，根据俄国模式进行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未来变革在历史上也必将是不可避免的。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保证了欧洲模式中的文明的人权，所以中国妇女运动通过为国家效力也就是最好地帮助了自己。 [1] “妇女”特别应当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为她们的定位是有双重价值的，妇女在国民运动中一面要能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政见；一面要能代表全体妇女的要求，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当“妇女”在政治上行动起来表达他人或自己的时候，她实际上在巩固自己的解放。国家灭亡了，个体的女人和女性整体也就不会存在了，因为，依附性的女人把自己牺牲给了个体的男人，从而丧失了她们为国家效力的权利。向警予还是支持现代主义的国家历史观点，并在全球政治背景中假定了一个中国妇女运动的主体。

萧楚女则认为，当“女”这个字联系到“人”这个字上时，不可避免的贬低就出现了。当女人把自己定义为不同于男人时，即使最好的男人也不想躲避表现出女性的“女人”，因为二元结构的“女性\\男性”会自动地让它变得看上去“好像女子是另一种动物”，也就是说，她们不是“人”，“女性”的自我结果只能是“他者”，一个男人个人手中的玩物。所以，中国的妇女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与苏联结盟，并加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

邓颖超认为，要求政治权利和融入历史并没有错。尽管历史上中国妇女运动要采取印度或苏维埃俄国而不是欧洲模式，女性主义的核心观念——普遍的人权、妇女权利、对默许的不平等的即时批评——仍然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传统部分，资本主义自身的进步触发了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发展。 [2]

何香凝则把妇女主体置于这样的理论坐标中；一边是半殖民主义、半封建主义、不平等条约和经济帝国主义；另一边是儒学的社会

准则礼教，它们一起把女人涂抹掉了。何香凝认为，在殖民背景下进行妇女解放，需要妇女参与到民族革命中。这种参与可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你不能责备女性不能进行各种层次的斗争和像中国男性那样的献身，她以独特婉转的方式解释了原因：因为殖民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条约口岸的文化合谋起来使女性显得愚昧无知。

1925年，蔡畅在《俄国革命与妇女》的文章中，描述了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把自主独立的妇女工人运动和列宁主义革命联系到了一起。由自主独立的妇女运动所进行的宣传努力和直接游说的结果，是使妇女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融合了起来。蔡畅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上，这一事件实际上把妇女变成了民族重建的中心。她指出，在俄国，没有独立的工人妇女运动，都是与更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结合起来的。俄国妇女在政治上一切男女平等自由，中国妇女也可以期待着同样的事情发生。妇女成为无产阶级内部另一个女性主体，她们被置于与劳动原则相关的地位，而不是作为一个无差异的人文范畴被置于男性的对立面。 [3] 蔡畅在《苏俄之妇女与儿童》一文中指出，无论妇女和布尔什维克党如何紧密合作，女子和男子真正的平等也无法获得；只有母亲职责社会化，成为国家的责任、民族的责任，而不再是个体家庭的财产，这样的时刻才能到来。中国共产党妇女部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计划，用历史词语把普遍的主体妇女重塑为历史的主体。妇女本来不是自然中的主体，主体妇女本身就是历史的，从而是可以解放的。

这些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战略上把妇女构想成一个集体的、内部分有层次的政治主体，并坚持从自我认同的女性视角去看妇女问题在共产党的策略中的位置。

[1] 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妇女周报》，1924:223-224.

[2] 邓颖超.在汕头妇女联合会上的演说.妇女之声汇报，1926:314-316.

[3] 蔡畅.《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妇女运动议决案》，《资料》，1926:475-478.

5.5.2 李银河受争议的女权主义研究

李银河，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师从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性学家。主要著作有：《女性权利的崛起》、《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女性主义》、《性的问题》、《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酷儿理论》等。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中国社会对“两性”问题的认识逐渐开放，性文化经历了巨大变革，但李银河关于同性恋、虐恋、换偶、性工作者、二奶、艳照门等的一些言论依然饱受争议。而李银河是中国较早接触和介绍国外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她的一些关于女权主义的研究，为中国女权主义研究和性别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李银河认为，尽管女权主义理论千差万别，但是在一点上保持高度一致，那就是：父权制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它是人为建构的，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在最近的百年间，在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的不懈努力下，风起云涌的女性运动的作用下，父权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父权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大量存在导致人类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性别正义问题一直处于被扭曲的状态。父权制规定了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事情。按李银河的分类，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统治方面的男性统治，在男权制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领域还是在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而不是相反。

第二，在社会认同方面的男性认同，核心文化观念关于什么是好

的、值得向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总是同男性和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

第三，在男女关系方面将女性客体化，在男性事物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很多的领域。

第四，在思维方式方面男权思维方式，主要有两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崇尚直线发展型模式。在男权制的阴影下，女性一直处于一种被压迫的地位。 [1]

李银河指出，女权主义认为即使是为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说话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完全摆脱父权制思维的羁绊，认为马克思主义知识把生产无生命的物品当作劳动，而没有将养育孩子视为劳动。在家庭的自然劳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提供令人满意的历史解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性别没有成为统治的特殊形式，独立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一点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兴起时才有所改观。“工作”概念的性别盲点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当代经济理论中继续存在，女性在劳动市场上仍旧被赋予较小的价值，得到较少的报酬。

妇女在家庭与生育中的地位问题是一个关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20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家庭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妇女在家庭与生育问题中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妇女在家庭婚姻中的权利包括多项内容，例如妇女选择配偶的权利，离婚的权利，再婚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姓名的权利，以及继承权等；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则包括她们与男性相比的家事决定权、家务劳动分工等。国际人口会议指出：“妇女控制自己生育的能力是她们享受其他权利的重要基础。” [2] 在中国，过去一般的家庭都是男人当家作主，但是在妇女成为家庭收入的近一半来源之后，这种情况显然有了改变。大多数妇女已享有基本的生育自由，能够获得避孕知识，

能自主地决定生孩子的数目和生育间隔。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水平，从而使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背后折射出一个心理观念、价值取向的现实问题，婚姻状况及其变化与女性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

针对女权主义从妇女地位角度反对妇女卖淫的论争，李银河认为，这是分析卖淫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角度。从男女平等的标准来看，妇女卖淫现象是和男性霸权分不开的，甚至可以把它视为男性霸权具有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的表现。卖淫使女性的身体商品化，供男性剥削和消费，反映出女性地位的低下。女权主义理想中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没有妇女卖淫现象的社会，因此西方女权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持有坚决取缔卖淫的观点。但同时这一观点又限制了女性掌握和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于是，妇女运动在卖淫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境地。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贫困地区的妇女以卖淫为摆脱贫困的手段，出现“笑贫不笑娼”的情况，这同样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低下以及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中国对卖淫的社会活动和卖淫人群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行的，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味打击就能奏效的。正如沃芬顿报告指出的：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在性的问题上，最高的道德境界是：性应当是免费的，性服务应当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应当是男女平等的，不应当说性是女人为男人服务，而应当是相互服务，男人也为女人服务。这才是在性的问题上道德的最高境界。对付卖淫行为，只能采用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道德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办法，而不可以采用将卖淫行为非法化、刑事化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学习借鉴国外有效的对付卖淫的政策和立法思想，以当事人的最大利益为立法的原则，摒弃道德派的沉浮观念。

女权主义的观点在李银河看来就是男女应当平等。而在中国大家对女权主义的反感可能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要算是一种误解，那就是中国的文化是讲阴阳调和的，大家似乎觉得西方的女权主义特别

张牙舞爪，要和男人去争去斗，有这样一种误解，所以会觉得女权主义不是一个好词。最激进的女权主义有一种观点，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本身就是压迫关系，完全不能接受，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就是真正地完全地摆脱男人。她们觉得异性的性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压迫关系。这种东西要想让中国人接受特别难，因为中国人信奉阴阳调和，而这种部分女权主义者激进极端的观点令中国很多人误解了女权主义，从而厌恶和唯恐避之不及。而这种观点并不能代表所有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过去主流文化特别强调阶级性，觉得在阶级利益之外单提出来妇女的利益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最主要的应该是阶级斗争，妇女的问题至少是很不重要的，不要单独提出来，所以会否定女权主义。

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在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模糊性别界线，提倡男女都一样，女人要去做男人的事，要求男女平等。出了许多“铁姑娘”之类的劳模。建国之后的头30年，媒体一直在提倡这样一种倾向。当时的女人习惯于掩盖所有的女性特征，尽量不突出性别的差异。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从80年代初开始，性别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化妆、穿显露女性特质的衣服，还有要求回家当太太。中国女性有一种回到传统角色去的倾向，那种强调性别差异的倾向，这是性别问题在中国的一个历史变化过程。虽然现在出现了专职太太这样一个群体，但是绝大多数的女人还是在工作，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对于有些人认为由于就业机会少，女人不如回家去的观点，女界对此反应非常激烈，工作是女性的权利，不是不可以选择回家，但不能剥夺女性工作的权利。就是说，女性有就业的权利，也有不就业的权利，一切看女性自己的选择。李银河指出，女性和男性表现出差异来，并不见得就是不平等，不一样不等于不平等。强调性别特征、表现性别特征，也不一定就是恢复了不平等，这两个东西不是必然连在一起的。 [3]

李银河反对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她认为，不能说某些性

格必定属于某种性别，比如说女人就是柔弱的，男人就是刚强的，女人就适合扮演辅助性的角色，男人就适合当领导。似乎人的社会性别角色是由他的本质决定的。差异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在女人中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传统看法中的所谓男性度和女性度。在同一种性别中，个体的差异也很大，比如说有的女人比较柔弱，有的女人却特别强悍，特别有攻击性，男性度和女性度在女人当中也是有很多差异的。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缺少母爱，或者是她事业上进取心特别强，如果用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像个真正的女人。中国人爱把事业成功的女人叫做女强人，认为这些事业上特别成功的女人缺少女人味。我觉得这种观点对女性是一种压迫。

李银河指出，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说过，世界上有6%—10%的人在性别归属上是不清楚的。如果按照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一个人不是男人就必须是女人，那么这些人该怎么办？在性别关系上，如果涉及到策略问题时，有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使用男和女的分类，比如说当我们争取男女平等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沿用这个男女两分的分类法。不过当我们使用这种两分法时，要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性别如果能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性别界线如果能够变得越来越模糊，将是令人特别欢欣鼓舞的一种前景。看到现在西方出现的雌雄同体的思想及性别模糊化的趋势，这种做法似乎在打破一种特别强的规范，性别规范变得模糊以后，对人的压迫要少一些。你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一种人，可以任意自由地表现身上传统的所谓男性或者是女性的东西，用不着被迫去做100%的女人或100%的男人。社会建构论批判了把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这三个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思维定式，是对人的一种解放。按照社会建构论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自然的。女性有一个女性的生理，就一定要有女性的心理，这个逻辑并不一定符合自然的秩序，因为这种关于自然的看法本身就是社会和文化建构起来的，使人们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跟那个东西连在一起。这是文化加给我们的一种规矩，而人完全可以

超越这个规矩。

[1]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 李银河.妇女家庭与生育[J].江苏社会科学，2004（4）.

[3] 艾华、李银河.关于女性主义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01（4）.

5.5.3 李小江的市场女权主义

严格地说，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李小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她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妇女研究。她发出“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1]的疑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在理解和使用上有着较大差异的词语，如“解放”、“平等”、“意识”、“妇女研究”等，正是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约定俗成的、拿来即用的词语，却正是在理论的建构和实践应用中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李小江80年代的全部论著，包括了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对中国快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革命现代化提出的批评。她实质上利用了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修正80年代的马克思人道主义，补充后—毛泽东时代的人道主义文化批判，为女权主义主体在后—政治市场经济中重新定位。市场女权主义（market feminism）并不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终止的中国进步论女权主义那里重整旗鼓的。它既没有重建，也不是中断了的民族传统的延续。李小江的研究广泛涉及当代毛泽东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刻的政治影响，也涉及优生进化论、性选择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长期关注。延安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发掘和反思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与现在像李小江这样的思想家在20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研究相互关联。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女权主义学者网络，着重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发展妇女解放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如何才能适当地安置“妇女”主体？李小江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她率先提出了其著名的观点：谴责革命现代化，特别谴责毛泽东主义的文化形式使女性的身体非自然化。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李小江曾经以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大跃进”精神武装头脑去改造物质和文化环境，敢于揭示国家与妇女利益相悖的做法。李小江对处于主体

性中心的“自然”受欢迎的生动表述，确定了性别主体的中心地位。它使李小江自己的经验变成了女权主义理论的数据。尽管她的市场女权主义将经济改革、女性主体性、家政服务、妇女的性爱主体以及消费者选择等问题联系到宏观经济关心的问题，如剩余劳动力城市发展，她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社会进化中的性权力问题。李小江在80年代的理论著作《性沟》很好地把她那一代人的独特经验与国际女权主义中的理论——如贝蒂·佛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特别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马克思存在主义《第二性》——融合在一起。

到了90年代，李小江提到，经济效益和公正原则之间的冲突集中在妇女的身体上。然而妇女解放要有先决条件，即使有了高水平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也必须伴随着妇女意识的觉醒这样的主观条件。 [2] 中国理论现代性仍然是“男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那些基于僵化或不发达的女性主体之上的中国现代性理论一样，承载着阐述与男性化的现代、文明和人道主义概念相似的重任。李小江信奉现代主义的观点，她认为，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女性的经济地位和主体的形成必须被提高到这一点上，即女性要享有平等但却有不同的主体性，要享有男性自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在历史上享有的与主体性同等的权力。

李小江对于为什么要搞中国的女性研究这个问题，是这样认为的：人类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民族性原则，抽象的人类是不存在的，除了最基本的性别差异外，在李小江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民族因素更重要。这种根植于“妇女”的抽象范畴与特殊的民族或本土意识的辩证法，在她的思想中至关重要。她说，马克思主义妇女学的研究起点，首先就是对人类整体中的妇女进行抽象。在这个抽象中，它既要把妇女作为人类整体的一个部分加以考察，从而使它获得一般的规定；同时，又要把它看作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一个包含着多种范畴的总体，从而确定它自身的基本规定性。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地丰富整个人类科学，为现实生活中的妇女问题、妇女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当代乌托邦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更为进步，因为他们的确提出了性别和阶级压迫的物质起源，他们的批判理论的确为中国共产主义提供了获得成功的策略。但是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等同于无产阶级解放，鼓励妇女自己抛弃女性气质，并倡导“先做人，再做女人”的策略。对于这种相对偏左的国家政策，李小江寻求一种新生的妇女理论——能够容纳妇女的女性气质，探索一种再生的妇女自治的解放道路——能够动员起更具自我意识而极少缺憾的女性主体。她认为，就妇女问题来说，迄今为止阶级中国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薄弱之处的方法，就是采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明确地宣称要突破毛泽东主义所限制的性的禁区，证明性别与阶级的可分性以及正视全球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历史。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在理论工作中重新思考妇女问题，她指出：“妇女理论本身就隶属于人类科学。” [3] “妇女理论是对妇女所做的哲学上的抽象。在实际运动中，妇女理论研究可以面对不同的对象，形成各种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而妇女解放，作为实际运动本身，则是妇女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具体的对象之一。” [4] 妇女理论并不是现成的教科书，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比较其他国家，中国妇女研究更具潜力。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革命的变迁，尽管中国妇女研究目前比西方国家晚了二十年，但是它仍然超过了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非中国学者现在正在做的事，因为中国妇女研究可以从已经被解放了的主体开始，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中国妇女研究在世界上处于优势地位，是社会发展在当代提出的新的任务。 [5]

李小江所有论题中最著名的部分就是妇女双重负担的概念。她认为，双重负担包括两方面。首先，它意味着，在欧洲妇女放弃了封建社会形式而呈现出现代矛盾时，中国妇女只是在她们已经继承下来的封建角色上又加上了现代角色，使她们加倍疏离于人格。更常见的是，按李小江的说法，双重负担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布命令超前“解放了”中国妇女，其结果是妇女参加了社会生产，而与此同时她

们还要从事自然生育和基本的家庭工作。为“唤醒自我意识”，当代中国妇女必须以她们自己特殊的方式解决双重负担的矛盾。必须自己能够获得主体地位并对解放的真实需求进行历史的反省。人类解放取决于妇女的进化发展。

[1] 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兼论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J].浙江学刊, 1997(4).

[2] 李小江, 朱虹, 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374-375.

[3]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25.

[4]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19-20.

[5]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98.

5.5.4 戴锦华的后结构女权主义

与李小江的市场女权主义相比，戴锦华对唐纳·哈拉维所提出的实行控制信息系统的敏感性更要明显一些。每一位理论家，几乎所有属于不同思想团体的同时代的人，都同样专注过历史词语误用“女性”。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李小江的早期著作使用过优生学的、异性恋的和遭鄙视的女性身体来解决女权主义思想中的妇女问题。戴锦华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对真实的女性整体寄予想象。但是在戴锦华的领域中，以女人身份出现的过去和今天的妇女们所留下的痕迹还不能在当代被表现，只能在为了的某个时候才可以被表现出来，也就是女性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以及日常的女权主义思想中解决了妇女问题的时候。

戴锦华以尊敬之心分享李小江的观点，即中国革命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男性化的平等和违反基本性别差异的方式，背离了历史的逻辑，也背离了自然。然而，戴锦华的政治从三方面与之不同：

第一，在李小江的市场女权主义把其与国家发展政策联系起来之时，戴锦华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抵抗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第二，当李小江赞同发展意识形态，只要它承认妇女的特殊需求时，戴锦华却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对欲望的女性化提出了保留意见。

第三，当李小江看上去还在支持分裂的普遍理性的主体时，戴锦华已经开创了一种起因于嫌恶的文化批评，想让妇女的真实性保留在未决状态，妇女与理性的关系不可表现。

戴锦华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以一种更改置换的形式从中国进步论女权主义中延伸和分离出来。她仍然将基本权力问题归属于性差

异，戴锦华把性和生育问题分离开来并扩充了它，性差异对人格来说是重要的，而对民族的种族生存力而言却不是。

1989年，戴锦华和孟悦出版《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指出，中国女性的命运与中国历史命运之间有着异常密切的错综纠缠。她们把历史改变成为一个分析性的、男性的、人类的主体。根据其理论——历史的解释，在封建秩序的建立及其被资本主义推翻之间的岁月里，中国妇女一直是一个受挫的性别，藏匿于历史的无意识之中。为了掩饰其战胜了女性的象征性胜利的野蛮残忍，男性抹煞了女性自身以及她们用以表达自己真实的反真理或与男性差别的能力，男性不仅用父权命名女人取代了女性自身，还竟然抢占了他们给予其直接控制下的女性菲勒斯崇拜主体性。当然，女性保住了自己社会统治的秘密以及在适当的历史时机以此来颠覆父权意识形态的潜力。封建女性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1]

90年代末，戴锦华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球化的社会紧迫性的理论，必须根据当前的困境重新改造。作为一个理论家来说，戴锦华的研究既是国际女权主义全球思潮的部分，又是本民族情形中相当实用的策略。中国的女权主义不管为其提供基础和依据的推动力来自理论优生学、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理论，中国的女权主义完全不是地方主义的，而是一个流动着的理论。这一点，戴锦华对后结构主义或反本质先于存在的马克思女权主义的辉煌重构就是一个例子。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7.

5.5.5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应以1957年为分期线。1957年之前，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中国革命要实现的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不得不首先致力于解决民族、阶级这些大的结构性问题。而到1957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消灭私有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妇女运动有可能不再需要过分关注阶级、民族等大的制度框架，而可以转向关注男女之间的问题。当时，妇联上下对“妇女是不是解放了”、“男女是不是平等了”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认为虽然理论上说妇女已经解放了，但实践上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男女还不完全平等，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妇女组织机制化”是中国妇女运动实践中最突出的特点，妇联作为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中国做得非常成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委员会最初是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成立的。苏联先成立，中共学习苏联，从井冈山开始成立妇女代表大会，一直到解放之后，这个组织一直存在。但是，苏联没有坚持下来的事情中国则坚持下来了。究其原因就是苏联没有像中国妇联这么强大的组织，能从一开始就把所有最高层的女性精英都放到妇联里面，她们做了很多努力，使这个组织机制化。虽然妇联在党和国家机制内仍处在边缘地位，但要看到，妇联作为一个体制内部的群体行动者所发挥的作用，妇联组织虽然有其问题和局限性，但是，妇联确实把妇女解放、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等思想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妇女之中去了。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妇女对苏共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很反感，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大家很认同妇女参加劳动。社会主义时期在动员妇女大规模参加劳动的时候，一方面通过劳动赋予妇女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在建构劳动力的性别等级制度，妇女是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存在的，也可以说，性别化的劳动力等级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时期动员妇

女参加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参加生产的意义，不能简单断定那个时期妇女解放是工具性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妇女被国家组织运动的社会性别与劳动，从而认为那时的妇女没有主体性。实际上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参加生产同样有建构主体性的作用。

我们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的整体评价，是与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传入及评介缠绕在一起的。一些学者，特别是旅居境外的学者，大多是从对新自由主义和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批判入手，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视为一种批判资源。国内一些学者是接触到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性别理论之后，开始反思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看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实践中的一些负面东西，即缺少主体性向男人看齐，给女人带来很大的压力。“主体性”成为评价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的一个核心标准，而这个标准被认为是来自西方女权主义理论。通过对中共历次妇女运动决议案的文本分析，得出“阶级”在早期同样给予了劳动妇女一个主体身份——革命的主体，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对身份的强调追根溯源仍然是主体性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体现。由此可见，主体性理论对于中国性别研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近乎压缩成了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又简约成了“主体性”和“自主性”两个概念。“主体性”如此深入人心，与“文革”结束，80年代反国家主义思潮这一独特的政治背景有莫大的关系，有其历史进步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取代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新形式，与之相伴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横行。各种各样的“后学”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宏大框架，同时把一切东西都变得支离破碎了，使之更加个人化。

90年代以来，中西方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各种批判的过程中，西方女权主义对自己的第二次浪潮也进行了一些严肃的批

评。它指出西方女权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西方女权主义从第二次到第三次的转变，发生在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即新自由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第二波女权主义在改变文化上对妇女的承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缺乏一种在经济方面的关注，所以，对于“非物质性的解放”的批判应该是重点。2009年南希·弗雷泽（Nancy Frazer）评论说这是“历史的错位”。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中国的妇女问题，中国的女权主义该怎么回应？从9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的思潮。思想界对于前30年和后30年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争论，形成了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派”。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正好是在80年代进来的，80年代的主流话语是承继五四的“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下，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变成了“封建主义残余”。8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以个人主义来反抗国家主义，弘扬的自由主义价值契合了资本主义精神。80年代的女权主义知识运动无意中参与到了后来发生的急剧资本主义化的拓路过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被系统介绍到中国。

当时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时候，引进了什么？接受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哪些方面当时不认为那么重要。比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现在看起来很重要，但是当时介绍时没有人重视，认为马克思主义跟女权主义有很多对立点，甚至把它们说成是“不幸福的婚姻”。现在，有必要对8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同时，反思在这35年中有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理论系统。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失，是一个值得中国妇女研究学界关注的问题。对于妇女解放理论的研究，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也没有深入到当代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去进行分析，缺少对现实妇女问题的理论提炼。同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认识和了解也不够全面，只是引用一些经典作家

的观点或者文章。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处境，类似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处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虽然被官方奉为指导思想，但在实际研究中，包括妇女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实际上被搁置，是被架空的。

理论研究缺失的现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妇女研究学界没能重视和很好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另一个潜在的原因是跟西方理论\\中国实践的霸权式国际学术结构有关。西方被认为完成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创造，而中国只需要“应用”，而“应用”又极易产生机械搬用。对于中西学术格局中所处位置的敏感以及对于霸权式格局的不满，引发了有没有中国的女权主义这一并不偶然的问题。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女权主义，并不是过分追求形式，而是，中国对于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要有坚定的认识，坚持跟别人去沟通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有自己的立场和出发点，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对世界做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实质上就是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一系列的思想政策的集成，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的延续性。1995年，由于受到社会性别的影响，为了应对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提出“马妇观”。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理论有三个主要思想来源：一个是五四女权主义，还有一个是恩格斯对家庭的批判，再有一个就是民族主义话语。并强调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纳入到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之中去。这是基本的框架。

因为中国民族危亡的大时势，使得追求独立人格和妇女解放的五四女权主义理念没能得到发展，从最初对个人人格解放的关注转向了对民族问题的关注。中国一直强调女性加入到民族革命之中，在全民族解放中追求妇女解放。女性解放和民族解放是中国妇女的两个目标，从来都不是一个目标。民族解放运动与妇女运动的联合，是第三世界的妇女运动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女权主义运

动是通过推动小团体利益的进步来推动全社会进步的，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则是通过推动大群体的利益来提高小团体的利益的，但二者殊途同归。

结语

当今女性研究理论既离不开对女权主义的研究，同样，也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女权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课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结合起来，以多元化的原则兼容并蓄，以日益丰富的理论指导女权运动的社会实践，得到了巨大发展。对于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女性正面临着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中国女权主义需要找到新的理论工具来探索可能的解决模式，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恰逢其时。李小江曾说：“我们过去只关注中国妇女自身的问题，缺乏与国际妇运共享经验的自觉，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自己说自己的话，自己做自己的事”。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和世界对话，需要借鉴国外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虽然不能为中国女性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可以拓宽视野，转变思维。女权主义是涵盖当今女性发展思潮众多共性与差异性的世界话语，它能丰富我们“民族话语”中的单一视角，开拓出中国女权主义新的文化语境。

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被称为“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影响女性的理论学派”^[1]，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基础分析研究妇女解放问题，从生产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背景下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同时，它也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即只注重阶级关系，认为性别问题从属于阶级关系的理论缺陷。对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私有制压迫起源论提出质疑，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在经济论和意识形态论之间的折衷路径三方面来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把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解放道路，又强调性别斗争的非阶级独立性，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问题，而且对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

问题也十分关注，在解决当今世界女性的解放问题上具有普遍性。

中国的女权主义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父权制在中国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使得女性主体意识薄弱，在女性解放运动中缺乏主体性，以客体身份出现。中国的女权运动从来都是社会革命和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女性的利益服从于国家和阶级的利益。中国女性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实现妇女解放，也一直按照国家的需求、男性的模式来塑造自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国家放弃对女性的政治性保护和安排，使女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劣势和危机。在2013年度由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世界性别平等报告书中，评估了全球136个国家的性别平等度，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排在第69位，国人的健康医疗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尤为落后。 [2]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开始觉醒。这种觉醒表现在：女性运动从国家包办控制的模式中分离，女性解放从阶级解放中分离，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从属于阶级而是和阶级并行的独立范畴。女性解放的内容和目标与阶级解放存在差异。中国的女权主义虽然并没有经过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和重建的过程，但是出现一股“修正”思潮，主张女性的性别认同，有意识地反对以阶级分析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 [3] 正如李小江认为的，阶级问题远远不能包容女性的问题。

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女权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借鉴的同时，注重将理论的研究和中国女性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思考中国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境，探讨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以促进当代中国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正如玛丽·埃·萨万所说：“女性主义是世界性的。其目的旨在把妇女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各国妇女之间的团结。女性主义又是民族的。旨在结合各个国家具体的文化和经济条件考虑妇女解放的重点和策略。” [4] 现在应该做的是努力把世界的变成中国的，把民族的融入世界之中。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优秀理论成果，把女权主义

问题作为重要课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了解、反思、借鉴、扬弃、综合，构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

[1]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5.

[2] 南方都市报[N].2010年11月5日.

[3] 邱仁宗主编.女权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6-97.

[4]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19.

参考文献

著作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资本论[M].第一卷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列宁全集[M].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列宁全集[M].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1]列宁选集[M].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欧文.欧文选集[M].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14]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

[15][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向警予.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7][德]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M].葛斯等译.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1995.

[18]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0]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M].中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1]毛泽东著作选读[M].(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2]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
[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25]李小江.夏娃的探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6]李小江.性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27]李小江.女人,一个遥远美丽的传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8]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9]李小江等主编.主流与边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0]李小江.走向女人——新时期妇女研究纪实[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1]李小江.挑战与回应[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32]李小江.关于女人的问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33]李小江等主编.平等与发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4]李小江等主编.主流与边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

[35]李小江.解读女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6]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批判与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7]李小江.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8]李小江.女人读书——女性/性别研究代表作导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9]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40]王政、杜芳琴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1]郑新蓉、杜芳琴.社会性别与社会发展[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2]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43]余宁平、杜芳琴主编.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的全球与区域视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4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5]闵东潮.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46]李静之、张心绪、丁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7]王政.中国女性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48]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9]奚广庆、王瑾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5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女性的状况[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1]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2]国家统计局.中国的女性与男性[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53]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54]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在中国[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55]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6]谭兢常、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5.

[57]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8]张一兵、郑晓铜、赵彦.中国妇女与婚姻家庭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

[59]严峰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0]何佩群译.一种疯狂守护着的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1]李安东、段怀青译.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2]谈瀛州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3]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4]沃特金斯 (Watkins,S. A.).女性主义[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

[65]邱仁宗等主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6]金一虹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7]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8]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9]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0]李银河.女性权利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1]李银河.性的问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72]李银河编译.酷儿理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73]李银河.西方性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74]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75]李银河.李银河性学心得[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

[76]李银河.家庭与性别评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7]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8]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C].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79]王国敏.20世纪的中国妇女[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80]王逢振主编.“怪异”理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81]马元曦主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82]赵光武主编.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

[83]王国敏.20世纪的中国妇女[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84]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5]肖巍.女性主义伦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86]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7]刘霓.西方女性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8]王逢振等编译.性别政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9]林吉玲.20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90]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91]李秋芳主编.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92]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93]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94]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95]郝立新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6]李又宁.华族女性史料丛编[M].纽约：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

[97]李又宁.华族女性史料丛编[M].纽约：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

[98]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99]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0]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1]林聚任主编.社会性别的多角度透视[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

[102]邱仁宗主编.女权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3]全华、康沛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4]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05]江怡主编.理性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06]郭夏娟.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7]周颜玲、凯瑟琳·W·柏海德主编.全球视角：妇女、家庭与公共政策[M].王金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8]许纪霖主编.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09]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0]周乐诗.女性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111]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的中国境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2]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社会理论[M].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14]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15]李晓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116]周凡等编译.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17]赵海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118]肖巍.女性主义教育观及其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9]王丽华主编.全球化语境中的异音：女性主义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0]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21]章梅芳、刘兵编.性别与科学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122]马元曦、康宏锦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23]戴雪红.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观点和方法[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124]杨天才、张善文.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5]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9)[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26]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27][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28][日]富士谷笃子主编.女性学入门[M].张萍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

[129][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3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3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32][英]罗素.婚姻革命[M].靳建国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133][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M].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

[134][美]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5][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巫漪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36][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137][英]迈克尔·曼主编.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M].袁亚愚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138][美]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词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139][法]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M].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140][英]F·R·艾略特.家庭：变革还是继续？[M].何世念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41][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林建法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14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43][美]罗伯特·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C].赵培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44][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M].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145][德]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刁承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46][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王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7][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M].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8][美]詹明信、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

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149][美]帕特里夏·提茜奈托·克拉夫.女性主义思想：欲望、权利及学术论述[M].夏传位译.台北：远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7.

[150][日]上野千鹤子.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M].刘静贞等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7.

[151][美]大卫·蕾·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52][美]葛罗莉亚·斯坦能.行动超越语言[M].吕政达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53][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54][英]苏珊·爱莉丝·瓦特金斯等.女性主义[M].朱侃如译.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

[15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56][美]斯蒂文·贝斯特、[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评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57][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58][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159][美]卡拉·亨德森等著.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M].刘耳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160][美]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M].李银河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161][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162][澳]马尔科姆·沃斯特.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63][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64][美]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M].吴世雄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65][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晓征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66][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67][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M].陈仲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8][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9][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7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171][加]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M].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72][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M].陈冬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73][美]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M].刘北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74][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M].陈文庆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75][美]萨莉·J·肖尔茨.波伏娃[M].龚晓京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76][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77][美]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夏侯炳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178][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79][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180][英]布赖恩·特纳主编.社会理论指南[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81][美]克瑞斯汀·斯维斯特.女权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M].余潇枫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82][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

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83][法]珍妮薇·傅蕾丝.两性的冲突[M].邓丽丹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84][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M].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85][英]索菲亚·孚卡.后女权主义[M].王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186][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87][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M].孟非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88][法]珍妮薇·傅蕾丝.两性的冲突[M].邓丽丹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89][美]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历史中的性别[M].何开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190][美]詹姆斯·B·鲁尔.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发展进步[M].郝名玮、章士嵘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91][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M].郭为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92][美]卡罗尔·帕特曼.性契约[M].李朝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93][英]凯文·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M].王萍丽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94][美]斯蒂芬·K·怀特.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M]，孙曙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95][英]玛丽亚姆·弗雷泽.波伏瓦与双性气质[M].崔树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196][英]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7][英]乔治·迈尔逊.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M].李建会、苏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8][加]巴巴拉·阿内尔.政治学与女性主义[M].郭夏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199][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杨淑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00][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M].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01][美]朱丽亚·T·伍德.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和文化[M].徐鹏、尚文鹏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202][英]帕米拉·亚伯特、克劳儿·威勒斯.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M].俞智敏等译.台北：巨流出版社，2005.

[203][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04][英]萨特·科克利.权利与服从：女性主义神哲学论集[C].戴远方、宫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05][美]玛丽琳·J·波克塞.当妇女提问时：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M].余宁平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206][美]艾莉斯·马利雍·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M].何定照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6.

[207][美]詹妮特·A·克莱尼编.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与应用[M].李燕译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08][美]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M].章燕、李自修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209][美]苏·卡利·詹森.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M].曹晋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10][荷]祖伦.女性主义媒介研究[M].曹晋、曹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11][英]休·索海姆.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M].艾晓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12]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13][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艾晓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14][英]简·弗里德曼.女权主义[M].雷艳红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215][澳]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马天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16][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M].曲广娣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17][美]谢丽斯·克拉马雷.[澳]戴尔·斯彭德主编.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C]（精选本·上下卷）.国际妇女百科全书课题组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18][美]鲁思·华莱士、[英]艾莉森·沃尔夫.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M].刘少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19][英]迈尔森·波伏娃与第二性[M].丁琳译.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220][加]帕米拉·麦考勒姆、谢少波选编.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M].蓝仁哲、韩启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21][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M].李凤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22][美]贝尔·胡克斯.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M].沈睿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

[223][美]斯蒂芬·P·特纳、保罗·A·罗思主编.社会科学哲学[M].杨富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24][美]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主编.保卫历史[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25][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欧阳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26][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27][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28][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229][美]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M].孟鑫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30][美]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M].沈齐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31]Evelyn Reed,Problems of Women's Liberation.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69.

[232]Ester Boserup,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70.

[233]Celestine Ware,Woman Power:The Movement for Women's Liberation,New York:Tower Publications,1970.

[234]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New York:William Morrow,1970.

[235]Emma Goldman,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Other Essays on Feminism.Albion,CA:Times Change Press,1970.

[236]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237]Dorothy Ballan,Feminism and Marxism.New York:World View Publishers,1971.

[238]Linda Jenness (ed.).Feminism and Socialism.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2.

[239]Ann Oakey,Sex,Gender and Society,London:Temple Smith,1972.

[240]Rowbotham,Sheila:Women,Resistance,and Revolution,New York:Pantheon,1972.

[241]Evelyn Reed,Is Biology Woman's Destiny?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2.

[242]Rowbotham,Sheila,Woman's Consciousness,Man's World,Henmondsworth:Penguin,1973.

[243]Charnie Guettel,Marxism and Feminism,Toronto:Women's Press,1974.

[244]Hilda Scott,Does Socialism Liberate Women? Boston:Beacon Press,1974.

[245]Barbara Garson,All the Livelong Day:The Meaning and Demeaning of Routine Work.New York:Penguin Books,1975.

[246]Evelyn Reed,Woman's Evolution:From Matriarchal Clan to Patriarchal Family.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5.

[247]Jack Goody,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248]Adrienne Rich,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New York:W.W.Norton,1976.

[249]Eli Zaretsky,Capitalism,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New York:Harper & Row,1976.

[250]Christine Delphy,The Main Enemy: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Women's Research and Resources Publication,London,1977.

[251]Sheila Rowbotham,Hidden from history:300 years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it,London:Pluto Press,c1977.

[252]Ann Foreman,Feminity as Alienation:Women and the Family in 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London:Pluto Press,1977.

[253]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54]Nancy 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255]Gloria Martin,Socialism Feminism:The First Decade,1966-1976.Seattle:Freedom Socialist Publications,1978.

[256]Elisabeth 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

[257]Alison M.Jaggar and Paula Rothenberg Struhl,eds.,Feminist Frameworks:Alternative Theoretical Account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Men,New York:McGraw-Hill,1978.

[258]Annette Kuhn and Ann Marie Wolpe,eds.,Feminism and Materialism: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Bost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

[259]L.Clarkand Lange,L.The Sexism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Women and Reproduction from Plato to Nietzsche,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9.

[260]S.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London:The Women's Press,1979.

[261]Susan Moller Okin,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262]Sheila Rowbotham,Lynne Segal and Hilary Waiwright,Beyond the Fragments:Feminism and the Making of Social-ism,London,Merlin,1979.

[263]Colin Sumne,Reading Ideologies: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Ideology and Law,London,1979.

[264]Z.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Mohtly new press,1979.

[265]Zillah R.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c1979.

[266]Beverly Lindsay,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f Third World Women:The Impact of Race,Sex and Class,New York:Prae-ger,1980.

[267]Ellen Malos,ed.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80.

[268]Raymond Williams,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London:Verso,1980.

[269]Bonnie Fox (ed) ,Hidden in the Household:Women's

Domestic Labour under Capitalism.Toronto:Women's Educational Press,1980.

[270]Stanley Aronowitz,The Crisi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Class,Politics and Culture in Marxist Theory,New York:praeger,1981.

[271]Jane Flax,Do Feminists Need Marxism?New York:Longman,1981.

[272]Jean Bethke Elshtain,Public Man,Private Woma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

[273]B.hooks,Ain't I a Woman.Black Women and Femini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1.

[274]M O'berien,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

[275]M.Stacey and Price,M.Women,Power and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Tavistock,1981.

[276]Angela Davis,Women,Race,and Class.New York:Random House,1981.

[277]Lydia Sargent,Women and Revolution: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1.

[278]David M Gordon,Richard Edwards,and Michael Reich.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279]Michael Ryan,Marxism and Deconstruciton:A Critical Articulation.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280]Alex Callinicos,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London:Macmillan,1982.

[281]A.Davis.Women,Race and Class,London:Women's Press,1982.

[282]Sanda Harding and Merrill B.Hintikka eds.Discovering Reality: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Meta-physics,Methodology,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Dprdrecjt:Reidel,1983.

[283]Lise Vogel,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83.

[284]Alison M.Jaggar,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The Harvester Press,New Jersey,1983.

[285]Antonio Negri,Marx Beyond Marx,New York:J.F.Bergen,1984.

[286]Christine Delphy:Close to Home: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London:Hutchinson,1984.

[287]H.Eisenstein,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London:Llen & Unwin,1984.

[288]Z.Eisenstein,Feminism and Sexual Equalit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4.

[289]G.Llord,The Man of Reason:"Male"and"Female"in Western Philosophy.London:Methuen,1984.

[290]D.Spender,Feminist Theorists.Three Centuries of Women's Intellectual Traditions,London:Women's Press,1985.

[291]Nancy Hartsodk,Money,Sex,and Power: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York:Longman,Repr.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

[292]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5.

[293]Judith Newton and Deborah Rosenfelt (eds),Feminist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Sex,Class and Race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5.

[294]Edited by Juliet Mitchell Ann Oakley.What is Femi-nism? [M].Pantheon Books,New York,1986.

[295]Roberta Hamilton and Michele Barrett ed.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Feminism,Marxism and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6.

[296]Linda Nicholson,Gender and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297]Sylvia Walby,Patriarchy at Work:Patriarchal and Capitalist Relations in Employment,Cambridge,Polity Press,1986.

[298]T.Cliff,Class Struggle and Women's Liberation,London:Bookmarks,1987.

[299]T.Moi (ed) ,French Feminist Thought.A

Read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

[300]Seyla Benhabib and Drucilla Cornell,Feminism as Critique:On the Politics of Gender.Oxford:Basil Blackwell: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301]Anne Phillips (ed) ,Feminism and Equalit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7.

[302]M.Stanworth (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Oxford:Polity Press,1987.

[303]E.Kennedy and S.Mendus (eds)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Kant to Nietzsche,Brighton:Wheatsheaf Books,1987.

[304]Chris Weedon,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 -Structuralist Theory,Oxford,Blackwell,1987.

[305]Janet Sayers,Mary Evans,and Nanneke Redefelt.Angels Revisited:New Feminist Essays.New York:Tavistock Publications,1987.

[306]Denise Riley,Am I That Name: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New York:Macmillan,1988.

[307]Elizabeth V.Selman,Inessential Woman:Problems of Exclusion in Feminist Thought.Boston:Beacon Press,1988.

[308]Michele Barrett,Women's Oppression Today-The Marxism/Feminist Encounter,London:Verso,1988.

[309]Catharine A.Mackinnon.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es London,England,1989.

[310]Edited by Roger S.Gottlieb.An Anthology of Western Marxism—from Lukas and Gramsci to Socialist Femin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11]Hawkesworth.Beyond oppression: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M].New York:Continuum,1990.

[312]M.Buckley,Women and Ide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 and 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89.

[313]Diana Fuss,Essentially Speaking:Feminism,Nature,and Difference.New York:Routledge,1989.

[314]Alison M.Jaggar,Susan R.Bordo (eds) ,Gender/Body/Knowledge,New Brunswick: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315]C.A.Mackinnon,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89.

[316]I.German,Sex,Class and Socialism,London:Bookmarks,1989.

[317]S Ruddick,Maternal Thinking: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London:Women's Press,1989.

[318]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London:Routledge,1990.

[319]Patricia Hill Collins,Black Feminist 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Boston:Unwin Hyman,1990.

[320]A.Davis.Women,Culture and Politics:London:Women's Press,1990.

[321]H.V.Hanson and I.J.Phillipson (ed) :Women,Class,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A Socialist Feminist Reader,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

[322]bell hooks,Yearning:Race,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90.

[323]T.Lovell (ed) ,British Feminist Thought.A Read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

[324]L.J.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

[325]Susan Moller Okin,Justice,Gender and the Family,New York:Basic Books,1990.

[326]Sylvia Walby.Theorizing Patriarchy,Oxford:Blackewll,1990.

[327]Tania Modleski,Feminism Without Women:Culture and Criticism in a“Post feminism”Ag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1.

[328]M.L.Shanley and C.Pateman (ed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and Political Theory,London:Polity Press,1991.

[329]Chandra Talpade Mohanty,Ann Russo,and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

nis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330]Edited by Michele Barrette and Ann Phil-lips.Estabilizing
Theory—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Introduction[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California,1992.

[331]Michele Barett and Anne Phillips eds,Destabilizing
Theroy: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32]Margaret L.Anderson and Patricia Hill
Collins (eds.) ,Race,Class and Gender:An
Anthology.Belmont,CA:Wad-s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2.

[333]Christine Delphy and Diana Leonard,Familiar Exploi-
tation:A New Analysis of Marriage in Comtempory Western
Societies,Pliety Press,Cambirdge,1992.

[334]Valerie Bryson,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An In-
troducti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2.

[335]J.Chapman,Politics,Femi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of
Gender,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3.

[336]Genebieve Lloyd,The Man of
Reason:“Male”and“Female”in Western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93.

[337]Tani E.Barlow,Dunham and London ed.,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338]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Materialiast Femi-

nisms,Blaekwell Cambriage MA and Oxford,1993.

[339]Rosemry Hennessy,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Routledge,New York,1993.

[340]Ben Agger Westport.Gender,culture,and power:toward a feminist postmodern critical theory[M].Conn:Praeger,1993.

[341]Bat-Ami Bar On.Albany (ed) :Modern Engendering:Critical Feminist Readings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NY:SUNY Press,1994.

[342]Kathleen Lennon and Margaret Whitford,eds.Knowing the Difference: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1994.

[343]Naomi Schor and Elizabeth Weed,eds.The Essential Differ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

[344]Josephine Donovan.Feminist theory: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merican feminism[M].Continuum.New York,1994.

[345]Edited by Penny A.Weiss and Marilyn Friedman.Feminism and Community[M].Temple University Press.Philadelphia,1995.

[346]D Bubeck,Care,Gender,and Justi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

[347]Lise Vogel,Women ' s Qusetion:Essays for a Materialist Feminism,Routledge,New York,1995.

[348]Ann Garry and Marilyn

Pearsall, eds. *Women, Knowledge, and Reality*.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49]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50] Ann Brooks, *Postfeminisms: Feminism,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997.

[351] Penelope Deutscher, *Yielding Gender: Feminism,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97.

[352] M.L. Shanley and U. Narayan (eds.) ,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Theory: Feminist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353]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354] Nancy Hartsock,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Revisited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nited Kingdom: Westview Press, 1998.

[355] Chancer, L.S. *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Confronting Beauty, Pornography, and the Future of Femin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98.

[356] M. Zimmerman, Upper Saddle River (ed) : *Environment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Second Edition, 1998.

[357] Sarah Gamble ed., *Feminism and Post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358]Misha Kavka and Elisabeth Bronfen eds.,*Feminist Consequences:Theory for the New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359]Kriemild Saunders ed.,*Feminist Post-development Thought:Rethinking Modernity,Post-colonialism and Representation*,New York/London:Zed Books,2002.

[360]Chandra.Monhanty,*Feminism without Borders:Decolonizing Theory,Practicing Solidarity*,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

[361]Carole R.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Routledge,New York,2003.

[362]Michele Barrett,*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Ingestre Road,London,1980.

[363]Carol Ehrlich,“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Lydia Sargent:Women and Revolution: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1.

[364]Iris Young (1981b)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Lydia Sargent:*Women and Revolution: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Bonton:South End Press,1981.

[365]Alison M.Jaggar,*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The Harvester Press,New Jersey.1983.

[366]Lise Vogel,*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367] Edited by Juliet Mitchell Ann Oakley. What is Feminism?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6.

[368] Judith Evans, Feminist Theory Today: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wave Feminism, London: Sage, 1996.

[369] Edited by Linda Nicholson. The Second Wave —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M].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97.

[370]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1969),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371]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Bel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2000.

[372] Mary—Alice Waters. Feminism and the Marxist Movement [M]. 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2001.

[373] Robert B. Talisse. On Rawls: a liberal theory of justice and justification [M]. Hunter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1.

[374] Heidi Hartmann (1979a),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375] Sandra Harding (ed),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New York:Routledge,2004.

[376]Margaret Walters,Femi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Research Press,2008.

学位论文：

博士论文

[1]田雨.女权主义的划界、反思与超越[D].吉林大学，2006.

[2]杨凤.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D].中山大学，2006.

[3]虞晖.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新探讨[D].中国人民大学，2008

[4]那瑛.“离家”与“回家”——中国妇女解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D].吉林大学，2008.

[5]刘晓辉.当代中国女性发展探析[D].山东大学，2010.

[6]褚艳红.变动中的女性研究视角[D].华东师范大学，2011.

硕士论文

[1]李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论述[D].复旦大学，2004.

[2]胡波.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中国妇女解放理论[D].黑龙江大学，2007.

[3]程文利.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D].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009.

[4]高苑.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解放思想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5]张丽娜.女权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论文文献：

[1]李小江.改革与中国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兼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妇女问题及妇女理论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8（4）.

[2]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兼论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J].浙江学刊，1997（4）.

[3]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史回顾[J].浙江学刊，2000（1）.

[4]石巧兰、李兴芝.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J].妇女研究论丛，1992年创刊号.

[5]刘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述评[J].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2（1）.

[6]李银河.论女性的就业机会[J].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9）.

[7]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J].哲学研究，1996（5）.

[8]艾华、李银河.关于女性主义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01（4）.

[9]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2002（2）.

[10]李银河.李银河妇女家庭与生育[J].江苏社会科学, 2004 (4) .

[11]何萍.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妇女解放的观念变革[J].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 (5) .

[12]何黎萍.中国妇女争取财产权和继承权的斗争历程[J].北京社会科学, 1998 (4) .

[13]王春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异同[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1999 (2) .

[14]戴雪红.重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述评[J].浙江学刊, 1999 (6) .

[15]戴雪红.性别与阶级——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诠释女性解放的两种角度[J].学术论坛, 2000 (1) .

[16]戴雪红.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变革还是继续?[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4) .

[17]戴雪红.父权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女权主义的理论透视[J].妇女研究论丛, 2001 (6) .

[18]戴雪红.失去目标的女权主义运动——“平等与差异的二难困境”初探[J].妇女研究论丛.2002 (5) .

[19]戴雪红.女性解放的哲学思考——女性异化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消解[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3) .

[20]许鸿翔、周敏.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吸收与借鉴[J].大连大学学报, 2000 (3) .

[21]王美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22]孟鑫、贺晓光.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女权主义主要流派的影响[J].高校理论战线，2001（8）。

[23]王向贤.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流变及发展[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24]孙承叔.哲学主题历史转换的内在本质[J].东南学术，2002（4）。

[25]王宏维.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解读模式[J].学术研究，2002（4）。

[26]沃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J].学术研究，2002（4）。

[27]宋歌.西方女权主义带来的几点启示[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2（4）。

[28]秦美珠.困境与选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走向[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4）。

[29]秦美珠.马克思视野中的感性原则与女性解放[J].理论界，2004（4）。

[30]秦美珠.试论马克思女性解放思想的哲学意义[J].兰州学刊，2004（6）。

[31]秦美珠.历史的误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

[32]秦美珠.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幸福吗？[J].学术交流，2009（4）。

[33]叶苗.略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J].江西社会科学, 2002 (5) .

[34]郭正红.从国外女权社会主义运动思潮透析现代女性[J].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6) .

[35]庄渝霞.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交锋——试论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解构[J].江西社会科学, 2002 (7) .

[36]刘禾.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J].中华读书报, 2002 (11) .

[37]潘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特色[J].湖南社会科学, 2003 (1) .

[38]施旻.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变异[J].理论学刊, 2003 (2) .

[39]陈文联.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形成[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6) .

[40]李钧.论大跃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J].齐鲁学刊, 2004 (5) .

[41]蒋欣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J].求索, 2004 (8) .

[42]刘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诠释[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2) .

[43]刘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当前的新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 2005 (1) .

[44]董丽敏.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

[45]康沛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J].浙江学刊, 2005 (5) .

[46]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J].妇女研究论丛, 2005 (6) .

[47]宋少鹏.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女权主义的区别：理论与实践座谈会综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48]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J].妇女研究论丛, 2011 (4) .

[49]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J].开放时代, 2012 (12) .

[50]黄继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 2005 (10) .

[51]王淼.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J].甘肃理论学刊, 2006 (5) .

[52]王宏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8) .

[53]陈学明.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批判[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7 (1) .

[54]藏健.苏联对中国性别平等的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 2008 (2) .

[55]刘建波.女性主义：中国式标签[J].山东社会科学, 2008 (3) .

[56]董丽敏.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57]史巍、韩秋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综述[J].东南学术, 2008 (6) .

[58]吴攸.近代中英女权主义运动之比较[J].求索, 2009 (1) .

[59]陈炳辉.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 (2) .

[60]董美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J].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2) .

[61]俞萍.中外妇女参政的差异比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8) .

[62]岳昌君.高等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比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 (6) .

[63]钟瑞添、乌尼日.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J].理论学刊, 2010 (8) .

[64]石红梅.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特色女性学理论的发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2 (5) .

[65]王平.走向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J].哲学动态, 2012 (9) .

[66]C.弗鲁埃尔·洛班.对母权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评价[J].世界民族.1980 (4) .

[67]巴雷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理论概念的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1983 (3) .

[68][英]M·菲斯克.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J].丁耀琳译.国外社会科学.1983 (5) .

[69][英]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J].王来今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 (5) .

[70]贾格尔等.女权主义理论概览[J].国外社会学.1989 (1) .

[71][美]艾莉森·杰格尔.女权主义概览[J].国外社会学.1989 (1) .

[72][法]甘·德洛奈.女性问题社会学研究：恩格斯遗产[J].李朝晖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 (10) .

[73][美]马莎·E·希门尼斯.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女性主义论[J].周守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 , 2005 (10) .

[74][美]特雷萨·L·艾伯特.让女性主义回到唯物主义[J].段素革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 (10) .

[75][美]特雷萨·L·艾伯特.让女性主义回到唯物主义[J].段素革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 (10) .

[76][美]马莎·E·希门尼斯.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女性主义[J].周守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 (10) .

[77][法]甘·德洛奈.女性问题社会学研究：恩格斯的遗产[J].李朝晖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 (10) .

[78][美]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J].周穗明译.世界哲学 , 2009 (2) .

[79]Z.Eisenstein (1979a) ,en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Z.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9 , 5-40.

[80]Z.Eisenstein (1979b) , “Some Notes 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Z.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 41-55.

[81]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 83-106.

[82] Heidi Hartmann (1979a) ,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 Kyung Kim (ed) :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 206-221.

[83] Heidi Hartmann (1980b) ,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Z.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 206-247.

[84] Iris Young (1981b) ,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 43-69.

[85] "Sandra Harding,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 135-163.

[86] "Carol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 109-131.

[87]Senn Charlene Y.and Radtke,H.Lorraine:Women's evaluations of and affective reactions to mainstream violent pornography,nonviolent pornography,and erotica,Violence-and-Victims,1990,Fal.Vol5 (3)

[88]Reflections on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NGO Forum'95.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96 Vol.22.Nol.

[89]Iris Young (1980a) , “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roy” (1980)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Difference,and Women's Lives,Routledge,New York,1997.

[90]Margaret Benst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1969)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Difference,and Women's Lives,Rout-ledge,New York,1997 , 17-32.”

[91]Mariat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1972)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Difference,and Women's Lives,Rout-ledge,New York,1997 , 40-53.

[92]Xinyan Jiang.The Dilemma Faced by Chinese Feminists[J].Hypatia 15.2000 , 3.

[93]Elizabeth A.Pritchard.The Way Out:Development and the Rhetoric of Mobility in Postmodern Feminist Theory[J].Hypatia 15.2000 , 3.

[94]Jay Gallagher.Do MUSCLES Matter?—Women and Physical Strength:A Reply to Xinyan Jiang[J].Hypatia17.2002 , 1.

[95]Xinyan Jiang.Reply to Jay Gallagher[J].Hypatia.17.2002 , 1.

[96]Yuk-Lin Renita Won.Reclaiming Chinese Women's Subjectivities:Indigenizin“Social Work with Women”in China Through Postcolonial Ethnography[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ume 25,Issue 1,January-February 2002.

[97]Martha E.Gimenez.Capitalism and Oppression of Women:Marx Revisited,in Science and Society,vol.69,no.1 (January 2005)

作者简介：

程铭莉，女，山东日照人，吉林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女性方面的研究。

科研成果：

一、项目：

1.2014年度横向课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思维试点与实践方位研究”，项目编号：371142751435

2.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自组织视域下大学生网络道德共同体培育与运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JDSZ3043

3.2013年度吉林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改革的综合性机制与结构性范型研究”，项目编号：2013072

4.2011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如何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编号：SLKTSZ 2011-140

5.2010年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对大学生考试作弊不良行为的调研分析与预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GZXS 10023

二、论文：

1.《地方债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风险探讨》，载《经济纵横》（CSSCI,中文核心），2014年第8期，第一作者。

2.《论毛泽东对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载《理论学刊》（CSSCI,中文核心），2014年第9期，除导师外第一作者。

3.《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其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载《广西社会科学》（CSSCI扩展版，中文核心），2015年第3期，第一作者。

后记

书稿即将付梓，我思绪涌动，感慨万千。女权主义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学术领域，从读博士起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妇女到底还受不受压迫？如果不受压迫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性别研究？女性为什么会处于受压迫的从属地位，女性是否可以改变这一地位，又如何改变这一地位，这需要我们思索。2010年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就把女性研究作为我今后的研究方向。并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梳理、观点评析和与中国女权主义的殊异甄析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当我跟导师商定这个论文选题的时候，对论文的成文并没有一个清晰缜密的想法，有的只是一个朦胧的框架和一腔无知无惧的热情。在写作过程中，浩繁的中外文献、冗杂的思路曾经让我心里略过深深的惶恐和担忧。惶恐自己浅窄单薄的理论素养驾驭不了如此厚重庞大的选题，担忧自己笨拙的文笔表达不出女权主义者们对女性命运和人类命运执着的反思和探索。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面对先哲仍觉自己的粗陋浅显。但是女权主义的魅力以及我对这个选题深深的感情和使命感让我绝不敢轻言放弃。一路坚持走来，才有了这篇拙作。

在这个艰辛的过程中，我的导师赵海月教授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的学术精神给予我精心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对我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铭记。贾中海教授的真知灼见和不吝赐教使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特别感谢徐充教授、穆艳杰教授、姜淑华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齐晓安教授和吉林财经大学的关晓丽教授对论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吉大读博的四年多时间里，和同门师妹沈月、宿晨华一起奋斗相携的充实，和同门好友张晶、王瑜、赫曦滢、李丹、金东梅、韩冰、康喜斌一起交流相长的愉

悦，和舍友张春静、赵金子一起共处相知的快乐，都让我倍加珍惜和难舍。还要特别感谢东北师范大学的三位师兄付诚、高明和刘岩对我学业的诸多支持与鼓励。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参考了相关的外文原著和翻译资料，借鉴了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经过充实、深化形成今日的书稿，虽然几经修改终于得以完稿，但是由于我学识水平有限能力不足，心中始终感觉缺憾。另谬误也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我会把此书的完成作为新的起点，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弥补不足，鞭策自己努力前行。

本书稿写作的过程中学习并借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深深表示感谢！最后衷心感谢我的家人、同事和学生以及每一位给我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祝福你们！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